

辽沈旅游丛书

# 话说元帅林

李凤民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阳 ✦

■ 李凤民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说元帅林 / 李凤民著. — 沈阳 :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4. 7  
(辽沈旅游丛书)

ISBN 7-81102-048-3

I. 话... II. 李... III. 张作霖 (1875 ~ 1928) — 陵墓 — 简介  
IV. K928. 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8579 号

---

出 版 者 :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3 号巷 11 号

邮编 : 110004

电话 : 024—83687331 (市场部) 83680267 (社务室)

传真 : 024—83680180 (市场部) 83680265 (社务室)

E-mail : neuph @ neupress. com

http : // www. neupress. com

印 刷 者 : 沈阳农业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 140mm × 203mm

印 张 : 5. 125

字 数 : 110 千字

出版时间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 刘振军

责任校对 : 米 戎

封面设计 : 唐敏智

责任出版 : 秦 力

---

总定价 : 50. 00 元

## 序

前不久，李凤民先生将其力作《元帅林》书稿拿来征求意见，并嘱我为之作序。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曾合作编写《清代关外陵寝城阙系列丛书》，元帅林又是抚顺名胜史迹，所以我无法推辞。

《元帅林》一书分上篇、下篇及附录三部分内容。上篇论述元帅林的修建历史及建筑原状；下篇论述新中国成立后抚顺人民政府对元帅林的保护、管理及元帅林的现状；附录介绍张作霖其人和驿马坊茆墓的有关情况。全书给我总的感受是资料丰富，论述和考证比较详尽，新意迭出。比如，元帅林的设计出自哪位建筑师之手，一直是人们无法知道的重要疑问。现经作者考证确知，这位建筑师名叫殷俊，是20世纪20年代天津华信工程司的著名专家；再如，元帅林藏有大量精美石刻，20世纪80年代抚顺市博物馆为考证其来源，曾派调查组赴北京等地作了考查。结论是来自北京西郊隆恩寺明太监墓和清饶余郡王阿巴泰园寝。现经作者进一步研究，查证出这批石刻还来自北京清代郑亲王、睿亲王、肃亲王、豫亲王以及沈阳蔺家坟等多处。同时，作者对龙头碑进行了考证，发现此碑是清豫良亲王修龄碑。修龄是首封豫亲王多铎五世孙，是豫亲王王号被降封后首位袭爵者。这些发现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至于元帅林的修建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保护、管理、修缮等方面，作者都有详细的论述。表明作者在史料搜集、发掘以及科学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

夫，十分难能可贵。

元帅林是奉系军阀和抚顺地方历史的双重名胜史迹。只是我们对它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发表的文章仅限于概括介绍，主要原因是由于掌握史料有限。抚顺是全国 138 个优秀旅游城市之一，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旅游资源丰富。我说过，文化资源如同我们抚顺地下的煤，埋在地下只是资源，挖掘出来才能成为财富。最近，抚顺市委提出“建设经济强市，争创文化名城”的奋斗目标，意在努力发掘历史文化资源，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对抚顺的“建设”和“争创”是重要举措。李凤民的《元帅林》一书的出版为我们作了表率，填补了历史研究空缺。

祝贺《元帅林》的出版！

谨序！

抚顺市社会  
科学院院长

傅 波

2004 年 6 月 22 日

# 目 录

## 序 走近元帅林 ——代前言

### 上篇 营建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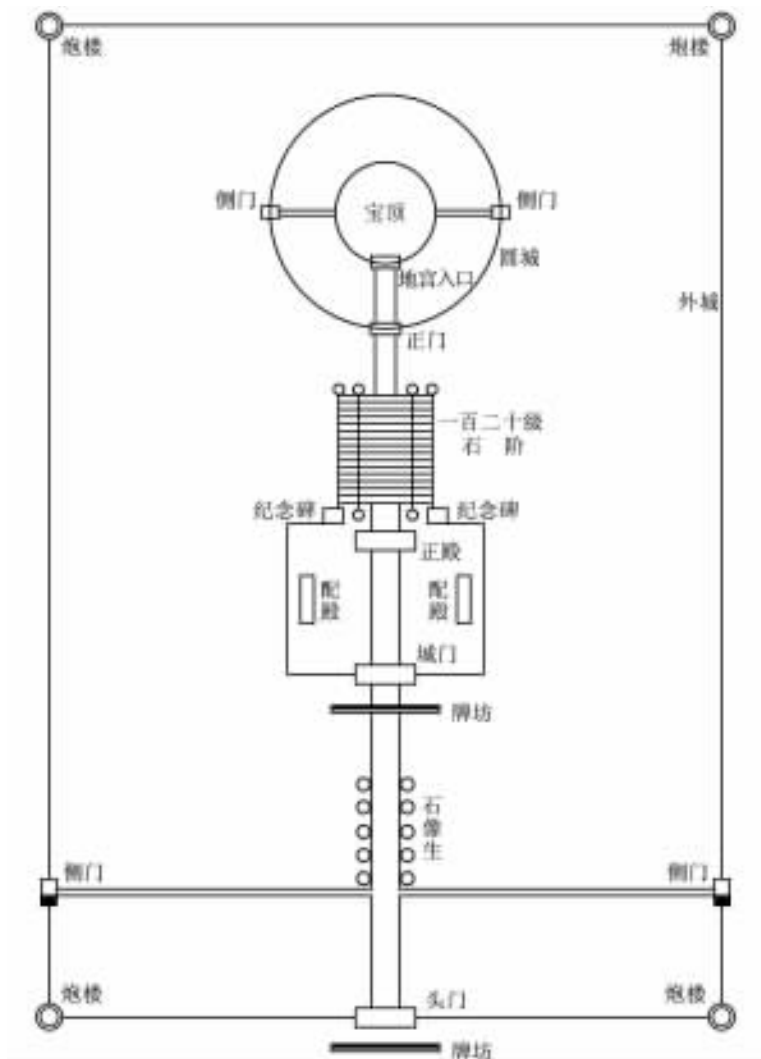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营建起因.....	1
第二章 营建筹备.....	6
一 选择“风水”地 .....	6
二 命名元帅林.....	8
三 成立大元帅葬仪筹备处 .....	10
四 征地与免赋 .....	16
五 省葬与厚葬 .....	20
第三章 营建方案 .....	24
一 华信工程司 .....	24
二 设计师殷俊 .....	26
三 原建方案 .....	27
四 方案修改 .....	32
第四章 集材兴工 .....	34
一 择吉动土 .....	34

二	采办建材 .....	38
三	设置卫队 .....	42
四	兴隆地面 .....	44
五	撰著碑铭 .....	45
第五章	遇变停建 .....	52

## 下篇 盛世繁兴

第六章	保护历程 .....	58
一	建国初期 .....	58
二	铁背山公园时期 .....	61
三	铁背山石刻管理所时期 .....	63
四	元帅林文物管理处时期 .....	69
第七章	建筑现状 .....	72
一	外城 .....	72
二	圆城 .....	73
三	宝顶与地宫 .....	74
四	一百二十级石阶及纪念碑 .....	78
第八章	明清石刻 .....	80
一	明清石刻苑 .....	80
二	石像生 .....	85
三	龙头碑 .....	89
第九章	关东碑林 .....	91

第十章 石刻研究 .....	95
, + 一 发现“清和硕豫良亲王碑” .....	95
二 龙头碑为何是三甬 .....	98
三 “金大昊天寺妙行大师行状碑”转藏辽宁省博物馆经过 .....	100
四 库藏及失散部分石刻 .....	102
五 石刻数量问题 .....	108
六 石刻来源考 .....	110
附 录 .....	118
铁背山与萨尔浒风景区 .....	118
张作霖生平简介 .....	123
驿马坊张作霖墓园 .....	134
后 记 .....	145



元帅林建筑示意图



# 走进元帅林

## ——代前言

元帅林是“东北王”、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未葬茆墓。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奉系军阀史的重要遗存。其建筑规制仿自清代皇陵，兼蓄西方某些艺术装饰；建筑规模在近代名人墓中首屈一指、卓尔不群。现为辽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辽宁五十处最佳旅游景点之一，海内外名闻遐迩的历史名胜和旅游风景区。林园山环水绕、树海林涛。墓园庞大，建筑独特、蕴涵丰富，极具魅力。

景区位于抚顺市东约三十五公里营东村南面的一座高阜之上，“占地一百七十多公顷”<sup>①</sup>，坐北面南，三面环水一面背山。浑河如同“玉带缠腰”环顾其东、南、西三面（今为大伙房水库一角），“老岭子”<sup>②</sup>山峦叠嶂，如万云堆聚，拥护其后。一条钢铁大动脉——沈吉铁路——横贯其间，“高丽营子”、“营盘”等历史有名的村落散处于铁路沿线。浑河南岸铁背山平地突兀，如同一座天然的巨大

---

① 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第261页，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② 《奉天通志》二，第17页，东北文史丛书编委会，1982年。

“屏风”遮护于前。山上有一奇石高四米，状如纺锤，推之可动，撼之不倒，俗称“晃荡石”，与元帅林中心线南北相对不偏不倚。铁背山西麓烟波浩渺的库水之间，著名的萨尔浒山探头露角与元帅林遥遥相望。

如果对这里的山川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它们同出自东北第一山的长白山。《清太祖实录》称：长白山“绵亘千余里”<sup>①</sup>，被大清奉为“圣山”。长白山支脉众多，伸向抚顺境内者有三条，即“龙岗山”、“吉林哈达”、“千山山脉”。龙岗山东起吉林、新宾交界处之“滚马岭”，“峰峦重复，错落成群，盘结玲珑，走势如龙”<sup>②</sup>，自东而西百余公里，铁背山为其末端；吉林哈达由龙岗分支“北走松花江与辽河之间”，抚顺境内主要山峰有“王三大岭、官岭，西为文笔峰、北大岭、将台山”<sup>③</sup>，老岭子为其南侧边缘；千山山脉始于新宾县东境，走苏子河南岸，县境主要山峰为“萨尔浒山、二道砬子山、影壁山、蝠卧山、大排子山、马古山”<sup>④</sup>等，“千峰万岭，重重叠叠、郁郁葱葱，参差错落”<sup>⑤</sup>，萨尔浒山为其南侧边缘。发源中长白山的河流很多，流经抚顺东境者主要为浑河、苏子河。浑河是龙岗山与吉林哈达的界河，发源于清原县东境的滚马岭和桦树哨两源，由东向西而流，沿途汇集英额河、黑石木河、来鹿河、罕羊河、六家子河诸水，至铁背山西麓与苏子河交汇合一；苏子河发源新宾五凤楼，自东向西而流，

---

①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第1页。

② 赵立静：《抚顺地区森林沧桑小史》，载《抚顺文史资料》第八辑，第213页。

③ 同上，第214页。

④⑤同上，第215页。

沿途汇聚五里河、照阳河、网户河、草仓河、木奇北河等水，是龙岗山与千山山脉的界河，全长 147.4 公里。元帅林的地理位置恰恰处在以上“三山”、“二水”的聚合之所。这一奇妙的天然形势究竟是“风水”师们的先见之明，还是纯属巧合？令人琢磨。

元帅林一带的人文历史也非同寻常。铁背山、萨尔浒山、营盘、高丽营子都是明清历史上有名的史迹。铁背山（又称界凡山）和萨尔浒山早在明代后期即有建州女真人“纳申”、“把穆尼”、“瓜喇”等首领所筑城寨。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将其兼并。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明朝发兵十万，兵分四路企图围剿努尔哈赤，明、清双方遂即展开一场大战。其主要战场就在铁背山与萨尔浒山之间的河谷地带（今为大伙房水库库区）。努尔哈赤在此歼灭明大将杜松率领的西路军 25000 多人，接着，努尔哈赤又连续将其北路、东路吃掉，取得战争的绝对胜利（史称“萨尔浒之战”）。翌年，努尔哈赤为夺取辽东，先后在界凡山、萨尔浒山建造行都，以此为大本营进军辽沈，先后占领辽阳、沈阳等地，从此登上统治全辽的政治舞台。为大清问鼎中原奠定下基石。现今，两座行都遗迹斑斑可考，依稀可见；营盘，据说是萨尔浒大战时明军屯兵之地；高丽营则是努尔哈赤安抚归降的朝鲜军民之所在。顺治十六年（1659 年）一位名叫吴兆骞的文人，因“科场案”涉嫌作弊被押解入京，在皇帝钦试时他又交了白卷，因此被定罪，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吴在羁旅途中行经高丽营村有感，即兴写出如下一诗：

高丽营（唐太宗东征旧迹）

文皇昔日征辽海，      此地高丽亦驻兵。  
想象六军频血战，      苍茫异代尚残营。  
黄云碛断行人少，      白骨原空梦草平。  
日暮江流风雨行，      滔滔东去不胜情。

吴兆骞将高丽营说成是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的遗迹，乃是顾名思义造成的误解。其实，唐太宗东征并未到达此地，其说，“纯属无稽”<sup>①</sup>。不过，吴兆骞却为我们记录下三百多年前元帅林一带的历史景象，倒也难能可贵。

元帅林始建于1929年5月。1931年工程即将告竣之际，因突发“九一八”事变，被迫停工。其规模按计划“占地四十里”，仿照沈阳东陵（福陵）格局设计建造。有圆城、方城、外城。圆城在陵山之上；方城在陵山之下，外城在圆城、方城之外。圆城之内有宝顶和地宫。宝顶四周镶以黑色大理石，乌光闪烁，与白壁黑瓦的城墙形成鲜明对比。据《盛京时报》报道说：“茔内掷（置）灵三”，意思说此墓准备安葬张作霖和他的两位夫人，是夫妇合葬墓。方城内有正殿和东、西配殿。圆城与方城之间有一百二十级石阶上下连接。方城之前有石牌坊和石像生。外城有头门和东、西侧门。全部建筑均用砖石或木架结构。屋顶铺设绿色琉璃，雕梁画栋，朱漆彩画，庄重肃穆，富丽堂皇。另外，还计划在浑河两岸修造石堤，河上架设石桥和水泥桥各一座，修一条由沈阳直达墓前全长近百公里的专线公路，以供游人行旅。还计划建“龙岗镇”，

---

① 马赫：《诗中抚顺二千年》，第76页，抚顺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修辞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印，1985年。

开辟“市场”一所，建中、小学校各一所，派军队一个团常驻守护林墓。还要改铁背山名为“铁龙山”，改赶马河为“赶龙河”，改“水龙沟”为“水龙卧”等等庞大计划。然而，这一切皆因“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统统化为泡影。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后，千方百计阻挠将张大帅“奉安”元帅林，并于“事变”第二年“派飞机将宝顶炸塌”<sup>①</sup>。张氏家族只好将张作霖改葬于辽西锦县驿马坊张家老坟。从此，元帅林成为一座空冢。也为历史留下一桩千古憾事。

元帅林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断壁残垣，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人民政府精心保护。1954年国家为根治浑河水患，决定修建大伙房水库。元帅林前半部处于规划的水库淹没区，有关部门在征得张家同意后将元帅林水线以下建筑拆除，保留圆城、宝顶、地宫、一百二十级石阶及部分外城等主体建筑。1974年元帅林由抚顺市博物馆接管，不久设置专职管理所。1978年元帅林被列为抚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翌年正式对外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加大了修缮资金的投入，经多次修整，使元帅林基本恢复历史原貌。1988年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大伙房水库水线以上的元帅林已修葺如初，外城三面整齐坚固；圆城形如“天坛”，圆圆团团。正门内外的汉白玉名坊和石狮据说是东北地区绝无仅有的石雕珍品。宝顶形体巨大，重重叠叠。地宫幽暗神秘如同隔世，这里是目前关外地区惟一开放的陵墓地宫；正门外一百二十级台阶如同悬挂的银色“匹练”，从山上斜垂至波光粼粼的河

---

<sup>①</sup> 《抚顺市志》第一卷，第34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面。阶下两端高高矗立着两座白色“纪念碑”<sup>①</sup>（有人称其为“华表”），状如灯塔，已成为元帅林标志性建筑。

外城以东是一处名曰“龙头”的开阔地，这里陈列着“石像生”、“明清石刻苑”、“龙头碑”等一批具有重要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明清石刻。与“明清石刻苑”相对的是一座富有江南风韵的建筑“关东碑林”，荟萃当代著名书法家沈鹏、谢雅柳等人翰墨碑刻二百余块，这在东北地区也是独占鳌头。周围林木茂密，绿草茵茵，花团锦簇，园路纵横，一些园林小品装点其间，造形讲究，环境雅洁优美。

另外，为满足广大游人对元帅林历史的了解，又增设了《元帅林始末图片展览》和彩色录像资料片。还设置有“林湖木屋度假村”、饭店、“跑马城”、“枪战场”、“卡丁车场”等多种旅游娱乐设施。

此外，元帅林的前半部因修大伙房水库早已成了水下世界。只有每当水位下降时，方城城门和外城头门的高大上顶会崭露头角、浮出水面，如果是枯水季节甚至会暴露无遗，而且连外城、方城、正殿、东西配殿等建筑遗址都能清晰可见。比如，1997年夏就出现过这种少有的情形。当时曾引起轰动，不少新闻媒体为其报道，《沈阳晚报》发表记者孟娇采写的文章，题目是《元帅林方城脱水而出》，文章内称：“5月29日记者一到抚顺就听说元帅林景区水退500米，水下沉睡44年的元帅林方城景观重见天日，许多揽胜猎奇者纷纷前往观瞻，感受沧海桑田的变幻……。”孟娇还采访了元帅林文管处路力生处长，路处长说这是游览元帅林历史全貌的绝好机会。以后，如果再

---

① 《抚顺市城建档案》“元帅林档案”。

遇此良机请游人千万别错过。

元帅林自 1979 年正式开放以来，游人不断增多，如“1978 年至 1985 年每年有 2—3 万游人”<sup>①</sup>，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每年最多时增至二十余万人”<sup>②</sup>。游客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其中，旅居海外的张氏族人、亲属曾多次来此瞻谒：如，1981 年张作霖之外孙女莅此，临行时索取一甬刻有“安国军张大帅林墓专用”铭文的琉璃瓦“带往美国”<sup>③</sup>。接续而至者有张学铭（张学良之胞弟）、张闾璜、张闾恒（张作霖之孙女）、张学文（张作霖之侄）。还有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赵媿（赵四小姐）的胞弟赵国玮等等。他们对政府出巨资保护修缮元帅林无不表示由衷的感谢之情。如，张学文深切地说：“这是政府对张家的关照，张学良为民族作出的牺牲是值得的。”<sup>④</sup> 张学良的旧部郭维城、卢广绩、刘铭九等多人亦曾前来观瞻。郭维城老先生参观之后感慨万端，即兴赋诗曰：“一代元帅功过昭然，园林依旧何胜欣然。惟愿汉公将军早日回归故乡，亲将元帅遗骨移葬斯园，以偿夙愿。”<sup>⑤</sup> 卢广绩老先生则满怀激情

---

① 《抚顺市志》卷 3—5，第 492 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② 王春兰：《话说元帅林》，载《抚顺社会科学》，1992 年 4 期封 3。

③ 赵杰：《元帅林》，载《辽宁文史资料》总 22 辑，第 193 页。

④ 赵杰：《元帅林》，载《辽宁文史资料》总 22 辑，第 195 页。

⑤ 王春兰：《话说元帅林》，载《抚顺社会科学》，1992 年 4 期封 3。

奋笔挥毫，为元帅林题写了铭碑。

到此访问观光者还有一些诗人、作家等社会名人，仅知者有孙竽、李仲元、吴山、高志嘉、王曾等，而且他们各有诗作刊行。如，孙竽先生的《游元帅林》七律：

明湖翠岭拱高台，    树茂茕空究可哀。  
尚武失防割地寇，    争锋不顾酿民灾。  
兴师偏恃绿林勇，    积弊屈抛少帅才。  
今日陵边堆锦绣，    游踪到此久低徊。

又如，高志嘉先生的《元帅林》诗：

参观遗迹感沧桑，    想见当年东北王。  
一代豪华付流水，    空余啼鸟噪斜阳。

再如，李仲元先生的《元帅林》诗：

高碑未勒生平业，    空冢难销子弟哀。  
毕竟关东王者墓，    前朝翁仲傍陵台。

深刻表达出诗人对元帅林历史沧桑的感慨之情。

元帅林山水如画，建筑独树一帜，如烟往事充满传奇，古今艺术跨越时空交融展示。这一切无不给人留下难以忘却的愉悦和启迪，但更多的是带给人们对历史的沉思。这些正是元帅林的魅力所在。



# 上篇 营建始末

## 第一章 营建起因

1928年6月刚刚登上“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宝座不久的张作霖，迫于北伐军的节节进逼以及财政、对日外交等种种困难，决定撤离北京退守关外。仅命张学良、杨宇霆二人暂时留京收拾残局。

此时，日本方面由于张作霖对其所谓各项“满蒙悬案”久拖“不决”<sup>①</sup>，致使其侵略政策难以“推行”<sup>②</sup>，决心伺机把他除掉。在关东军的秘密策划下，一项暗杀计划开始紧急实施。关东军选定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俗称“老道口”）的地方作为爆炸点，埋设黄色炸药二百块，由东宫铁男现场指挥和控制起爆电钮。为确保暗害计划万无一失，他们还在铁道上安装了列车脱轨器，并准备了大刀队与冲锋队。为了准确掌握张作霖专列的行踪，又在京奉线各主要车站派了谍报人员。总之，他们为张作

---

①②崔槩、魏福祥、杜尚侠：《辽宁地方史》，第411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霖布下了“必死之阵”<sup>③</sup>。

6月3日凌晨，张作霖在其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离京。张学良、杨宇霆至车站为其送行。对此“最后一幕”，日本人主办的《盛京时报》在翌日出刊时在头版用超大版面、超大标题、超大字号做了详细报道，其中包括张作霖离京时的照片，张学良等人送行的照片以及详述经过的文字。文章仅正副标题就用了近百字，醒目得令人生疑，其标题如下：

自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屈指至今十一月又半，  
张作霖氏竟离首都矣。夜景沉沉，月色苍苍，行  
兮、送兮不堪俯仰……惟张学良与杨宇霆因须处  
理残务暂行留京。此夜二人在月台上立正目送帅  
驾光景凄凉，见者惻然<sup>④</sup>。

似乎隐含一种“不祥”征兆。

凌晨一点十五分张作霖的专列徐徐开出北京车站。当火车行至天津车站时，张作霖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下车；行至山海关车站时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前来迎驾，登车与张大帅同行；行至锦州车站时，日本驻锦州领事下车。此人说来令人怀疑，他是张作霖专列在北京站开动之前，手持“奉天日本军政各界委托书求见张作霖，表示他们一致欢迎大元帅回归奉天”意愿并上车同行的。此人下车后随从人员“怀疑他行动鬼祟，别有用意，怕出意外，建议张作

---

<sup>③</sup> 潘素：《皇姑屯炸车事件始末》，载《辽宁文史资料》总22辑，第142页。

《盛京时报》民国十七年六月四日。

霖改换车厢，张不以为然。”①

6月4日，当早起的沈阳市民拿到《盛京时报》正在为其蹊跷内容而疑惑间，骇人听闻的“皇姑屯事件”几乎同时发生：5点23分张作霖乘着他的“蓝钢花包车”（当年慈禧太后用车）驶过皇姑屯车站行至“老道口”时，日本顽凶东宫铁男按动起爆电钮，只听轰轰两声巨响，“蓝钢花包车”登时被炸毁，吴俊升当场殒命，张作霖身受重伤，张作霖被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张学曾等人匆忙用汽车将他接回大帅府。并立即请来盛京施医院院长雍大夫对其进行紧急救治。然而，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一代枭雄就这样惨死在日本关东军之手。

据说张作霖在临终前对身旁的二太太卢氏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干，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②

这时帅府群龙无首，上下一片慌乱。军署参谋长臧式毅、省长刘尚清提出，应暂时“秘不发丧”，防止地方不安，尤其防止日本关东军乘机制造新的事端，待少帅张学良回沈再商议后事。卢夫人以及在场各个政要一致表示同意。于是，封锁消息，“凡知情者均嘱其保密，做到守口如瓶，滴水不露”。对外佯称大帅受些轻伤。省署为此对外发表函电称：“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道，桥梁发生爆炸，伤数人，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

---

裴学度：《张作霖的最后一页》，载《辽宁文史资料》总22辑，第165页。

②②《张学良旧居》，第248页，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1999年。

城亦安谧如常”<sup>②</sup>。其间，日方多次派人至帅府打探消息，均被一些假象所迷惑。

事发当天张学良已接到父帅“受伤”的急电，此时他正指挥东北军三、四方面军在邯郸以北与晋军作战，遂下令将部队撤至滦河一线，将军团长指挥权交给杨宇霆，于6月18日安顿好前线军务之后，化装成“伙头军”<sup>③</sup>（伙夫）模样，混在士兵中乘火车秘密潜回沈阳。

“军民有主乃发丧”，张学良归来第三天，奉天当局发布讣告，宣称：“张大帅于六月二十一日逝世”<sup>①</sup>。同时组成“张大帅丧礼筹办处”，以张作相为委员长，袁金铠任副委员长。下令全城下半旗，停止一切歌舞活动，以示哀悼。

八月四日举行公祭。南京政府蒋介石、李宗仁，日本首相田中，朝鲜总督等均派代表前来吊唁。翌日，东三省军政机关人员往吊。八月七日举行出殡。出殡场面宏大，张大帅灵柩由一百零八人抬的“灵轿杠”抬着，前边是用各种彩纸扎成的“纸活”，接着是诵经的和尚、喇嘛、道士，还有鼓乐、军乐队伍，“灵轿”后面是送葬的家属、亲友、军政各界官员及军、警、宪等护卫队伍。整个队伍“长达几公里”，在沈阳城内绕行一周，然后重新回到帅府。“把张作霖灵柩暂厝帅府东院东门房内。”<sup>②</sup> 派差官邢

---

美·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  
上卷，第242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

美·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  
上卷，第243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

《张学良旧居》，第250页，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1999年。

守庆领兵看守。

并在家庙内请人塑了一尊张大帅戎装像，供奉起来。

八月八日，七七四十九天过后张学良以“大元帅之丧事赖各机关人员昼夜办理，今丧事完毕”，特于司令部“重筵席，宴请办理丧事人员，以资酬谢。”<sup>①</sup>“大元帅丧礼筹办处”也随之撤销。

张作霖生前从无预建茔墓的打算。随着丧礼的结束，这件大事摆上日程。张氏家族有两处祖墓，一处是在辽南大洼驾掌寺附近，即“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sup>④</sup>。是张学良高祖张永贵、曾祖张发、祖父张有财、伯父张作孚等先人之墓，当地人称其“九盔”，今名“张氏墓园”<sup>⑤</sup>；另一处在今凌海市石山镇驿马坊，是张学良祖母王太夫人、生母赵氏夫人之墓。不过，张学良对以上两处祖墓均感到不理想，原因是距沈阳远，交通不便，更主要的是无法展示张作霖作为“东北王”、“大元帅”的显赫地位。因此，便以“老坟不能动土”<sup>⑤</sup>为辞，决定另选“风水”地。在此期间，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相廷，为感戴张大帅生前对他的“知遇之宏施”，“拟以万泉河之私地特筑大元帅之幽宫，繁植松楸。”未被张学良采纳。

---

① 《盛京时报》民国十七年八月九日。

④⑤ 赵杰：《张作霖家族的三座墓园》载《文史精华》，2000年3期，第29页。

⑤ 吴景勋：《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相廷》，载《辽宁文史资料》第14辑，第73页。

## 第二章 营建筹备

### 一 选择“风水”地

大约八月中、下旬的一天，张学良召见帅府处长郑紫宸，令其为大元帅选择茔地。郑处长受命之后，“邀集沈阳著名术士和关内堪輿专家多人”<sup>①</sup>，分别派往辽沈各“名山大川”，广泛查勘，“大看风水”<sup>②</sup>。他们爬山涉水四处寻访，初步看中几处佳域。为此，张学良“给术士很多金钱，算作酬劳”<sup>③</sup>。在这次“海选”基础上，经过认真比较，最后把目标集中在抚顺县第四区高丽营子附近的水龙卧村。

抚顺县始设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名“兴仁县”，光绪三十四年改称抚顺县，改名同时其县署亦由沈阳迁至抚顺。县境共划分八区，“第四区”在县治以东，区公署设在营盘。全区共有“八十”<sup>④</sup>个自然村，“水龙卧”村为其一。此村地处铁背山下、浑河北岸一处南北约五百米的开阔地上。村子背后有三座并连的山岗，中间山岗较为宽大，两侧较小。山岗高约二十米，岗上前部平坦开阔，后半部凸起矮岗。山岗以北为一片平川，三华里外有起伏的高山。整个地貌有高山，有河流，有谷地，有岗脊，高

---

②③侯维翰：《沈阳的星命业》，载《辽宁文史资料》第25辑，第218页。

《奉天通志》，卷66，第1269页，东北文史丛书编委会，1982年。

低起伏，错落有致。水龙卧村还有一特殊现象，即面对铁背山“晃荡石”。人们都说这是“瑞相”，是“福地”。

古代“风水”理论对“吉地”的选择条件主要集中在“龙”、“砂”、“水”、“穴”、“明堂”几个方面。“龙”是指山脉，要求来龙深远，根基稳固，山势起伏，重峦叠嶂，层次分明，最好有“靠山”、“座山”、“照山”几重，忌孤峰独立；“砂”指的是陵山两侧的矮山，又称“护砂”或“龙虎砂”；“水”指河流，要求“水源深长”，“屈曲”，“绕抱”；“穴”是指整个墓地的位置，有“三年寻龙，十年点穴”的说法，说明寻找、确定吉地之难。当然点穴也包括确定地宫及“金井”的位置；“明堂”指的是“穴前之地”，要求“端正”和“平坦宽畅”。

水龙卧村的地理非常符合“吉地”的条件。张学良确定这里为首选目标之后首先派其亲信之人，东三省官银号总裁彭相廷前往实地审视。彭总裁在郑紫宸陪同下，“带领一名参谋、一名秘书和两名风水先生”<sup>①</sup>一同前往。两名风水先生中一名姓周，据说是最先找到此处“吉地”者，另一位不知姓氏者可能是协助彭总裁审验之人。彭相廷不辞辛劳亲自登山、涉水认真仔细查看，不时向风水先生提出问题或征询意见。最后，他对选择此地非常满意。

彭相廷回到沈阳后，立即将调查情况向张学良做了详细报告。张学良决定亲自前往。

大约十月的一天，张学良在夫人于凤至陪同下，奉寿夫人前往水龙卧村。陪行者还有张作相、汤玉麟等“老臣”，彭相廷、郑紫宸、周氏风水先生也一起随行。他们

---

<sup>①</sup> 《张学良旧居》，第251页，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1999年。

乘坐沈海铁路火车，“至铁背山车站（下车）雇用三辆马车。”<sup>①</sup>这天天气极好，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张学良一行至水龙卧村后的高岗下车，立即被这里的地势深深吸引，铁背山如屏似壁。缓缓西去的浑河如弓如带。山岗之下平坦开阔，岗北远山重峦形如卧龙。确实有一种非凡的气势。他们边走边看，边倾听风水先生滔滔不绝、振振有词的说明解释，风水先生还把这里的地理情况编成几句“顺口溜”，叫做“前有铁背山，后座金龙湾，东有凤凰泊，西有金沙滩”，以说明此地的非凡。还着重讲了一些关于此地的历史掌故，诸如努尔哈赤曾在此建行宫——界凡城，这里也是大清的“龙兴之地”，特别是对“晃荡石”更加重了渲染色彩。张学良对此十分满意。他特别注意到此地距离沈海铁路很近，交通条件也很理想。于是，他对身旁的于凤至说：“我看这地方不错，爸爸可以长眠于此了。”旋即转身向寿夫人征求意见说：“五姨，您看怎么样？”寿夫人也满意地回答说：“很好，不错”，张作相、汤玉麟等人也连声附和表示“赞同”。就这样，张大帅“风水”吉地一事正式确定了下来，归途中，细心的寿夫人想起“风水”先生讲到的“晃荡石”，心存几分疑虑：担心张家江山会因其而动荡不稳。于是，对张学良提起此事。张学良笑着回答：那好办。回头对彭相廷交待说：“香老（张对彭的尊称），等工程开始时请派人将‘晃荡石’用水泥封固！”彭相廷连声应允说：“是！是！”今天游人见到的“晃荡石”已不能晃动，原因在于当年寿夫人多事。

---

① 赵杰：《元帅林》，载《辽宁文史资料》总22辑，第192页。



## 二 命名元帅林

古人讲究“出师有名”。“元帅林”这个名称早在开工修建之前就已经正式确定。这方面的证据很多。

比如，1929年春，负责元帅林工程设计的华信工程司编制的工程设计方案即名为《大元帅林工程说明书》。

再如，近年多次发现元帅林使用的琉璃瓦件上刻有元帅林名号，其中有“张大元帅林墓琉瓦，中华民国十八年监制”<sup>①</sup>，“安国军张大元帅林”<sup>②</sup>，“张大元帅林墓琉璃瓦，民国十八年制造”<sup>③</sup>等铭文。这些文字是当年烧制瓦片之前所刻录的，用以表示专用。另据辽宁省政协文史办主任赵杰同志撰文介绍：1999年6月，他以特邀撰稿人身份，随同辽宁电视台《闲云野鹤》摄制组赴（美国）夏威夷采访张学良。行前至元帅林，在管理处负责人路力生同志支持下征集到一块刻有铭文的琉璃瓦。赵主任将其作为礼品面馈张学良，据说“张学良见琉璃瓦后泪水涟涟，”<sup>④</sup>引发他无限感叹和追忆。当然也包括为元帅林命名的往事。

还有，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老先生回忆说：

---

① 赵杰：《张作霖家族的三座墓园》，载《文史精华》2003年3期，第25页。

② 赵杰：《元帅林》，载《辽宁文史资料》总22辑，第193页。

③ 王春兰：《话说元帅林》，载《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4期封2。

④ 赵杰：《张作霖家族的三座墓园》，载《文史精华》2003年3期，第25页。

“（修元帅林）当时有人提议叫元帅陵，可张学良不同意。他说：皇帝墓称陵，我父亲是安国大元帅，就叫元帅林吧！”<sup>①</sup>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披露了元帅林命名的详细情节，现摘录如下：

张作霖名为大元帅，实际上既是“东北王”，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元首”，他的墓在当时完全可以称“陵”。为什么没有称“陵”呢？这是因为张学良一直反对他父亲称“王”。张作霖生前曾对张学良说：“你将来要做李世民。”张学良反驳说：“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民。”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比照“孔林”，决定把萨尔浒陵园定名为“元帅林”。这便是称“林”而不称“陵”的缘故<sup>②</sup>。

“孔林”即我国古代大思想家孔夫子的墓园。其地在山东曲阜，占地三千亩，周长七公里。古代对墓葬的名称有严格等级规定，即：皇帝之墓称“陵”，王侯之墓称“冢”，平民百姓的墓称“坟”，圣人之墓称“林”<sup>③</sup>。古代以“林”相称的圣人墓除孔林之外还有“关林”。关林是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之墓。关羽和孔子一样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关羽以“忠义”、“神威勇武”

---

王春兰：《话说元帅林》，载《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4期封2。

美·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卷，第296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

陈长安、宫大中：《洛阳关林》，第13页，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

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列。“关林”位于河南洛阳，占地百亩，有千年古柏八百余株。

总之，元帅林这个名称是张学良仿自古代圣贤茔墓制度而定名。学者邵斌评述此事说，张学良“富有民主思想”、“力排众议”，将父王之墓“比照孔林、关林”而称之为“元帅林”，“表示非帝王之墓”<sup>①</sup>所言诚是。

不过，时至今日仍有人说元帅林的名字是“后改的”，原名“元帅陵”，改“陵”为“林”的原因是林墓周围种植了大量松树；还有人说原因是1985年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卢广绩先生题写“元帅林”碑而得名。甚至有的文物志书也如此记载。均属误解。

### 三 成立大元帅葬仪筹备处

#### 1. 葬仪处概况

大约1929年1月正式成立营建元帅林的领导机构——“大元帅葬仪筹备处”（以下简称“葬仪处”）。

葬仪处主要人员如下：

处 长：彭相廷（边业银行总裁兼）

副处长：郑天顺（字紫宸，又作紫忱，帅府官员）<sup>②</sup>

经 理：石辑五（帅府官员）

王运丰（帅府总务科长）

主 任：秦袖风

委 员：王吉忱 刘礼书

---

① 邵斌：《元帅林》，载《现代中国》1992年8月“抚顺专辑”，第37页。

② 有一些资料将郑天顺写为“郑发顺”、“郑友顺”，均为误传。

运输员：张景瑞<sup>①</sup>

葬仪处在成立之初原设在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之内（今沈阳市沈河区沈阳路宫前里东北地质局）。不久，彭相廷以“对外办事不便”为由，乃在大东门里“大红袍胡同租妥房屋一所，并于（同年）四月一日迁入办公。”大红袍胡同位于今中街以南，今名“红袍里”。因此地与彭相廷私宅“彭公馆”所在地——“庄王府胡同”——南北为邻，所以又有人误以葬仪处设在“彭公馆内”。

葬仪处在乔迁新居当天启用公章。为此，辽宁省政府以“第521号”训令周知各机关，其训令如下：

“大元帅葬仪筹备处公函开：经启者：查本组织成立并办公地址，当经刊登政府公报在案。兹经刊就木质图章一颗，文曰：■大元帅葬仪筹备处之章■，即于四月一日启用。除分行外，相应函达，即希查照转饬所属一体知照为荷。”<sup>②</sup>

供各机关备案，以便查核。

葬仪处的机构分为机关和驻外分处两部分。机关设科室若干，“委人设科办事”<sup>③</sup>；在外设两个分支，一为“张大元帅葬仪筹备处北平办事处”，一为“大元帅墓葬工程处”。前者设在北京“前门外施家胡同”<sup>④</sup>，后者设在抚顺元帅林。北平办事处为采办建筑材料等事而设，墓葬工程处则具体管理元帅林营建事宜。（不久，葬仪处又增设两个机构，一为“建修雨亭纪念公园筹备处”，一为“大元

---

① 以上人员为笔者根据资料汇集。

《抚顺县公署》档10919号。

② 吴景勋：《东三省官号总办彭相廷》，载《辽宁文史资料》第14辑，第74页。

帅铜像委员会”，负责建设张作霖纪念公园和树立张作霖铜像。）

通过对一些资料分析可知，葬仪处主要分工如下：处长彭相廷总揽全权，对总司令张学良负责，坐镇沈阳；副处长郑紫宸负责北平办事处，长驻北京；经理石辑五负责墓葬工程处，长驻抚顺元帅林。科长王运丰可能负责建材运输等事，经常往来于沈阳、北京、抚顺之间。

营建工作开始不久，张学良在一次工作检查中发现，葬仪处机关人浮于事，而抚顺墓葬工程处却人手紧张，影响工程进度和质量，指示彭相廷调处。彭相廷随即将机关人员分成“三班”，实行“三班倒”。以一班在元帅林现场办公，以“各负专责，以免紊乱”，二班在沈阳机关处理往来公务。三个月“轮换一次，以均劳逸”<sup>③</sup>，以明确专责。

另外，工程开始后，葬仪处以距离林墓工程处“相隔遥远，需材索料动须派人传达颇感困难。”<sup>④</sup>所以，为便于互通消息，便于工作开展起见，决定“由省至墓地，装设电话专线。”<sup>⑤</sup>于是派员持函至辽宁电话局商请办理。而电话局却答以此项计划工程巨大，所需电线、电柱甚多，“事体大，费款过巨疑难照办。”<sup>①</sup>葬仪处遂即又呈文辽宁省政府，呈文内称：“先大元帅林墓系由省府摊资建修，

---

③ 《盛京时报》，民国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④⑤辽宁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第412、413页，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

①②③辽宁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第413、414页，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

而电话一项亦应由公家设备，此次费用自应划归省府报销。”<sup>②</sup>要求省政府“转饬”省电话局，告知安设此项专线电话“所需电料等费，准予核销”，无需电话局出资。至于工程完竣，“此项电话即交由帅府接收，作为永久之用。”<sup>③</sup>省政府批准了此项计划，省电话局就开工架设了从沈阳至元帅林近百公里的电话专线。

## 2. 葬仪处与边业银行

葬仪处虽然是临时机构，但在经费方面却十分充足，掌握着千万元以上的巨款。这在当时的一些企业、事业部门来说，是并不多见的。所以要管理和使用好这批巨额资金，葬仪处要设有得力的财会部门。不过，葬仪处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即处长彭相廷本人是著名金融机构边业银行的总办，又是一位知名银行家和理财能手。所以葬仪处在财务管理方面比起一般单位要顺畅、方便得多。特别是边业银行，对葬仪处更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边业银行是东三省的发行银行，专门发行现大洋、纸币，形同东北的中央银行。边业银行本是1917年段祺瑞政府的筹边使徐树铮倡议设立的，目的在于发展边疆经济。据曾任边业银行总稽核的宁恩承先生称，徐树铮计划将总行设在外蒙古首都库伦，在天津设管理处。然而这个想法“不符实际”，“加上国内连年内战，段祺瑞三倒四出，北京政府翻云覆雨，段祺瑞下了台，徐树铮的筹边使公署亦无声无息烟消云散了。”“1924年张作霖到了天津，发现徐树铮这项遗产，就收归己有”，并将其迁至沈阳，从此，成为张氏家族的私立银行（行址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东北内蒙古煤炭公司）。此行规模较小，有职员三十余人，银行部股本一百万元现大洋，而张家占股份的百分之九十五，余股为吴俊升、阚朝玺持有。

尽管如此，由于“东北王”张作霖拥有东北最高统治权，该行“却具有中央银行的特权和地位”。1928年张学良子继父业，边业银行的特权依然如故。葬仪处成立之后，各省分摊的一千四百万元营建经费全部汇入边业银行“以备应用”<sup>①</sup>。边业银行主要业务本为发行，这批资金的调入，使银行成为葬仪处储备、调配和管理资金的专行。

### 3. 处长彭相廷

彭相廷，名“彭贤”，“相廷”为其号，又作“香庭”、“相亭”。祖籍新民县东高台子，父名彭万荣。据说，彭万荣对张作霖有过救命之恩，两人因此结为“把兄弟”，而且张作霖又认年幼的彭贤为义子。后来彭万荣故去，彭相廷长大成人，到新民一家专做粮食生意的德庆店学徒。彭相廷为人和气而且勤俭，“能吃苦耐劳”<sup>②</sup>。有一次他到“张公馆（张作霖在新民的家）”送粮，被张作霖之妻发现，便介绍他到省城见其义父张作霖。起初，彭相廷被张作霖安排在军需处，学习“军需部门的业务”，二年后“被任二十七师军需总理兼帅府三等副管。”<sup>③</sup>此后，彭相廷被张作霖派往天津调查“汇华银行”倒闭案。在调查过程中，他办案认真，恪尽职守，为“奉天军民两署”免受“极大损失”立下大功，因此被任命为东三省官银号

---

① 吴景勋：《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相廷》，载《辽宁文史资料》第14辑，第74页。

② 胡化东、何东林：《回忆彭贤》，载《辽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28页。

③ 胡化东、何东林：《回忆彭贤》，载《辽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30页。

“会办，兼总稽核。”继而晋升为“总办”<sup>①</sup>，并又成为张家在“黑龙江轮船、农场、牧场，以及三畚堂在各省各处所办企业”<sup>②</sup>的代理人。据说，1926年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后，对彭相廷说：“我在前边做压道碾子，彭贤你回去给我看好家。”<sup>③</sup>从这句话足以说明张作霖对彭相廷是何等信任。而彭相廷对张家亦忠心耿耿，尽心竭力，毫无二心。

事情赶巧，“皇姑屯事件”发生前一天，彭相廷因忙于长女出嫁之事，“未得前往山海关迎接”<sup>④</sup>大帅，因而幸免于难。

张作霖丧事办理完毕，彭相廷以自己是老一辈人为由，主动向张学良辞去东三省官号总办之职。张学良也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接受了他的辞请。但是又委任他管理边业银行，并且还把主持修建元帅林的重任也一同交给他承办。据说张、彭二人有过这样一次“晤谈”：张学良说：香老，官银号总办你辞了，那是公家的事，我家的私事还得你帮忙。彭问：什么事呢？张说：“你在银行界多年，富有经验，我家的边业银行由于用非其人，几年来业务没有什么发展，急需加以调整，该行总办一职拟请屈就，万望勿辞。”张学良接着又说：“还有一事就是先父的灵柩现在浮厝于花园里，至于葬地因驿马坊老坟不能动土，应另

---

①②④胡化东、何东林：《回忆彭贤》，载《辽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31页。

《张学良旧居》，第342页，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1999年。



选吉地，修建坟墓，择期安葬，此事拟请分神筹办。”<sup>⑤</sup> 彭相廷深感义不容辞，一一慨允。从此他殚精竭虑，不辱使命，继续为张家效力。

大约 1930 年下半年，元帅林主体工程完成过半。南京政府在“奉天开全国金融会议”，会议提出“谷贱伤农”，应“由各省银行出款平抑物价，使农民不受困难。”张学良之意欲使国家银行收买，而彭相廷则认为边业银行也应先买，以为提倡。因与张学良“意见不统一”，遂“愤然辞职”<sup>⑥</sup>，并且在会毕下楼之际又将腿脚跌伤，于是他“回辽阳（彭公馆）养病”。从此，葬仪处之事主要由郑紫宸、石辑五等人经管。

伪“满洲国”期间彭相廷仍在辽阳居住，伪中央银行欲聘其为总裁，彭相廷以患病为由拒而“不受”，银行“每月给他汇来总裁薪俸”，他“原封奉还”<sup>⑦</sup>，表现出民族气节。

1945 年“八一五”光复后，彭相廷接受张家委托，任三畚堂财产清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协助“清理张家在东北的财产”<sup>⑧</sup>。新中国成立后彭相廷移居北京。1959 年病故于京寓，终年七十五岁。

---

吴景勋：《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相廷》，载《辽宁文史资料》第 14 辑，第 73 页。

⑥ 胡化东、何东林《回忆彭贤》，载《辽阳文史资料》第三辑，第 33 页。

⑦ 胡化东、何东林：《回忆彭贤》，载《辽阳文史资料》第 3 辑，第 33 页。

⑧ 《张学家旧居》，第 342 页，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1999 年。

彭相廷主持元帅林修建工程“善始”而未能“善终”，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 四 征地与免赋

##### 1. 征地动迁

在选定“水龙卧”村为“风水”吉地之后，葬仪处便开始着手征地动迁事务。

“水龙卧”这个地名许多资料记载不同，如《奉天通志》称之为“水落窝”；《静晤室日记》称之为“水龙坞”；元帅林设计《说明书》称之为“水龙湾”；《抚顺市城建局档案》称之为“水龙窝”；《抚顺县公署档》称之为“水龙卧”。这些相异的记称原因可能是口传的不同。这里从《抚顺县公署档》而称。

当时，水龙卧村住有“朱姓及潘、李等姓十余户人家。”<sup>①</sup>其中，以朱家人口最多，有“朱奎庆、朱禄庆、朱孟庆”<sup>②</sup>哥仨，还有其子侄朱成秀等多人，是村中大户；其次是潘姓。他们大都是“坐地户”，居住年限已“二百来年”<sup>③</sup>。按其时间推算，可能是清朝顺治、康熙年间从关内迁来的移民。如，顺治十年（1653年）朝廷为鼓励关内农民至东北垦种，曾颁布《辽东招垦条例》，随后有大批农民从山东、河北等地来到关外开荒种地。

水龙卧村当时有民地811.97亩。其中，“册地”579.6亩；“自垦地”33.13亩；“三园地”201.97亩。所谓“册地”又称“额地”，是指向国家交纳课赋的地亩，政

---

③ 王秀岩：《元帅林修建前后》，载《沈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184页。

据解放之初档案记载。

府向领种者发有“地契”，注明亩数、位置四至等则。领种人按年交付课赋；“自垦地”是将生荒地开成的“熟地”，三年之内免赋，期满“升科”纳赋；“三园地”指“房园、坟园、园栏”<sup>④</sup>，是建房、安坟、种菜等生活用地。三园地一般不交税。

修建元帅林需要征用水龙卧等处全部土地，要将水龙卧村民迁出。张学良为“体恤农民”<sup>⑤</sup>，使民无怨言、动迁顺利，愿以超出市价几倍的价格收购土地和住房。据说当时土地市场价，一般为“每亩大洋二十元（合奉大洋一千元）。而张学良出具的高价是，上则地“每亩现洋一百六

---

④ 《奉天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

⑤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10册，第146页。

十元。”<sup>①</sup> 中则地 “每亩现洋八十元”<sup>②</sup>，房屋、坟茔拆迁也给予高价补偿。

迁移时间大约在 1928 年的 11、12 月。先是奉天省公署将动迁水龙卧村的命令下达抚顺县公署。县公署转饬第四区公署，区公署公告水龙卧村村民。水龙卧村长遂将各户田产、房屋、坟茔等情向上做了如实呈报，经查核无误，各户持地契等凭证换取征购金，并开始搬迁。政府对动迁户在购地、建房等方面也尽量给予方便条件。由于动迁待遇优厚，百姓积极配合，工作进展甚为顺利。大约翌年一月之前已迁移完毕。如《盛京时报》1929 年 1 月 20 日报道：“张司令长官已在营盘附近勘定茔地发价收买，从事建筑。”

1978 年抚顺市博物馆在组织人员调查元帅林历史资料时，在高丽营子村查访到了当年的动迁户朱成秀一家。朱成秀生于清光绪二十六（1900 年），修元帅林时他还是血气方刚的二十九岁小伙，如今已成白发苍苍的老人。可是，提起五十年前那次动迁往事依然记忆犹新。他向调查人员说：他家原住浑河北岸水龙卧村，今日元帅林圆城、宝顶、地宫那一片地方从前是他家的耕地，动迁时给他家现大洋共七百五十元。其中，土地 “三百六十元”，“房屋给三百六十元”，“坟一座给三十元”<sup>③</sup>。他用这笔钱在三里外的高丽营子盖房，买地定居。调查组还在高丽营子、营盘两地找到其他几家动迁户。

## 2. 契税与免赋

---

②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 10 册，第 147 页。

王秀崧：《元帅林修建前后》，载《沈阳文史资料》第 3 辑，第 164 页。

张学良征购元帅林用地时使用的名头为“三畚堂领

名”<sup>①</sup>，“三畚”是张家自己开办的商号名称。如，1905年张作霖发迹之后首次在新民开设的油坊即名“三畚油坊”，后来又陆续创办了“三畚粮栈”、“三畚当”、“三畚公司”等。三畚商行经销的商品除粮食、油等民生物品之外，还经营“军需用品”<sup>②</sup>。其分支也很多，仅三畚公司就在“法库、铁岭、开原、大连、海城、辽阳等地”设置分公司”<sup>③</sup>。所以，元帅林用地在征购之后即成为张家的私产。

按当时土地管理法规，土地易主要征收“更名契税”。《抚顺县公署》档案记载当时的税种有：“地契税、三园契税、更名契税、典契税、永租契税”<sup>④</sup>等。张学良征购元帅林用地共“八百零九亩九分七厘及草房三间”<sup>⑤</sup>（草房可能用为墓葬工程处现场办公之用）。为此，1929年6月26日，张学良派长官公署事务处职员赵忠厚，持所购置元帅林用地地契共“114张”<sup>⑥</sup>至抚顺县政府办理手续。当时还规定，契税金额与购置土地的花费成正比：即购置土地花费多，契税亦多；购置花费少，契税亦少。而张学良在购买这些土地时出于“体恤农民计”，在花费上超出市价多倍，现在如果再按实际花费之数交税，他还要多交一大笔款子。因此，张学良有意请县署予以关照。赵忠厚接受指令后，找到县长张克湘，“面达”其意说：“是项地亩等之购买系作为先大元帅陵墓用地，均属山荒，饶薄

---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10册，第148页。

③ 窦应泰：《张学良家族的财产》，载《纵横》2000年6期，第37页。

《抚顺县公署》档4075号。

⑥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10册，第148页。（另载征地亩数为811.97亩）

异常。司令长官为体恤农民计，所有价款均逾格从优，较之普通实价相差何止倍蓰，惟今番投税倘即按照发给民户之价照纳契税，核与原为姑恤民户始而从优给价值格之事，实欠公允。恳为按照该地实值价估价收税。”<sup>①</sup>张县长心领神会。随即“详验（地契）所载坐落”，认为确属“山荒硗薄之地”<sup>②</sup>。又“经公平拟定”将“此项地亩统按”“每亩现洋二十元”、“草房三间亦按生间二十元计算，照数收税。”<sup>③</sup>县长张克湘遂即呈文辽宁省财政厅，请批准此项“变通办法”。省财政厅遂以“指令第415号”，准行。

不久，省财政厅又按照张学良的旨意，下令收元帅林用地的课赋永远免除。

1929年8月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事务处奉“第258号”公函至抚顺县政府，办理免赋事宜。公函全文如下：

“圣启者：查先大元帅林地坐落东西四区高丽营子南水龙卧等处，计地八百一十一亩九分七厘。此项地亩系属沙石山场，本无出产。兹经改为陵地尤不能垦植。请将所有一切课赋自本府购置之日起一律免除。实纫公谊。相应函达。希即查照办理，见复为荷！”<sup>④</sup>

八月十九日省财政厅“复令”批准。

## 五 省葬与厚葬

元帅林在筹建过程中经历了“省葬”与“厚葬”的重要变动。

---

①②③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10册，第146，147页。

④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10册，第378页。

1928年12月29日，主政东北后的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加入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南北统一。翌日，中央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1月6日国民政府以“国奉合作全国统一”乃是张作霖生前“首倡之功，拟下令追恤张大帅，以慰英灵。”<sup>①</sup>张学良随即在“东北政府会议”提出“安葬（大元帅）所用仪式”<sup>②</sup>的规模和经费等问题。然而，“会议决定”的结果却是“采用省葬”<sup>③</sup>，省葬经费暂定为现大洋一百万元。此款由东北三省分摊：奉天省应摊“五十万元，（吉林、黑龙江）两省各二十五万元”<sup>④</sup>（一说奉天省出三十万元，三番堂出三十万元，吉、黑两省各出二十万元）<sup>⑤</sup>。并经请示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当然尊重地方意见，遂“取得国府方面同意”<sup>⑥</sup>。不过，张学良对此次决定颇为不满。此时，葬仪处刚刚成立，急需开办经费。彭相廷为此几次行文东北三省政府，催促按会议决定拨款，并“限二月十五日前”将其“拨到”，以便“应用”<sup>⑦</sup>。

但是，事隔仅仅两个月，这项经费百万的“省葬”计划，一下子跃升为千万元的“厚葬”。如《盛京时报》3月19日发表报道，题目为《大元帅墓规模壮宏，方圆四十里，俨若清陵，表示尊隆乃改称山水》，内称：（铁背山

---

① 《新民晚报》，民国十八年一月六日。

②③ 《盛京时报》，民国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④ 《盛京时报》，民国十八年二月二日。

⑤ 吴景勋：《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相廷》，载《辽宁文史资料》第14辑，第74页。

⑥⑦ 《盛京时报》，民国十八年二月二日。



方圆）四十里地以内，皆划入墓地范围。并闻此刻已经布告四十里内各农户将境内所有房屋悉给价让出，以资筹备建筑。至工程期限为三年。而建筑经费亦须现洋几千万元之谱始可观成。“（将来）虽不能与南京紫金山之陵（孙中山之陵）风景媲美，一时然在清帝永陵、福陵之间。”这则报道尽管有些夸大其辞，却是最早传出的“厚葬”信息。

4月15日《盛京时报》又以《大元帅葬仪之种种》为题报道，内有“大元帅葬仪单独设有筹备处，筹备种种一切办法。茕墓闻仿照东陵（沈阳福陵）局势建筑宫室”，“工程甚为浩大。”

6月18日《盛京时报》详细报道了“厚葬”方案，其文如下：

《大元帅墓在营盘，建筑费预定共需一千四百万元》：

张大帅自昨年逝世以还，届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已届一年矣。此次周年祭典，除东北各界下（半）旗，放假志哀，四省要人躬行吊祭而外，若蒋中正、阎锡山等亦派代表前来致祭。不可谓张氏生前非无丰功与伟业也。其部下长官追念道德乃举行厚葬会议。据华日社所传：会议结果决定：在沈海线营盘附近之铁背山麓厚葬张氏，预算费一千四百万元，预定三年完成。本年五月开始开工，其经费负担：张学良五百万元，辽宁省四百万元，吉、黑两省各二百万元，热河一百万元云云。此项计划能否实行犹无须论，要之：张氏安葬铁背山麓不能媲美国父中山，然亦为北方英雄之冠，或者佑启后贤保卫乡邦千秋万世，不足流

芳于白山黑水间矣。”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省葬”突然改变为“厚葬”的原因是什么？笔者的回答是“杨常事件”。

所谓“杨常事件”是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

杨、常二人是张作霖的大员。杨宇霆官居“参谋长”、“总参议”等要职，而且被张作霖依赖为“智囊”；常荫槐官至交通部代部长、军警执法处长、京奉铁路局长等职。然而他们在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后，却以元老自居，视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的命令经常拒不接受”。而且每当他们有什么请示和要求，“动辄带有强制性和威胁性，”<sup>①</sup>迫使张学良签字批准。正因为如此，“官员依附杨宇霆者日多，”杨宅每日“文武官员，辘辘其门”，俨然成为除少帅府之外又一议政中心。张学良的许多重要决定经常因杨、常作梗“而难于实现”<sup>②</sup>，如“东北易帜”这样重大的决策，亦遭杨宇霆反对，张学良冲破层层阻力才得以实施。加之社会上有一些挑唆的传闻，如：“杨、常已订于一月十二日在沈阳发动叛变，杀死张学良”<sup>③</sup>等。这一切促使张学良痛下决心，将杨、常除掉。1929年1月10日晚，张学良邀杨、常二人至帅府“议事”，事先张学良已做好了布置，当杨、常二人步入“老虎厅”，副官高纪毅、谭海等率卫士将其双双击毙。

---

① 陈崇桥：《杨常事件评述》，载《辽宁文史资料》15辑，第2页。

② 崔燊、魏福祥、杜尚侠：《辽宁地方史》，第42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③ 陈崇桥：《杨常事件评述》，载《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第3页。

“杨、常事件”是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史学家们评论这件事的历史意义说，事件“对（张学良）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来说是一次有胆有识有魄力的壮举”，使“张学良的威信大增，地位也更加巩固”<sup>①</sup>和提高。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些判断。

古人云：“父以子荣，母以子贵。”从“省葬”到“厚葬”是张学良在“杨常事件”前后政治地位变化的“晴雨表”；从“省葬”到“厚葬”是张学良统治地位的强化而为其父帅增添的“光环”。

---

<sup>①</sup> 崔粲、魏福祥、杜尚侠：《辽宁地方史》，第42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 第三章 营建方案

### 一 华信工程司

葬仪处在动迁水龙卧村同时已确定元帅林工程由“华信工程司”承包设计。

当时，选择设计单位的方式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政、商界人士推荐或介绍。”第二种途径是通过招标、投标的方式产生。而后者是通常采用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元帅林这样关系重大的工程，肯定是经过招标、投标的途径严格选择。这里举一个实例，张学良主政东北后，1930年他决定“拆掉（帅府）西部四合院和卫队营房”<sup>①</sup>，建七栋新式楼房，作为其弟弟们的宅邸，遂向天津一些外国建筑师征集方案。天津基泰工程司经理关颂声得知，决定与外国公司争标，立刻派设计师杨廷宝飞赴沈阳，而此时距投标截止日期仅剩三天。杨廷宝抵沈后，不顾旅途疲劳，立即投入现场进行勘察、俯案构思、绘图等工作。在招标截止日期之前拿出一套完整的设计方案。据说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亲临方案展厅进行挑选。最后，他们“二人一致看中了第×号方案，揭开封签，才知道是天津基泰工程司杨廷宝的方案，中国建筑师的方案被选中。”<sup>②</sup> 元帅林的工

---

① 《张学良旧居》，第8页，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1999年。

② 杨永生：《建筑百家轶事》，第9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

程设计，选定华信工程司，大约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关于华信工程司的自然情况，很容易被认为是辽宁的某一家建筑设计企业。然而考查相关资料，辽宁、乃至沈阳“近代建筑设计基本上被外国洋行打样间（设计事务所）所包。英、法、美、日等国均在沈阳设立建筑机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地区的建筑完全被日本人所垄断”<sup>①</sup>。根本不见有“华信工程司”之名。其次，元帅林工程的招标、投标在当时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新闻。依照常理《盛京时报》等宣传媒体不会错过报道机会的。然而在这些报章中却不见任何信息。种种迹象表明，华信工程司是外地一家建筑公司，笔者推测，华信工程司很有可能来自天津。

其一，张氏家族在天津有公馆和企业，如，1919年张作霖在天津“英租界购得一座小楼”，此后又“独立经营”“恒源纺织有限公司”<sup>②</sup>。

其二，天津是中国北方建筑业最发达的城市，张家的一些住宅、企业都有选择天津工程司设计建造的历史。比如，大帅府主体建筑之一的“大青楼”，是张作霖于1922年（民国十一年）“从天津请来有经验的李木匠仿照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的天津公寓”<sup>③</sup>建造的；张家私营“钱庄”边业银行是张作霖于1925年特聘“天津基泰工程师

---

①② 《沈阳市建筑业志》，第219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

③ 《张学良旧居》，第6页，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1999年。

关颂声”<sup>①</sup> 承办修建；1929 年元帅林工程开工之后张学良“拟建办公楼及住宅各一所，请天津基泰公司及美人海曼工程司设计，以该公司曾在天津，富有经验。”<sup>②</sup> 等等。当然，这只是个人推测，有关这个问题还有待做进一步查证。

〔附记：就在本书杀青之后，本书责任编辑、东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刘振军先生从互联网“超然家庭”网站公布的“天津近代建筑机构”一栏中，发现“华信工程司”的资料。据超然家庭网站介绍，天津近代建筑机构分为施工、设计两部分，其中设计机构有九家，九家中有六家为外人开设，三家为国人经营。华信工程司名列其中。华信工程司简况如下：“初建时由外人经营，1931 年改由中国人沈理源经营。沈理源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曾在意大利奈波利奥工业大学学习，初学水利工程，后学建筑学，对世界建筑史有研究……。”〕

这件史料的发现，确证华信工程司来自天津无疑。

## 二 设计师殷俊

元帅林如此庞大的规模、宏伟的建筑出自哪位建筑师的奇思妙想？这是所有参观游览元帅林者都想了解的疑问，也是研究元帅林历史所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经笔者查阅历史档案得知，这位设计师名曰“殷俊”，是华信工程司的建筑专家。

殷俊先生是清朝末年出国留学的建筑师。据建筑史家

---

① 宁恩承：《百年回首》，第 170 页，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 年。

② 《盛京时报》，民国十八年十月二日。

杨永生考察：“在 20 世纪初中国还没有开办建筑教育”<sup>①</sup>，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全部都是留学外国学习建筑学的”。这批建筑师为“宣统二年第二次庚子赔款时出派的留学生，当时共录七十名”。其他出国留学学习建筑学的还有二三十人，分别至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留学。殷俊先生当为其中一员。

又据《天津近代人物录》一书记载，著名建筑师沈理源从意大利归国后，“在北京、天津等地执行建筑师业务，先后达三十年，早年曾和一位殷姓建筑师协作设计北京前门外劝业场和真光电影院。”<sup>②</sup>此处的殷姓建筑师即指殷俊。笔者还查到一件由殷俊署名编写的《大元帅林工简略说明书》（根据殷俊稿本用“晒蓝法”复印）。这本《说明书》是殷俊所设计的元帅林方案（方案还包括工程图纸等相关资料，可惜目前未见）。《说明书》包括“张故大元帅林墓之形势”、“建筑大纲”、“简略预算”三部分。这里引录其第一部分：

张故大元帅林墓之形势：沈阳之北，辽水之东，有佳域焉，名为水龙湾。其地四势紧凑，起祖于长白之龙岗，千里奔腾，发祥于铁背山之麓，前朝后应，气象万千，左降右伏，明堂端正。结回龙祖顾之穴，流神环抱，揽浑河上游之秀，屈曲到堂，且也灵石遥承，俱见精英之凝结，奇峰环列，益形拱卫之森严。是知吉人福地，允宜百世荣昌，此诚天施地设。所以酬我遗德在民之张

---

① 杨永生：《中国四代建筑师》，前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年。

② 《天津近代人物录》，第 192 页，天津地方志编委会。

故大元帅者也。

其第二部分“建筑大纲”分为三十九条子目，具体说明单体建筑的形制和工程做法。从这本《说明书》可见，殷俊先生不仅精于建筑学，而且有良好的传统文化功底。

元帅林是殷俊的杰作，殷俊是对元帅林有特殊贡献的历史名人。

### 三 原建方案

大约1929年1、2月间，华信工程司中标拿到元帅林设计项目。随即开始工程设计，设计任务交由本部设计师殷俊执行。殷俊接受委任，带领助手会同甲方主差派的“风水”先生一起，冒着初春的寒冷，深入水龙卧地方进行实地勘查。在此基础上经过多日忙碌，约于三月初完成全部设计。

七十年后，笔者从辽宁省档案馆查到殷俊当年的设计方案——《大元帅林工简略说明书》，这是元帅林建筑史上唯一保存下来的工程设计档案，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现根据这件档案，展示元帅林最初的设计规划。

就总体而言，原建方案与实际建筑在格局上大至相同，也是北为圆城，南为方城，圆城与方城之外绕以外城。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原建方案在方城之南还有一座“碑亭”，其它建筑在具体形势上，有的也做了若干更改。下面分别做简要介绍。

#### 1. 圆城

(1) 正门与东西侧门：正门（又称“墓门”）体量为三间，大木架结构，每间装木门一扇，木门内外“钉满天星金钉”（所谓的“金钉”、“金环、兽头”等乃是“铜镀金”），门顶铺绿琉璃瓦，梁架“雕刻彩画”。左右山墙与



圆墙直接相连交接无袖壁，门内外石阶均用条石，门“前立白石五圈牌坊一座”。与今天的对开隔扇门，门两侧建有袖壁，石牌坊在正门以内的做法不同。

东、西侧门为“单圈”门，“以达城外”，门顶铺绿琉璃瓦，门用木质，钉满天星金钉，内外兽头金环俱全，门内用白石板平铺，内外各装千级石阶。

(2) 圆城城墙：城墙地平“照山坡原有之地平为准”；城墙基础：“先打灰土十步，上铺乱石，满灌洋灰浆。其上再用大石块垒成墙基高一公尺，墙之中满灌碎石子、洋灰，使生联络之效力”；墙体：“用大块砖垒成，磨砖对缝，并加雕刻，墙顶盖以绿琉璃瓦。”

(3) 宝顶：共上下二层，下为圆形平台，平台正中为圆形丘冢基墙，基墙之上凸起半圆形冢顶，二层平台：墙“用混凝土筑成”，“外皮加白冰梅石墙，石墙皮上盖白石雕刻。盖面起线成纹”，“平台四面装置白石阶级各二分，阶级前各装白石牌坊各一座。”“台上盖以四色细土，分东西南北”（即南面用红色土，北面用黑色土，东面用青色土，西面用白色土）；丘冢基墙做法用平台台墙，“坟冢上盖用细腻黄色土拍平凸圆，并于四周加装混凝土出水管，流入二层台子”，即时排除丘冢积水。平台的“四色细土”与丘冢的“黄色土”共为“五色土”，即传统的“五行、五色”。“以收四方之秀气”“而尽五行之妙”。

(4) 地宫：“周围大墙以混凝土筑成灰墙，分内外二圈”，“空堂中四周满贴避潮工程”。“坟冢里面墙皮加抹白洋灰，抹成滨子形”，穹隆顶“加抹白纸灰，叠成云彩，装成满天星辰”；地宫之内“装置白洋灰灵座，为长方形，四周装置木质小栏杆，灵座四周均加白洋灰抹光起线，玲珑精巧，灵座中心留长方形之空堂，以透地气龙脉。”灵

座“前设置玉石案桌，上设五供、万年灯”。

## 2. 一百单八磴石阶

(1) 石阶：位于圆城正门之前，“起造连三之白石级百零八步”，“中部石阶宽为六米，左右栏杆外筑石质泻水槽，由上而下以达平地。水槽之外又装石级宽为二米。以上石级每隔十级做小平台一分。”“石级左右之三角形大墙用大砖砌造，外皮加砌冰梅石墙。”

(2) 白石灯柱：在石级下口“左右装置白石灯柱一对”，“灯柱身为八角形，下端加雕花腰箍，柱顶装置钢质灯笼各一分。”

(3) 卧狮一对：亦在石级下口。卧狮“基础用铁筋混凝土筑成庄子，四周雕刻各式花纹”。

## 3. 方城

(1) 城墙：南北长170米，东西宽150米，墙厚1米。墙体以青砖“磨砖对缝”砌造。南面正中起造城门一座，门为一间“单圈式”（拱形洞门），门扇为木质，四角嵌钢板，上钉满天星金钉，兽头金环俱全。门顶有木质门楼，顶铺绿琉璃瓦。“木质露明处均加以涂金彩画。”

(2) 大殿：位于方城内北部正中，三间，“左右之山墙以大块砖砌造，内外满粉西洋人造大理石镶成”；“内外各种大小柱子均以混凝土筑成，外包西洋人造大理石，凡一切柱子基础、柱、罗、升斗、花板皆以混凝土筑成，以求坚固，凡露明处者均加中国各色彩画。”殿内天花“以木质镶成方格及各种花纹加以涂金彩画。”殿顶“盖绿色琉璃瓦”，殿内“中间装置红色花梨木灵座，座后装置红木云龙屏神橱”。“门窗均用钢质或古铜，以求坚固，镶嵌厚玻璃。”殿前为月台，“地平满铺白玉石，分色成伏，台之前后各装白石阶级连三式一分，台之左右各装钢质灯

柱。”

(3) 东西配殿：各为五间，四面出廊，“山墙及后墙外皮皆抹砂子洋灰，以求坚固，内墙皮均抹白纸灰，顶棚用木质做成方格形，凡前后大小木柱皆以黄松充做，”顶铺绿琉璃瓦。“凡木质露明处皆包麻彩画，”“门窗皆以木质充做，嵌玻璃。”

(4) 铜鼎：位于方城之内“十”字甬路正中，以古铜铸成，下为石座，石座四面出白石石阶，四角加白玉雕刻之卧狮各一只。

#### 4. 碑亭

碑亭位于方城之前，一间，墙壁用大块青砖砌造，磨砖对缝，四壁各有拱形圆门。亭、梁架“用黄松木”，顶铺绿色琉璃瓦，四角悬挂铜铃、铁马。亭内四壁抹“白玉石粉，光清如旦壳”。“顶棚用钢质做成方格，天花涂金彩画”，天花正中“镶嵌一幅用五彩琉璃烧制的大元帅像”，地面用“白玉石铺成花纹”，亭内正中立白玉石之神道碑一座，下装青石石翼（音：“驼”），碑首刻团龙。碑亭四门为铜骨铜门。

#### 5. 神兽群

神兽共五对，列于碑亭之前神道两侧，每只神兽南北行距十五米。神兽“用洋灰造成，斩毛雕刻”。

#### 6. 外城

(1) 城墙：南北长680米，东西宽315米，墙高3米，墙基厚1米，顶厚0.7米。墙体为“混凝土基础一层，上砌大块砖”，“内外嵌砖缝”，“墙顶盖混凝土，起伏如城墙式”。

(2) 炮台：外城四角各加造炮台一座，炮台为圆形，“直径十五米”。台高出外“城墙一米半”。

(3) 头门及东西侧门：头门：三间，券洞式，门体为“混凝土基础一层，上砌大块长方式石”，其上“砌造大块砖墙”。墙顶“盖门楼子五间，均用木质涂金彩画，屋顶盖绿色琉璃瓦”。门洞地平“满铺花岗石，向外装花岗石阶级各三分”，“门用木质”，四角嵌钢板，上钉“满天星金钉，兽头金环俱全”；东西侧门，各为一间，单券式拱形门，顶铺绿琉璃瓦，门内各设守卫房一座。

#### 7. 其他

头门外有月台，上面设有洋灰制卧狮一对、白石牌坊一座，守卫木亭各一座；月台以南，浑河上架石桥一座；浑河两岸修石堤，由营盘修公路一条直达头门。

### 四 方案修改

从元帅林现存建筑以及水下淹没区的建筑遗址，与上述原建方案进行比对，不难发现，在实际修建过程中对第一方案已做了许多改变。其中重要变动有以下数项。

其一，删除碑亭。原碑亭是按照清代皇陵“神功圣德碑”制度设计的。明清皇陵定制：嗣皇帝要先皇、先祖撰著碑铭，以宣扬其文德武功，其碑名曰神功圣德碑。神功圣德碑要履以碑亭，一为保护；二为加强威严；碑亭是皇陵中主体建筑之一，关外三陵均有这种建筑。元帅林虽然“并非皇帝之陵”，因仿“孔林”、“关林”而称之为“林”，设计此亭显然不妥。

其二，改“一百单八登”为“一百二十登”。一百单八登石阶是仿照沈阳福陵设计的。“一百单八”之数有多种取义：一是“七十二天罡，三十六地煞”之合，“天罡”、“地煞”被古人视为“灾星”，取其为石阶之数意思是将其踏在脚下，可以避灾免祸；再者是佛家理论以“一

百零八”为人间烦恼之数。总之，此数有一定迷信色彩，所以将其做了更改。

其三，删除铜鼎。鼎在近代为寺庙里被作为焚香之陈设，陵墓罕见使用。

其四，改宝顶“五色土”为“五色石子图案”。“五色土”是按古代阴阳五行，“五行生克”理论设计的，也有一定迷信色彩。改用五色石子图案则是为了装饰，而且可以作为步道，并且也比较坚固持久。

其五，改“石灯柱”为“纪念碑”。设计石灯柱可能只是象征，没有实用价值。将其改为纪念碑有直观纪念意义。

其六，宝顶改二层平台为三层平台，原因可能是整个体量加大，仅二层平台显得总体失衡；再者是为了加强宝顶的雄伟气势。

其七，原设计的水泥卧狮、水泥神兽、水泥棺床等后来均为石雕所取代。这一计划的改变则属于建材采买方案发生变化所至（详见下文）。

从上述改动可见，对原工程设计方案的改动主要侧重于破除封建迷信方面。应该说，如此重要的变更肯定是张学良亲自审定的结果。张学良在当时对封建迷信持坚决反对态度。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他在主政东北后曾提出将所有寺庙拆除，禁止庙会。后经内务部讨论，认为此举过于偏颇，遂制定出“寺庙存废标准”。如1930年2月24日《盛京时报》报道，文题曰《神祠存废标准改正》，内称：“经内务部规定，（甲）：应存神祠（为）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嫫祖、苍颉、后稷、大禹、孔子、孟子……；（乙）应废神祠：张仙、送子娘娘、财神、二郎神、齐天大圣、瘟玄坛、时迁庙、宋江庙、狐仙庙……。”元

帅林设计的某些修改亦与此有关。

## 第四章 集材兴工

### 一 择吉动土

1929年5月一个“黄道吉日”，葬仪处处长彭相廷、经理石辑五，华信工程司经理及设计师殷俊，还有建筑公司的施工人员共数百人齐聚元帅林工地，举行隆重的开工仪式，仪式包括“祭祀山神、后土、司工之神”、“燃放炸炮驱煞等例行程序，由此拉开工程“帷幕”。

在此之前，开工所需的土、石等建筑用料已在两个月前陆续运进工地，为开工作好了“准备”<sup>①</sup>。工地现场除原先保留下来的“三间草房”外，又临时搭盖一批工棚供工人食宿。还修有料场、仓棚堆放建材和工具。风水先生已确定好地宫“金井”的位置，并做好标记，开工第一锹土即从这里开始。

工程投入的人力很多，仅工人就多达“一千二百人”，内有“石匠一百，瓦匠一百，木匠六十，多从北京及沈阳招雇，力工近千人。”<sup>②</sup>力工“多在（高丽营子、营盘、铁背山等）附近乡民雇用，（还有一）部分雇自山东、河

---

① 《盛京时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九日。

②③王秀岩：《元帅林修建前后》，载《沈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164页。

北”<sup>③</sup>等地。按照当时的行规，建筑工程公司“一般不带队伍”<sup>④</sup>，就是说建筑工程司本身没有工人，只是在工程项目夺标之后由若干“包工头临时招募”。包工头是公司的外围力量，与公司有着良好的关系和信誉。他们本人“有精湛的技术，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有的“手下有长年共事的技工。”这样，一旦建筑工程司拿到工程项目，首先通知他们，并与之“签订劳务合同”，包工头们再“用取得的人工费，到工夫市场招募各种技术工人和劳力”<sup>①</sup>，并很快组成一支劳务大军。至于建筑公司的角色主要“负责施工与技术，监督工程质量，安排工人作业”<sup>②</sup>，对甲方负责。

元帅林工期确定为三年。其施工规划大约是“先内后外，先北后南”；第一年集中力量修建宝顶、地宫和圆城，第二年修方城和一百二十级石阶，第三年修外城及其它建筑。在具体修建过程中，工程进展很顺利，开工第六个月宝顶和地宫便告完成。这是葬仪处成立以来取得的首战成果，处长彭相廷遂将这一重要成绩报告给总司令张学良，张学良得报，感到十分欣慰，决定亲往视察。《盛京时报》对此事做了详细报道：

“大元帅葬仪筹备处筹备大元帅坟茔，按照东陵规模尤为高耸。现已半载，业已将坟茔之宝顶修妥，稟请张学良司令长官。前于（十月）廿二日由沈海铁路专车赴高丽营子坟地躬亲检验。晚

---

④ 《沈阳建筑业志》，第72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

①② 《沈阳市建筑业志》，第72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



八钟反省。”<sup>③</sup>

张学良总司令非常仔细地查验了地宫工程，对工程表示很满意，对现场施工人员也表示了慰问。同时，在视察过程中，他明显地感到葬仪处管理现场人员过于劳苦，与在奉机关人员相比劳逸不均，遂当场指示彭相廷采取改进措施<sup>④</sup>。

翌年六月，张学良总司令再度前往元帅林查验。《盛京时报》即时报道：

“已故大元帅二周年祭期临迩，张司令长官拟于日内赴大元帅墓地亲自查验，以便二周年祭时奉告灵前。并准备专车及随行卫队云。”

同年八月，方城等工程按计划建成。如，八月二十二日《盛京时报》报道：

“先大元帅陵墓择于沈海铁路卧龙山开始筑陵以来，业经年余，现闻该陵之宝顶、砖城以及石象、石狮等像均已建竣，只余正、配各房尚在修建云。”

此时，张学良总司令因事至北戴河，当接到工程进度报告后，立即电示航空司令张焕相，委派他代为前往视察，并代表张总司令向施工人员表示慰情。对此《盛京时报》八月二十七日报道：

“航空司令张焕相于本月廿四日晨七时，乘沈海路第一东行列车，赴卧龙山先大元帅陵视察。闻系奉张学良司令长官之令，视察陵寝建筑云。”

另外，元帅林工程开始前后，为便于运输建筑材料等

---

《盛京时报》，民国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④ 《盛京时报》，民国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需要，组织有关部门陆续修建了大车道，建造了元帅林火车站及铁路专用线。

在此之前，通往元帅林地方只有羊肠小道，根本无法通行载重大车。为此，葬仪处在筹建开工之前首先修一条由营盘至工地，全长十余华里的大车道。又雇用一批大车（骡马大车）运送建材。据 1978 年抚顺市博物馆调查：“（当时）拉料大车经常保持五十辆。”前文提到的那位水龙卧村动迁户“朱成秀”也赶着他家崭新的马车，被雇来加入运输行列，“拉运器材”。与此同时，张学良总司令考虑到将来运送大元帅灵柩需要，又下令在元帅林工地以北三华里高丽营子附近增设火车站一座。对此民国十八年四月十一日《盛京时报》报道：

“奉海铁路总经理张惠霖，奉到当局命令：筹备大元帅葬仪沿途行走跋山涉水甚为困难，拟定由奉海铁路较为便行，速于高丽营子修筑车站，以备运灵。张总理业已飭令工务处长赶速兴工，不日即可成立云。”

翌年一月七日火车站建成，将这座新站站名确定为“元帅林”<sup>①</sup>。并从“三月一日开始发售本路各站客票，以利旅行。”<sup>②</sup>另外，增建元帅林火车新站还有另一个原因，即运输建材需要。因为随着元帅林工程的全面铺开，仅有的运力越发显得能量有限，而元帅林新站较之营盘车站距离缩短十华里，可以大大提高马车的转运效率。

元帅林火车新站刚刚建成投入使用不久，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大约 1930 年八九月间，葬仪处从北京等地购

---

① 《盛京时报》，民国十九年一月七日。

② 《盛京时报》，民国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置大批古代石刻成品：石牌坊、石像生以及石碑等，这些石件每件都很重，有的石件甚至达到万斤以上，马车根本无法承载。为此决定从火车站增修一条铁路专用线，将货车直接开进元帅林工地。因为这条仅有几华里的铁路属于临时性质，故而所有筑路器材都是临时借用，比如，钢轨一项，因奉海铁路公司备用不足，葬仪处彭相廷经与吉长（吉林至长春）铁路公司经理联络，请其支援，吉长铁路慨然应允，借用六十磅钢轨“七百五十条”。彭处长即派“主任秦袖风、运输员张景瑞赴吉接收”<sup>①</sup>，由沈海铁路公司出车拉回。专用铁路路基及铁轨铺设等筑路事务亦由沈海铁路公司工务处担负，时为1930年5月。筑路工程很快完成，新修的铁路专用线马上投入使用。从而解决了元帅林修建物料运输中出现的困难，也加快了修建进度。

还有，修建工程启动之后，在环境营造方面也按总体规划同步进行，特别是植树造林方面，连续两次共植树六七万株。第一次是1930年春季，此时宝顶、地宫、圆城刚刚建成，在其外围“增植松、柏树万余株”，为此，处长彭相廷委派葬仪处刘礼书在现场“经划和监管工人栽植。”<sup>②</sup>第二次是同年秋季，方城等竣工之时，在陵园四周又栽种“松、杨、柏各种树秧五万株”<sup>③</sup>，与此同时又购置“大块条石数千枚”，“开始修筑”石路，“以壮观瞻”<sup>④</sup>。

---

① 《盛京时报》，民国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② 《盛京时报》，民国十九年五月四日。

③ 《盛京时报》，民国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④ 《盛京时报》，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 二 采办建材

按照葬仪处与建筑公司签订的工程合同规定：元帅林施工所用一切物料“皆由（葬仪）筹备处自行采办”<sup>①</sup>。为此，葬仪处要求华信工程司在设计方案中提供初步建材预算。预算包括品名、数量、市价等项。葬仪处则按照预算要求具体采办和供应。

华信工程司提出的第一批工程预算如下：

青砖：6862000 块，每块大洋 1 分 4。

石灰：5406500 斤，每斤大洋 6 厘。

石料：4090 立方米，每米大洋 6 元。

木料：35000 尺，每尺大洋 6 角。

洋灰：30292 桶，每桶大洋 6 元。

琉璃瓦：76700 片，每片大洋 5 角。

铁筋：392.5 吨，每吨大洋 160 元。

铜铁五金，共需费大洋 67180 元。

玻璃磁器玉石及出水道，共需费大洋 52965 元。

油漆涂金彩画雕刻垫土各工，共费大洋 311710 元。

合计用费：现大洋 887244 元。

以上预算未包括道路工程、河堤工程及办公经费；此项预算的价格以 1929 年（民国十八年）一月份物价为标准制定<sup>②</sup>。

在上项预算中“青砖”的需用量最大，总数高达六百余万块。不过，它属于普通建材，在沈阳、抚顺建材市场就可以采购得到，也可以直接由各窑场订制，或自己设窑

---

① 《盛京时报》，民国十九年九月五日

② 殷俊：《大元帅林工简略说明书》。

厂烧制。例如，当时沈阳最大的建筑商“多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在元帅林开工之前曾在《盛京时报》刊登招标公告，与厂家一次性标订“青砖二百万块”用于转销。元帅林所用青砖、青瓦是葬仪处自己在沈阳东山咀子设窑烧造的。东山咀子在沈阳以东，这里原是一座小村，因村北有一山岗，被劈成山口，以通行入，所以人称此地为东山咀子。此处距奉海站（今沈阳东站）约八里，在此烧制砖瓦运输十分方便。

石灰用量也很多，这种物料也可以从当地建材市场采买。

石料，可能仅指普通花岗岩，包括块石、板石等制成品和“虎皮石”（毛石）。这种石料在沈抚建材市场也很容易购到。比如，据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档案记载，元帅林所用的普通石料称之“豆压石”，产地出自抚顺“北沟”。

至于木材、洋灰（水泥）、铁筋以及其它物料绝大多数在沈抚市场都可解决。唯一需要异地采购的是“琉璃瓦件”和“白石”（指“艾叶青”和“汉白玉”大理石）。

琉璃瓦件的预算量为七万多片，这只是第一方案提出的用量，实际需要可能还要大得多。而且未包括“脊瓦”、“兽吻”、“垂脊兽头”、“仙人走兽”等多种琉璃构件在内。此种建材当时在东北地区尚无从置办得到。虽然辽南海城缸窑岭从前曾有专门为盛京皇宫、三陵制造琉璃瓦的“黄瓦窑”，其窑于清朝逊国不久改为烧造民用器皿的私窑。笔者曾到其地做过调查，据说伪“满洲国”时曾烧过一批琉璃瓦。未听说为元帅林烧砖制瓦之事。北方琉璃瓦生产基地主要在北京门头沟。元帅林所用之玻璃瓦件大约出自此处。葬仪处所以在开办伊始即在北京前门外设置办事处，与此事有直接关系。

关于“白石”在预算里未明确提及，而在原建方案却屡见不鲜。如，“头门外造连三之白石桥”、“华表一对，四周镶以白石栏杆”，头门之前造“白石五圈门之牌坊一座”，正厅月“台前装置白石联三石级”；圆城前“置五圈白石牌坊一座”，等等。这些“白石”一部分是指“艾叶青”、“汉白玉”等名贵大理石。这种大理石北方主要产地在北京房山县一带。采办大理石是北平办事处的另一项使命。

在大理石采买计划中，最初可能打算购买毛石（即未经加工的毛坯石料），运回抚顺现场再行加工、雕造。可是不久却改变初衷，以废旧石刻取而代之。原因是买毛石加工，工期长，花费多，而用废旧石刻在工期和花费方面都可省出很多。

原来，北京郊外有许多清代王爷园寝，当年它们大都修得很豪华。清朝亡国之后成为废址，许多精美的石刻被遗弃于荒野之中，而且其家主也从当年的“天潢贵胄”沦为没落的“八旗子弟”，多数人只能依靠出售家底维持生计，有的甚至将祖坟上的砖瓦石块以及随葬品拿出售卖。葬仪处北平办事处正是在了解了这一社会情形之后，调整了有关的采办计划。当然，这件大事决非办事处处长郑紫宸一人能决定得了，必须请示彭相廷。彭相廷又必须报告张学良总司令，获准后方可实施。

据抚顺市博物馆 1978 年调查，元帅林石刻主要来源于北京西郊隆恩寺清饶余郡王阿巴泰及其后裔的园寝。不过，依笔者近年考查结果，这只是其中主要一源。其它还有北京清“豫亲王”、“郑亲王”、“睿亲王”园寝以及沈阳“蔺家坟”等多源（详见下文）。可见当年北平办事处购办石料的盛况。据说在购买、拆卸王爷墓石刻时，张学良还派出了东北军，到现场维持秩序。这些石刻在拆卸、

包装之后，经过“京绥”、“京奉”、“奉海”三条铁路运至元帅林火车站铁路专线，最后运抵建筑工地。整个拆运时间持续一年有余，截至“九一八”事变还有若干石刻在转运途中，并因此而流失。

另外，元帅林还有一些青色大理石购自沈阳“奉复印版石矿公司”。这种大理石用以镶嵌宝顶。现在大家所见到的宝顶，其外皮全部以灰白色虎皮石砌造。其实，当年在虎皮石（又称“冰梅石”）之外还包镶一层这种青色石板，整个宝顶显得乌黑发亮、乌光闪烁，这些青色大理石是张学良决定购买的。奉复印版石矿公司最初为杨宇霆投资兴办。1926年卢广绩至此任经理。该厂所用石料产自辽南复县，在沈阳设厂加工，原生产石印印版，随着铅印技术的普及，石印技术逐渐被淘汰，为此，卢广绩决定产品转型，改制大理石板。当时日货挤进建材市场，卢广绩为此曾上书请求政府批准奉复印版石矿公司产品“专卖五年”<sup>①</sup>，以抵制日货。修建元帅林时，张学良出于提倡国货，指示采用该公司产品。据卢广绩后来撰文回忆说，他曾“多次”<sup>②</sup>陪同张学良至元帅林视察，查看其产品的使用效果。

### 三 设置卫队

在元帅林修建期间，为保护工程安全，防止意外发生，葬仪处决定在元帅林工地设置警察守卫队。守卫队成立经过如下：

---

① 《盛京时报》，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② 卢广绩：《回忆张学良》，载《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第8页。

1929年4月1日元帅林正式开工前一个月，葬仪处向抚顺县公安局第四区分局下达训令。训令内称：

“查高丽营子水龙卧大元帅墓地处边陲，若不设立警察守卫恐生不虞。兹拟于本年四月一日设立守卫官长、警十二名。所需饷项、服装、枪械子弹均由本处发给。其守卫警察制度仍缘公安警察制度办理，并由该分局长负责督率，仰即遵照办理具报为要，切切此令。”<sup>①</sup>

四区分局长杨玉书接到训令，一面组建卫队，一面向县局“具文报请”。县公安局长刘克羽接报，指示杨玉书“认真守卫”<sup>④</sup>，万无一失。

卫队成立后在工地四周“安插界桩”，分限内外，在出入口设卡检查出入人员、车辆。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工地。

随着工程的深入进展，警察卫队的警力日益显得薄弱。张学良渐有增派军队护守之意。由于元帅林是“东北王”之墓，当时一些热血青年将守护其墓视为平生荣耀，所以主动请缨。如，1930年5月东北讲武堂第九期毕业生、中尉学员李纪唐在毕业之际上书总司令张学良，请求批准他守护元帅林，“藉便修学”，效尤大元帅雄才伟略，以精忠报国。张学良对李纪唐之举甚为赞赏。但经查毕业学员案卷得知，李纪唐“已分发步兵十九旅”，无法变更分配方案，遂复函鼓励说：“应即赴旅任差，希图上进。”李纪唐只得“遵令赴旅报到候委。”<sup>①</sup>李纪唐虽然未能如愿以偿，却也为获得总司令亲谕和教诲而倍感荣幸。

在修建元帅林过程中，由于警卫队忠于职守，所以未出现大的治安事件，而且有些工作很出色。比如，在限制

---

<sup>④</sup> 《抚顺县公署》档 10919 号。



新闻记者实地采访方面就是如此。当时《盛京时报》等社会媒体发表了许多有关新闻报道，鲜有第一手资料，多是葬仪处官员们“传出消息”，更没有现场工作照刊登发表。这一方面说明当局对此有严格规定，另一方面说明警卫队遵章守纪，严密守护所至；在对待外国人参观方面也是如此。当时，有关部门规定，凡是外国人前来参观，必须得到相关方面批准，警卫队方可放行。例如，1931年6月，日本总领事馆向外交部驻辽宁特派员办事处提出申请：“拟往抚顺参观先大元帅林墓。”外交部批准后函告葬仪处，葬仪处随即通知元帅林“墓葬工程处”处长石辑五，令其接待，并“敬备中国餐，略伸地主之谊”，又差派主任秦袖风伴同前往，“以便指导”<sup>①</sup>。当然，万无一失也是不可能的，在元帅林治安方面也曾出现过些小的事件。如1930年1月数九寒冬，工程暂时停顿，工地只有少数人看守。这时采购部门“运到砖瓦及大宗木料”。结果在存放过程中出现了“偷减情形”<sup>②</sup>，守卫队发现此事后马上报告，为此葬仪处长彭相廷不顾严寒特从沈阳前往视察。第二天又“派委员王吉忱驰往”<sup>②</sup>元帅林，具体调查处理此事。

#### 四 兴隆地面

在元帅林开工修建同时，尤其是工程初具规模之后，总司令张学良出于展示先大元帅的“伟烈、尊隆”起见，决定在元帅林附近开辟小城镇，修街道，建市场、学校、花园，修公路，以“兴隆地面”。将元帅林建成一座集城镇、交通、商业、教育各业具备的崭新陵区。

---

①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10册，第470页。

②② 《盛京时报》，民国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首先，将元帅林区域由最初征地时的“八百十一亩九分七厘”，扩展为“方圆四十里”<sup>③</sup>，也就是说林墓周围十里“皆划入墓地范围”。<sup>④</sup>

其二，改变山水地名。将铁背山改名为“铁龙山”，将铁背山左右之水龙沟改名为“水龙卧”，将赶马河改为“赶龙河”<sup>⑤</sup>。除此之外，又更改了一些地名，如，“龙岗镇”<sup>⑥</sup>、“卧龙山”<sup>⑦</sup>、“兴隆山”<sup>⑧</sup>等。

其三，开辟“龙岗镇”。如，《盛京时报》报道：

“省府主席因大元帅坟地龙岗镇地方繁励，特行商诸张学良副司令同意，将该镇地亩计有数千亩出放街道，以资兴隆地面。业由省府派员前往该镇实行勘仗云。”<sup>⑨</sup>

文章未指明“龙岗镇”为何地。但是元帅林周围十余里内“地方繁荣”莫过于第四区公署所在地“营盘”。所以，龙岗镇大约是营盘的新地名。

其四，设立“市场一处”<sup>①</sup>，以发展地方贸易，便于游人购物。

其五，“设立花园一处”<sup>②</sup>，以美化环境，供人们休息。

---

③④⑤ 《盛京时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九日。

⑥⑨ 《盛京时报》，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五日。

⑦ 《盛京时报》，民国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⑧ 宁恩承：《回首百年》，第174页，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①②④⑥ 《盛京时报》，民国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其六，设置“护陵卫兵”<sup>③</sup>，计划兵力为“一（个）团”<sup>④</sup>。

其七，在“陵园内设立中、小学（校）各一所”，以发展地方教育，培植人才，总司令张学良“特拨现款四十万”作为建校经费。还计划将元帅林“陵园内外各事”全部交由“该校校长管理。”<sup>⑤</sup>

其八，修铁路和公路。起初，为便于游人观瞻，计划修“轻便铁路”<sup>⑥</sup>一条，还计划从沈阳东木厂至元帅林修专线公路，主要目的是便于运送大元帅灵柩。后以公路“行走跋山涉水甚为困难，拟定由奉海铁路较为方便”<sup>⑦</sup>，公路建设计划暂停。1931年6月，以“陵内工程已大部告竣，将来安葬后前往参观者必大有人在，乘沈海铁路往返多不便利，乃于沈阳、元帅林间开辟汽车路”，并于6月“16日着手测量设计建筑，订于十月前竣工。”<sup>⑧</sup>

但是这幅“兴隆地面”的宏伟“蓝图”，却因“九一八”事变，只能永远“定格”在历史档案之中。

## 五 撰著碑铭

张学良虽然在审查元帅林原设计方案时将碑亭一笔勾销，然而，却将为父帅树碑立传、功垂贞石视为天经地义。只是聘请哪位文豪撰写这纸碑文，却令他颇费一番脑筋。

当时，许多文人甚至一些高官都主动表示愿为张大帅献写碑铭。原因是用这种文体赞颂张大帅功绩和表达哀

---

③⑤同上，民国二十年七月十七日。

⑦《盛京时报》，民国十八年四月十一日。

⑧同上，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八日。

思，再是希望被勒之贞珉，流芳百世。例如，在举行公祭张大帅的追悼会上就有七位官员人等敬献了碑文，公祭之后，张学良命其秘书谈国桓将包括碑文在内的祭文编成《张大帅哀挽录》一书印行。不过这些碑文作为张大帅神道碑文还不可能。所以，直至1930年末元帅林修建已进入后期，撰写碑文之事还是没有找到理想人选。

是年十一月张学良接受蒋介石之邀，前往南京列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有人向他推荐“当代名儒”陈伯严，建议请他恭撰此文。

陈伯严，名三立，江西义宁人。清光绪十五年进士，官至吏部主事。父陈宝箴亦为晚清名宦，官至湖南巡抚。父子二人曾参与“戊戌变法”，变法事败，父子双双被革职。后来，陈伯严曾任“南浔铁路总理”。因抑郁不得志，退职还乡，“退居白门，吟诗娱老。”时有江苏总督端方，一向“喜近名士”，尤其敬重陈伯严之为人，请其为僚客，并打算推荐其入朝为官。为陈谢绝。“孤忠独行，一时无匹”，“高卧匡庐”，“罕与人通”，被世人称为“散原老人。”<sup>①</sup> 陈伯严的诗文亦“名满天下”，时人称赞其“诗有唐、宋人风韵；文则法方、姚，足与马春昶颉颃”<sup>②</sup>。晚年多寓居沪、宁。

张学良久慕陈伯严“文章道德”，遂差派副官某人前往上海拜访，请其为张大帅“撰一墓志，并敬致一万三千（现洋）为寿”。然而，万万未料到的是他的副官竟吃了“闭门羹”。陈伯严答复说：“身为清季遗民，誓不与民国官员为文字著作。虽酬重金不变厥忠”。副官见状则进一

---

①②陈魁一：《睇向斋谈往》，第14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步表示说，这是张学良“副司令之意”，希望他能给面子。接着又对陈伯严说，此项“墓志”只不过“叙其家庭间事，俾传示子孙，永为先德之纪念”<sup>①</sup>而已。至于张大帅之伟绩，各方面撰者已经不少，“不必更烦燕许大手笔也。”<sup>②</sup>可是尽管副官巧言如簧，陈伯严坚意“不从”。副官只好“怏怏”<sup>③</sup>而退。这件事使张学良十分不快。

1930年初，张学良决定聘请辽沈著名文豪钟逊安撰著碑铭。

钟逊安（又作“■安”、“逊庵”），名广生，钱塘人。清光绪十九年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因案受牵被发配新疆。在疆期间巧遇著名文人王晋卿（王树楠），拜其门下研习“古文字”<sup>④</sup>。不久，编撰《新疆图志》，从此“文誉渐起”<sup>⑤</sup>，后随营口道尹佐荣叔章至辽东。继而至吉林、黑龙江入两省督军幕府为幕僚。钟氏“久客滨江（哈尔滨）”，亦时常来奉，与著名史学家金毓黻交往甚厚。被委以《奉天通志》编辑。“九一八”事变后移居北京，1935年故于京寓，年仅六十岁。

钟逊安“古文卓著，声闻于辽沈间”<sup>⑥</sup>。尤其擅长撰写碑文墓志，所著很多。他与张学良亦有交往。如，1929年他为哈尔滨文庙撰《哈尔滨文庙碑志》<sup>⑦</sup>，张学良亦为

---

①②③ 《盛京时报》，民国二十年二月五日。

④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3539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

⑤⑥同上，第3558、3559页。

⑦ 郑乃元、高慧敏：《哈尔滨文庙揽胜》，第17页，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

该庙写有《碑记》<sup>①</sup>。钟氏对张学良聘其为先大元帅拟写碑文之事甚为欣然，并很快制成《大元帅张公神道碑铭》。（见附录）文成之日钟氏向张学良“索取金万元”<sup>②</sup>。可谓“一字千金”。史学家金毓黻读罢其文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文“颇有声光”，“笔健如平淮西碑，出乎（其师）晋卿、北江诸先生之上。”<sup>③</sup>

1931年秋元帅林工程基本就绪，作为“画龙点睛”的神道碑已然备好，选定清代和硕豫良亲王的汉白玉石碑。此碑制于清季盛世乾隆时期，石质精良，雕工细腻。然而正当石工将原碑碑文磨去，准备刊刻之际，突发“九一八”事变。树碑立传之事也不了了之。如今，无字空碑被立在一隅望山兴叹，而那篇价值万金的“碑铭”也成为一纸空文。

## 附录：大元帅张公神道碑铭

东三省西带榆关，南襟渤海，北负白山黑水以为固，势若高屋之建瓴，天下无事，可端坐而理之，有事则举足以为轻重，然非有盖代非常之人，不足以临其上，西向而与天下争衡。洪维我大元帅张公怙冒东土十有七年，东省之人，蕃然生息以托命，其下文武将吏，奏奔御侮，戢戢共

---

① 同上，第16页。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540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

③ 同上，第3559页。

戴一尊，用能德洽于生民，威加乎海内，其中盖有天焉，而非人力所自至者，于呼伟矣！

溯公之生，当晚清季年，四方多故，豪杰角出，独公以雄武之姿，居有为之地，徒步仗剑，不数年而崛起临溟。鼎革之际，地方糜沸，赵公尔巽以捍卫之任属公，公于是立保安之会，以靖反侧。共和肇造，项城当国，遂领二十七师，屹然为东方重镇。洎枋军政，巡阅三省，乃报求贤才，足兵食，弼成内政，为统治东北之大计。会河间总统命公总制边防军，拱卫近畿，南援相粤，公于是慨焉抱澄清之志，而将有事于中原。十年之间，五度入关：一平直皖之争，再报奉直之役，复转战居庸，逐西北军于银夏边外；其间定三齐，下江南，戡河朔之地，进略中州。奉军旗帜，飞扬半天下，北方将领戴为盟主，奉上大元帅玺绶，摄行国事。然后行庆施惠，布赦庸勋。盖自民国以来，不阶尺土，而创建大业，声施烂如，覃及中外，殆未有如公之比也。

间尝旷观史册，自古振奇之人，若项之霸楚，苻之兴秦，沙陀之王晋，风云吐纳，不以成败而没其雄才。况公慨国疆之分裂，哀民生之多艰，欲以公天下之心，拨乱世而返之正，其规模阔远，不私一人一家之旨，皎然明白，以视嬴汉晋唐群雄角逐之所为，回若不侔。曩者甲子一役公与合肥执政，中心总理相缔结，掎击贿选政府，号曰三角之盟，而公当战胜之余，迎中山北上，三同盟者大会于天津，揖让周旋，肇新中国未有之局，实自公启之。其后毅然布令罢兵息民，全师东归，

皆所以敦尚旧盟，完成夙志，公之心迹，已可昭告于国人，而惜乎祚命弗佑，皇姑屯上，乘舆不戒，中道崩殂，天欤人欤？万方同慨！此则国家之不幸，而非公区区一身之不幸也已。

公生于逊清光绪乙亥二月十二日，薨于民国戊辰四月某日，享年五十有四。为人熊肩虎步，机警过人，貌言温温，可近而说，及其喑呜叱咤，辟易千人，处料兵机，无不中其綢繆，应对东西粼外交，历十余年未尝有蹉失，成三省铁路千余里，商工阜通，农产山积，远方之氓，辐辏而襁至，及今士大夫之东游者，观其人恬物熙，叹为乐土，至比之五季时吴越钱氏云。

公讳作霖，字雨亭，先世为山东钜族。清道光朝，始迁海城。祖讳发，生四子。其三子讳有财者，公之考也。妣邵，继妣王，有子三人，公最少。元配赵夫人，先公卒。继配卢夫人，鏊室许夫人、王夫人。生丈夫子八：学良、学铭、学曾、学思、学森、学俊、学英、学铨。女子子六：首芳、怀英、怀瞳、怀青、怀曦、怀敏。孙闾珣、闾季、闾琳。女孙闾瑛、闾娥。

长公子学良，年十八，已追随兵间，英武有大志，常领三四方面军团，麾城拊邑高勋。迨缙丕绪，问慕和平，卒成先志，克完国家统一之基。善夫子輿之言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论者谓公艰难缔造，能以弘业贻子孙，而不能善庇其身，岂非成功之难，而天意之不可必哉。乃天畀公以继述之人，使未竟之业，绵而勿替，诞而益隆，则推公之心，其亦可



以无憾矣！公薨之三年庚午，学良就任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其明年辛未，山陵筑成，将奉公灵輶卜葬于抚顺某某之原，爰立丰碑，树之墓道，苍琢而铭之。

铭曰：维清有家，辽之西东。谁其代兴，霸气如龙。在项城也，盛报而圯。豪宗大藩，裂疆纷起。桓桓张公，秉钺有度。功盍一匡，威加八埏。当其作始，缮固东北。剂窳药羸，藏锋敛锷。蛰极而伸，飚发霆骇。如虎出柙，如鲸入海。乃事中原，耆定尔功。内安其人，外固吾封。吾封有瘡，非蛇非豕。或监我脑，或箝我尾。公曰■之，严我封塹。彼敢吾濒，威熏賂□。嘻乎危艰，忍此敦磐。脰马鞬弓，万古一棺。大星熊熊，陨于沈水。生赫有闻，歿为世诤，奠兹幽宫，作述攸隆，鼎籀钟铭，以诒无穷。

## 第五章 遇变停建

1931年下半年元帅林工程进入尾声。葬仪处开始策划“落成典礼”和“奉安”大元帅灵柩等项事宜。初步安排“七、八月间”举行“落成仪式”，“十月”举行“奉安典礼”<sup>①</sup>。《盛京时报》等新闻媒体亦将此消息即时刊发。可是不久“最高当局决定”，为隆重“奉安”张大帅，在礼仪举行“前数月，拟成立（由政府要员及社会名流组成奉安）筹备委员会”<sup>②</sup>。然而，到了七月葬仪处又“传出消息”说，落成典礼暂时不能如期举行，原因是工程“尚有一部未竣”<sup>③</sup>。而且，“葬仪筹备一时未能完备，”<sup>④</sup>落成典礼和“奉安大礼”推迟到“十二月举行。”<sup>⑤</sup>后又改为十一月二十四日（农历十月十五），而且送葬路线及途中祭奠等事宜均安排就绪。结果，因日寇突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使这一切永远失之交臂。

9月18日深夜，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人所为，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开炮袭击。随即占领沈阳城，进而侵占全东北。制造又一起中外皆惊的事件——“九一八”事变。

“事变”发生之际，国民革命军副司令张学良驻守于北

---

① 《盛京时报》，民国二十年五月三十日。

② 《盛京时报》，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九日日。

③ 《盛京时报》，民国二十年七月十二日。

④⑤ 《盛京时报》，民国二十年七月十二日。

平，沈阳方面的防务由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代理。日寇侵占沈阳第二天，墓葬工程处经理石辑五已得知消息。因电话已无法接通，只得派人紧急赶回沈阳了解实情和请示办法，当时的沈阳已陷入一片恐怖和混乱之中，葬仪处机关人去楼空，大帅府被日军霸占，张氏家眷纷纷逃入附近小南天主教堂避难。来人设法找到葬仪处副处长郑天顺，郑天顺自处长彭相廷辞职后被从北京调回沈阳主持工作。郑天顺请示参谋长荣臻，荣臻决定元帅林暂时“停止修建”<sup>①</sup>，等待时局恢复再做计议。石辑五接到通知，立即向修建公司方面说明情况，修建公司随之将施工人员撤离、工人遣散。石辑五只留少数几人看守工地。遂后返回沈阳商讨善后事宜。

日寇占领沈阳之后，为使其侵略“合法化”，一面指令袁金铠、于冲汉、金梁等人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成立所谓“奉天自治会”，任命袁金铠为会长，制造奉天“独立”、“自治”，与“中国政府断绝关系”<sup>②</sup>。一面策划组建傀儡政府，以实现其长期霸占东北的野心。袁金铠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要员，与张家往来密切，而且是“大元帅丧礼筹办处”副委员长。彭相廷、郑天顺、石辑五等人得知袁金铠被日人信任倍至，便想因势利导利用这一特殊关系，乘机将大元帅安葬一事了却，收拾元帅林残局。于是找到袁金铠，袁金铠立即应允，只是要求一切从简，不要过于张扬，以免受到日人干预。于是，在地方维

---

① 王秀岩：《元帅林修建前后》，载《沈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164页。

② 姜念东、伊文成、吕元明、张辅麟：《满洲国史》，第9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

持会半明半暗的支持下，由张作霖旧属“阎廷瑞”<sup>①</sup>出面，为张大帅发丧。计划通过奉海铁路用火车将其灵柩运至元帅林草草安葬。十一月二十五日，葬仪处派人至“小南关华盛棚铺”雇“三十二人大杠”<sup>②</sup>和鼓乐。又至慈恩寺、太清宫请和尚、道士诵经，寺庙方面因避时局曲言回拒，诵经一项只好免除。可是，正当一切准备就绪，甚至已将“灵柩”从帅府抬出之际，被日方发觉，日人强令制止。结果事情半途而废。此事《盛京时报》连续两天“跟踪”报道。第一天所用标题为《张作霖今日出殡》，第二天标题是《张作霖中止出殡》，“中止”原因是“特殊关系”。

但是，彭相廷、郑天顺、石辑五、阎廷瑞等人并未灰心，又找到袁金铠商量对策。袁金铠提出，日人既然出面干涉，事情必需征得其同意。随即袁金铠与葬仪处共同出面面见日本关东军司令，请其网开一面。然而，心怀叵测的日军司令表面上一口许诺，而当问及具体办理出殡时间时却支支吾吾不予表态。葬仪处因已得到日方口头准许，遂又开始预备“奉安”。对此，《盛京时报》十一月三十日又作如下报道：

### 张作霖重又将安葬

“已故张作霖前传二十五日出殡安葬，旋因特殊关系中止，已志本报。兹闻张作霖葬仪筹备处传出消息，该处已准备安葬事宜，由该处郑副处长办理，惟日期未定云。”

可是，当葬仪处再次找到日方，“办理”出殡事宜时，

---

① 阎廷瑞曾任吉黑樵运局长等职。

② 《盛京时报》，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他们先是拖延，继而是回避，最后是一反前态，明确警告说：不准将张作霖葬进元帅林。而且流露出威胁、仇视的神态和语气。彭相廷、郑天顺等人再去找袁金铠时，袁金铠亦借故避而不见，郑天顺、石辑五等人感到不妙，恐身受迫害，遂潜藏隐避，不再公开露面。

日军占领张氏帅府之后，将其财物掠夺一空。其中包括“四百条大条黄金、二百万银元”，还有“宋朝的刻丝屏风、王大令（王羲之）的真迹”<sup>①</sup>等价值连城的国宝。又将张作霖的灵柩从大帅府迁出，送至大东门外“珠林寺浮屠”。另外，为杜绝后患，日军又派飞机将元帅林宝顶炸塌<sup>②</sup>。此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又假惺惺地致电张学铭说，帅府所有财产及父陵均妥善保护，如派人索取将如数归还。为此，张学良在北京顺承王府官邸召集其大姐冠英、二弟学铭、三弟学曾、四弟学思、堂弟学成共议此事。张学良气愤地说：“国土都沦陷了，还要那些破乱（指财物）干什么！只是父陵要葬。”

这时，彭相廷四处奔走，前往长春（伪新京）找到张作霖的“把兄弟”、时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张景惠。张景惠了解日本方面忌讳将张作霖葬于元帅林的背景，所以提出迁葬海城驾掌寺张家祖坟。然而，却遭到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严厉拒绝，理由是海城为张作霖发迹之地，葬在海城和葬元帅林无异。而且，这时的海城地方绅士们纷纷上书要求将张作霖归葬故里。葬海城无疑会促进

---

① 宁恩承：《回首百年》，第171页，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抚顺市志》，第一卷，第34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反满抗日”情绪。于是张景惠又提出另一方案：改葬锦县驿马坊张家另一处祖坟坟地。日方迫于舆论压力，尽快消除张作霖的影响，尽快摆脱这个问题的困扰，同意了张景惠的要求。不过，日方提出一个条件：在迁葬仪式中官方不能出面，而由所谓群众团体伪“协和会”组织实施。张景惠遂将这些情况通过彭相廷转告张氏家族，张学良只好同意，他授意其亲属吴廷奎回奉办理此事。

1937年（伪康德四年）6月2日，由伪奉天协和会组织的“张作霖遗体代行埋葬委员会”请来各寺庙和尚、道士在沈阳珠林寺举行“超度”亡灵仪式。第二天正式迁葬，这天恰是张作霖遇难九周年“忌日”，上午匆匆举行“慰灵祭”之后，立即起灵。张作霖的阴沉木棺槨由专车运至火车站，再用火车运往辽西石山子车站。伪总理张景惠、彭相廷等人亲自送葬，日方派来十多名军人参加，实为监督。送葬队伍中除张作霖的生前友好之外，还有一些僧侣和鼓乐人员，他们沿途诵经奏乐，还有打着“万民旗”、“万民伞”以及挽联、花圈的人群，排列有一里多长。当日抵达驿马坊，下葬于墓地。至此，完成了这次迁葬。为张作霖划上了一个艰难且又不完整的句号。

另外，有几件相关的事情有必要加以说明。

其一，凡论述元帅林历史的资料无不称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基本竣工，不过究竟建至何种程度却未见具体记载。史学家金毓黻在元帅林停工第三年曾会同日本古建筑专家杉村勇造等人到元帅林考察。金先生在其日记里详细叙述了元帅林的面貌。现摘录于此，以便参考。

“（浑）河之北于平地起三培楼（指山岗），中高而左右俱低，俗称水龙坞。中部即张公玄堂（地宫）之所在也。自南而北始为平地，建石坊一

于正面，再进则为南外门，入门地甚敞夷，中有石坊，再进则为祀殿之门（指方城门），进门中为祀殿，左右为配殿，外有垣，环之成正方形。过祀殿而北，地渐隆起，左右树二石表甚竣，中为白石甬道，逐次而高，凡十层，每层十二级，共一百二十级，上有翁仲，横列为四。拾级而登，玄室隆起为圆顶，如帝王陵，中有路，直造室内，内为圆形，如穹庐，中有石床，以置棺，门有石扉，床侧饰以石人，尽为人残毁矣。玄室亦有垣绕之，惟缺其前面耳（指正门）。祀殿门前（指方城门）石料纵横，中有石坊、石马、石狮、翁仲，多为前代制，有极佳者……”<sup>①</sup>

文中“玄室亦有垣绕之”，“玄室”指地宫；“垣”指圆城；“惟缺其前面耳”，指没有圆城正门。此门可能是日本人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年出动飞机炸宝顶时将其炸毁，因为此门作为主体工程不可能未建。因为避讳时局金毓黻未敢明言。

其二，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为什么恰恰在元帅林建成而未举行“落成”仪式、筹备“奉安”而未实施的“空当”？这是巧合，还是有意？从未见研究日寇侵华史的专家们论及。不过，依笔者拙见，日寇在选择“事变”时机时一定把元帅林作为一个条件考虑。由此联想到，“事变”发生前三个月“日本总领事馆”人员至元帅林“参拜”也并非孤立的举动。

其三，关于郑天顺、石辑五等人的去向，人们一定都

---

<sup>①</sup>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3299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

很关心。石辑五自藏匿之后，因未见日人追究，便悄悄将其全家迁至业已荒废的元帅林隐居，依靠开荒种地维持全家生计，暗中为保护元帅林效力。艰难地熬过伪满十四年和三年国民党统治，迎来了解放。据 1950 年的档案记载，当时年近花甲的石老先生依然在元帅林居住。大约 1954 年修建大伙房水库时迁居它处。此后不知其行迹。至于郑天顺先生，自 1931 年隐遁之后，去向不明，笔者编写此书时曾下力查寻，一直未找到他的行踪资料，很可能早已离开沈阳去了平津？



# 下篇 盛世繁兴

## 第六章 保护历程

### 一 建国初期

元帅林经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前后将近十七年的统治、破坏，尤其是伪满时期，日军侵略者出于对张作霖的仇视，为彻底消除一些人奉安张作霖于元帅林的打算，先是1932年派飞机将元帅林宝顶炸成一个大洞<sup>①</sup>；又于1936年下达命令“将（元帅林）拆毁”<sup>②</sup>。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被当地“营盘警署制止”<sup>③</sup>而幸存下来；另外，日本大批旅行者出于对张作霖的仇怨，在参观时也动手将元帅林部分建筑破坏<sup>④</sup>。所以，至新中国成立前元帅林已是断壁残垣，几成废墟。

1948年10月31日抚顺解放。对元帅林的管理权从此回归人民手中。同年11月，根据安东省政府命令，成立

---

<sup>①②③④</sup>俱见解放之初档案记载。

抚顺市、县两级政府，“实行县、市分治”<sup>⑤</sup>。元帅林地处县境，归属抚顺县政府管辖。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国家从连年的战争状态刚刚转为承平，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政府工作千头万绪，加之干部政策水平不一，所以对元帅林的文物保护工作一开始曾出现过漏洞。据《辽宁省文物志》、《抚顺市志》等书记载，1950年6月，“沈阳市一私营大理石厂”<sup>①</sup>缺乏生产原料，听说抚顺元帅林有许多大理石“建筑石料”<sup>②</sup>散置各处，遂派人与抚顺县政府联系购买。由于县政府领导忽略文物保护政策，误以为这些石料与其闲置不如卖掉，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增加政府收入，于是“未经请示报告”<sup>③</sup>上级部门，便“擅将”<sup>④</sup>元帅林石料卖给该大理石厂。同年7月13日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签署政府令，下达《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办法的指示》<sup>⑤</sup>文件。8月3日辽东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就此事”做了调查和公开处理，对有关人员分别作出处分决定<sup>⑥</sup>。

读了《辽宁省文物志》和《抚顺市志》的相关记载，给人的印象是：元帅林石料业已被沈阳某大理石厂非法买走，甚至成了他们的生产原料，案件木已成舟。因此，对

---

⑤ 《抚顺市志》，第一卷，第593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① 《辽宁省文物志》，第78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抚顺市志》，第一卷，第7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④⑤⑥ 《辽宁省文物志》，第78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抚顺县政府有关责任人分别作了处理，元帅林的历史遗物也因而造成了严重损害。

然而，笔者最近在辽宁省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查到“案件”的档案原件，了解到事情的真实过程，发现这只是一桩“未遂事件”。有必要对《辽宁省文物志》、《抚顺市志》加以更正和补充，避免以讹传讹，出现更多的误解。

据档案记载，抚顺县政府有关领导确实已批准将元帅林石料出卖给沈阳永发私营大理石厂。不过，当永发大理石厂派汽车将元帅林石料运出约五十公里，至沈抚交界处的“噶布公路检查站”时，却被值勤检查人员发现，他们当即将汽车和石料全部扣留，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使辽东省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即时掌握了这桩严重违纪事件，并当即派人进行调查，最后对抚顺县政府相关责任人分别作出处分决定。至于石料自然是物归原主，重新运回元帅林，未使元帅林历史文物造成损失。

同时，上级领导部门即时将此事作为向广大干部加强历史文物保护的反面典型事例进行宣传。有关方面也接受教训，加强对元帅林文物的保护力度。辽东省政府监察委员会还明确提出，对元帅林内外所有一切建筑及存在之古迹石材等，责成当地县、区、村人民政府负责妥为保管，勿再使之遭到任何破坏。抚顺县政府为落实上级指示，对元帅林的管理落实到区、村，由其派人监管，避免元帅林建筑再遭到乱拆、乱毁等破坏，使之暂时维持现状。政府还提出，保护元帅林的意义和目的在于将来将其作为“考古之用，而且又能保存民族文化遗产”。

《辽宁省文物志》、《抚顺市志》所以在记述此事时出现失实和纰漏，可能是由于编写史志人员未能查到档案原

件，仅据案卷文件目录所至。

1952年9月辽东省人民政府下令“撤销抚顺县建制”<sup>①</sup>，原抚顺县辖区分别被并入抚顺、沈阳、本溪、铁岭、清原等市县。元帅林所在地的原抚顺县第四区划入抚顺市郊区，市政府成立农林局管理郊区农村工作。1953年市政府将郊区调整为抚西、抚南、章党、五龙四个区，元帅林归属于章党区管理。

1954年国家为根治浑河水患，变水害为水利，决定在抚顺市以东修建一座大型水库。经过勘测与设计，决定将水库大坝修建在一处名叫“大伙房”村的位置。所以，将水库命名为“大伙房水库”。水库东西长近30公里，南北最宽处为4公里。库区面积110平方公里，蓄水量为22亿立方米。1954年动工，1958年9月建成合龙。元帅林前半部的头门、方城、正殿、东西配殿以及部分外城处于水库淹没区。为此，辽宁省文化局对元帅林采取的保护措施为，沿水线以下建筑拆迁，104高程以外的“遗址或墓葬保存于原地”<sup>②</sup>。所以，有关部门找到张学思同志（张作霖之子）并向他征求意见。此时张学思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他对国家修建水库、造福于人民之事表示十分支持。在征得张学思的同意后，“将方城的前门、中门、东西配房和部分方城墙拆除”<sup>③</sup>。

---

① 《抚顺市志》，第一卷，第7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辽宁省文物志》，第13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 王秀嫣：《元帅林及其保护》，载《文物研究文集》，第21页。

保留圆城、宝顶、地宫、一百二十级石阶及部分外城等主体建筑，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行修复。

## 二 铁背山公园时期

1956 年抚顺市政府决定，将元帅林拨交抚顺市园林管理处<sup>①</sup>，启建铁背山公园。公园以“元帅林为主景”<sup>②</sup>，包括铁背山山林、历史古迹、明清历史石刻以及大伙房水库水景等，计划在此建一座大型综合性公园。

公园正门计划设在元帅林以北的进“山口”处，此处北距沈吉铁路仅一公里，游人可乘火车至营东或铁背山车站下车前来此地游览。为增添公园气势，计划将北门建成古代陵门风格：以石牌坊为门，道路两侧摆列石人石兽。此时大伙房水库建设工程正处于紧张阶段。元帅林前半部建筑陆续拆迁。修建北门所需要的各种石刻也已运抵目的地，准备组装安设。至于公园的其他工程也相继进行。为此，1958 年政府为公园“投资 6.8 万元”<sup>③</sup>。重点用于元帅林修复，修复的主要项目为圆城正门、侧门的“三个门楼和围墙瓦面”<sup>②</sup>的翻修，再者是修筑从营东火车站至公园之间的“土路八万平方米”<sup>③</sup>，以利游人交通。另外

---

① 《抚顺市志》，第 3—5 卷，第 492 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② 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第 257 页，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 年。

③②③ 《抚顺市志》，第 3—5 卷，第 492 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年。

“植树四万多株”<sup>④</sup>，以美化公园环境。

1958年9月大伙房水库正式建成，开始拦河蓄水。铁背山三面成为一片碧波，铁背山公园从此又增添一道亮丽的水景。然而，随着水库的建成，有关部门投入公园的费用也减少了，造成公园资金短缺，一些“工程项目也随之停顿”<sup>⑤</sup>。

此时，大伙房水库管理局在水库竣工后，开始改善库区环境，先后在“小青岛”、“莲花岛”建成两处风景点，而且计划在水库周边开辟其它几处新景观。这项计划受到抚顺市政府的支持。市政府考虑到铁背山公园因为资金缺乏难以发展，再者是铁背山公园地处大伙房水库东北角，属于水库范围，于是，在1960年把铁背山公园移交给大伙房水库管理局<sup>⑥</sup>。

1962年抚顺市政府又从整个城市建设发展方面考虑，决定按照行业进行归口管理，对公园归属进行统一调整，因此又将铁背山公园，还有小青岛、莲花岛这些新建的景区景点统一拨交给抚顺“市园林管理处管理经营”<sup>①</sup>，并将其“作为风景区（发展计划）的基础”<sup>②</sup>，使抚顺的城市规划建设工作有新的起色。

1963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而抚顺市在公园建设方面却“继续有所发展”<sup>③</sup>。不能不说行业归口的做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64年市政府又决定，将原属于铁背山公园的“铁背山一百六十七公顷山林，（重新）划归铁背山公园，因而使铁背山公园的规模又有恢

---

④⑤⑥ 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第257页，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①②③ 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第257页，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

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元帅林亦受到一些破坏，一百二十级青石台阶被毁，大量石板被人揭起“运走”<sup>④</sup>，不明下落，圆城“东西门楼和门牌楼”亦被“破坏”<sup>⑤</sup>，“墓室、石刻等遭到严重破坏，石刻受损尤重”<sup>⑥</sup>，有的石刻甚至被砸碎。公园处于“无人管理”<sup>⑦</sup>状态。到处“杂草丛生”，石刻“东倒西歪”<sup>⑧</sup>，一片狼藉。“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混乱状况才得以缓解。

### 三 铁背山石刻管理所时期

1973年抚顺市人民政府将铁背山公园划归抚顺“市文化局”<sup>⑨</sup>，并在铁背山公园基础上成立“铁背山石刻管理所”。

这次在业务性质方面的调整主要出于以下背景和原因。

1971年国务院下达文件，对全国各条战线进行整顿，作出“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三项指示，

---

④ 姜明文：《张作霖元帅陵（林）简介》，载《大东文史资料》第二辑，第94页。

⑤ 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第262页，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⑥ 王秀嫣：《元帅林及其保护》，载《文物研究文集》，第21页。

⑦⑧ 沈济文：《抚顺旅游概览》，第100页，抚顺市社会科学院，2002年。

⑨ 《抚顺市志》，第3—5卷，第49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以扭转“文革”的混乱局面和经济建设的严重失秩。翌年，辽宁省革委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sup>①</sup>。抚顺市革委会为贯彻中央及省指示精神，考虑到铁背山公园是以元帅林历史文物为主景，将其作为“园林”管理，在业务性质的取向上不够恰当，不利于文物保护，也难于发挥其所长。遂决定改变定向，将其划归文化部门管理。

其二，1973 年秋，国家文物保护研究所古建筑专家祁英涛同志来辽宁检查古建筑维修情况，发现元帅林有一批明清石刻。他在仔细查看这批石雕后提出：“这批石刻作为艺术品仍有价值，应加以保护。”<sup>②</sup> 省、市文化部门“十分重视专家意见”<sup>③</sup>，决定对元帅林采取进一步保护措施。措施之一，对元帅林定向方面确定以石刻为主；措施之二，将其并入担负文物保护、文物研究职能的抚顺市博物馆，成为市博物馆的一个分部。

抚顺市博物馆建立于 1969 年，最初是图书、博物两馆合一。1973 年图书、博物两家开始分署。博物馆接收元帅林石刻之后，对元帅林的文物保护先后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将“文革”期间“被砸坏、散落于各处的石刻集中起来，待以后有条件时逐步做好复原工作”。同时开始“整理、收集相关业务资料”，做一些业务基础、业务积累工作。

---

① 《辽宁省文物志》，第 795 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②③ 王秀嫣：《文物研究文集》二，第 21 页，辽宁省老年文物研究会，1992 年。



第二，开展调查研究，深入考察元帅林历史及石刻来源。1978年，随着“文革”十年的远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浪潮如日中天，文博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当时，元帅林虽然只有五十年历史，但有许多事情已成疑问，尤其是石刻的来历问题，很少有人能知其底细。实践证明，只有搞清楚文物来源，才能认识它的历史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为此，抚顺市博物馆将元帅林石刻来源的考察列为本年度的重点任务。

当年2月15日，抚顺市政府公布铁背山石刻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几乎同时，以馆长王秀岩同志<sup>①</sup>为首的“抚顺元帅林历史及石刻调查组”一行也整装出发。

调查组行程的第一站是沈阳，然后是北京、南京。他们先后考察了“明孝陵、十三陵、清昭陵、福陵、明景帝陵”<sup>②</sup>；走访了张学铭（张学良胞弟）、卢广绩（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沈延毅（沈阳文史馆馆长）、刘开渠（著名雕刻艺术家）、王家祯（全国政协委员）、陈大章（北京市政协委员）、刘荣章（北京故宫老石匠）等一批知情人及石刻专家。据卢广绩、沈延毅两位先生说，这些“石刻是张学良花钱买的”<sup>③</sup>。张学铭先生则进一步说是“买清

---

① 王秀岩：又名王秀嫣。1975年至1983年任抚顺市博物馆馆长。

② 王秀岩：《元帅林修建前后》，载《沈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167页。

③④王秀岩：《元帅林修建前后》，载《沈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168页。

代王府坟上的”<sup>④</sup>。北京周围清代王爷坟很多，石刻具体出自那位王爷坟呢？正当调查陷入困境之时，老石匠刘荣章师傅的回忆，使调查出现了转机。刘师傅说，他记得“曾从过去北京的古董商胡九斋那里听说：张学良从北京龙门寺拆走八架牌坊，运往东北，为张作霖修坟”<sup>⑤</sup>。经查阅文献史料得知，所谓“龙门寺”实为京西石景山区五里坨的“隆恩寺”。于是，全组开赴隆恩寺展开实地考察。

隆恩寺原为金代大定四年（1164年）秦越公主所建的古庙，名昊天寺。明朝正统四年（1439年）太监王振重修，改成今名，王振还将这里辟为太监墓地。清朝顺治三年（1646年）饶余敏亲王阿巴泰（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将该处辟为茔地，阿巴泰第四子岳乐亲王等人的园寝也都建造于此。当年，这些亲王府园寝修建得很奢丽，设有大量汉白玉石雕。调查组在地方政府热情帮助下，很快找到一些知情老人，如朴瑞祥、董长富、朴万泉、朴士英、朴玉贵、潘双泉<sup>⑥</sup>，他们确证“民国十八年（1929年）张学良在这里‘买走’石人、石兽、石牌坊”<sup>②</sup>的史实。而且，他们之中多数人都“亲自参加（过）拆卸这批石活”，并回忆了一些当年的工作细节，比如，拆卸时担心运输中受震动损坏这些石刻，一律“用麻将石刻缠起来”，运输使用的车辆是“用六十四匹马组成一个链车”，将石刻运到二十里外的“三家店火车站，再经火车运往东北”。当时参加拆卸这些石刻的共“有一百多名农民”，前后共

---

⑤ 同上，第167页。

⑥ 王秀岩：《元帅林修建前后》，载《沈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168页。

“拆运了八个月”<sup>③</sup>。调查组还将随身带去的石刻照片请老人们辨认，也得到他们的确定。至此调查工作圆满完成。调查组在总结这次考查成果时归纳以下几点认识：

（一）元帅林石刻大部分来源于北京隆恩寺及清代饶余敏亲王、安亲王和明代太监坟上。

（二）石刻年代：大部分是明代和清初，少量清中、晚期。

（三）饶余敏亲王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岳乐是阿巴泰的第四子，号安，封亲王，故称安亲王。

（四）隆恩寺始建于金代大定四年（1164年），秦越公主建，名昊天寺。明正统四年太监王振重修，改名隆恩寺。这里原有大定年间碑一，明正统年间碑三。从隆恩寺运往抚顺的这批石刻内确有金代石碑一，碑志：大昊天寺妙行大师行状碑。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元帅林现有明代太监张佐、窦忠等人的碑，以及碑文被乱掉、字迹模糊的明碑数块。证明了元帅林石刻确系来源于隆恩寺。

（五）石刻运往抚顺的时间。1929年5月开始修建元帅林，据张学良的卫士陈大章回忆，当年秋季他和张学良到元帅林看坟地，尚未见到有石刻。隆恩寺的石刻拆运了八个月。由此推断，石刻运到抚顺的时间应是1930年。”<sup>①</sup>

在这次调查研究基础上，经过缜密工作，建立了石刻档案。

第三，筹建石刻陈列展览。为筹建石刻陈列展览，抚顺市文化局专门从北京请来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现场指导。设计人员在专家们指导下，

---

① 王秀岩：《元帅林修建前后》，载《沈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168，169页。

“设计了将六十二件各类石刻精品”，包括石人、石兽、石饰件于圆城内围绕宝顶陈列的方案。对此，省、市文化部门先后拨专款三万一千元用于陈列筹备工作。他们“用这笔款项进行了石刻的搬运、安装”，“维修了圆城城墙，铺设了甬道，接通了电源，修建了公厕，栽植了花木等”。并“千方百计节省开支，有些项目靠自己动手分文不花”。他们“开动脑筋，利用一架小石牌坊为门，门楼两侧以影壁浮雕做装饰，门前石阶两侧摆放一对小石狮子，使这些设施与陵园风格浑然一体”，取得很好的铺陈效果。馆长王秀岩在回顾这次艰巨的陈列工作时不无感慨地说：市博物馆的青年同志“在测绘、安装等项工作中”，“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智慧”<sup>①</sup>。

197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铁背山石刻”正式对外开放。精美的石刻艺术品第一次开放陈列的消息由新闻媒体迅速传开，“省内外游览参观者络绎不绝，”<sup>②</sup>游观者赞不绝口。故宫博物院杨伯达副院长无限感慨地说：“在祖国的大地上又增加一处古代石雕艺术展出阵地。”<sup>③</sup>

第四，成立“铁背山石刻文物管理所”。1978年10月有关部门鉴于铁背山石刻被抚顺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石刻来源也已基本清楚、石刻档案健全完备、石刻陈列展览初具规模等条件，为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正式批准成立管理机构——铁背山石刻文物管理所，定编为

---

①②③ 王秀嫣：《元帅林及其保护》，载《文物研究文集》二，第22页，辽宁省老年文物研究会，1992年。

“四人”<sup>④</sup>，具体实施管理。

第五，修缮元帅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改革开放。为此，省、市政府加大了对铁背山石刻文物管理所修缮资金的投入，开始修复元帅林。

先是1981年市政府拨款万元修葺“圆城城墙、石牌坊台阶以及进山口的道路”<sup>⑤</sup>。在此之前石牌坊下的石阶已经酥碎，这不仅与石刻陈列很不协调，而且危及石牌坊的稳固。而且，进山道路凸凹不平，严重影响旅游车辆通行。这次修缮使这些状况开始得到改变。

再是1983年至1984年的修复，这是元帅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修复工程。省、市财政为此“拨款87万元维修经费”<sup>⑥</sup>。抚顺市政府对这次大修非常重视，成立了由市政府秘书长任总指挥，市文化局局长任副总指挥的“元帅林工程指挥部。”<sup>①</sup>大修主要项目有“墓门、墓室（包括彩绘）、陵园的南大门、一百二十级石阶、东西门楼等。还修了一条专线公路”<sup>②</sup>，等等。据主持这次大修工程的原抚顺市文化局副局长赵杰同志撰文回忆说：“修缮之时，

---

④ 《抚顺市志》，第3—5卷，第84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⑤ 王秀岩：《元帅林修建前后》，载《沈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170页。

⑥ 王秀嫣《元帅林及其保护》，载《文物研究文集》二，第22页，辽宁省老年文物研究会，1992年。

①② 王秀嫣《元帅林及其保护》，载《文物研究文集》二，第22页，辽宁省老年文物研究会，1992年。

在议定圆城的修缮方案时，颇废了一番心思，因为此陵当年初具规模没有完工，时过半个世纪，不仅没有原来的设计资料，而且园城正门已毁于雷火，面目皆非，我们仅能借助一张（某学校）师生们在门前的毕业合影（照片）来设计了。”<sup>③</sup> 现在游人们所见之正门就是这次重建的成果。这次大修工程历时两年，“基本恢复了元帅林的本来面貌。”<sup>④</sup>

#### 四 元帅林文物管理处时期

1985 年铁背山石刻文物管理所改称“元帅林石刻文物管理所”，并从市博物馆析出，“机构单设”，成为与博物馆并列的文博机构。编制也由四人增至“八人”<sup>⑤</sup>；1988 年前后又晋称为“元帅林文物管理所”；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又升格为“元帅林文物管理处”。这些变更使其在业务性质方面逐步寻找到了更准确的定位。抚顺市政府所以进行如此调整，主要是出于对元帅林历史价值的深刻认识及其在统战工作方面的作用和需要，也是为适应深入改革开放发展旅游文化的新形势，再是有了 1982 年至 1983 年对元帅林全面大修的物质基础，还有 1988 年被辽宁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原因和条件。

元帅林文物管理处成立前后，对元帅林保护和开发方

---

<sup>③</sup>赵杰：《张作霖家族的三座墓园》，载《文史精华》2002 年 3 期，第 26 页。

<sup>④</sup>《抚顺市志》，第 3—5 卷，第 492 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年。

<sup>⑤</sup>《抚顺市志》，第 3—5 卷，第 840 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年。

面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元帅林做进一步修缮和保护。为此，省、市政府相继拨出维修经费，截至 1991 年底统计，“已拨专款 130 万元。”<sup>①</sup>

其二，开发“龙头”新展区。“龙头”是指外城以东的一片开阔地。因其三面临水，形成向前探伸的半岛地形而得名。从前，此地蒿草齐腰，灌木没人。仅在东侧边缘处孤零零地存有石碑基座和龙趺。

如今，这种荒凉景象早已一去不返。

龙头新区的全面开发工作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如，笔者在元帅林调查时从圆城外一角发现一块“建设控制地带”标志碑，其碑文如下：

保护范围：东至城墙外二百米，西至水面，  
北至水面。

建设控制地带：东三百米以内为 1 类。

抚顺市文管委员会

1989 年 5 月 1 日立

元帅林自 1988 年 12 月 20 日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标志碑显然是地方政府落实文保单位措施而立的。龙头地区即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之内。

龙头开发主要是修建“关东碑林”、“明清石刻苑”以及造园等三项工作。

关东碑林一事，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即着手筹备。首先是向国内各位书法名家征集有关元帅林、有关抚顺为主

---

<sup>①</sup> 王春兰：《话说元帅林》，载《抚顺社会科学》1992 年 4 期封 3。

要内容的书法作品，然后选择优良石材和聘请石工高手将其刻制成碑。1996 年在龙头中心建造一座占地三千平方米的仿古庭院式建筑，陈列展览这批书法艺术精华。

明清石刻苑一事，是将原陈列在圆城内的石人、石兽等六十余件石刻艺术精品，从圆城迁移出来，因为元帅林建筑复原之后，这些石刻继续存放在宝顶周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影响元帅林历史复原效果，因此决定将这些石刻艺术精品移至龙头。这批石刻分别组成两组陈列。即，将小件石雕艺术品组成“明清石刻苑”，石人、石兽组成“石象生”，加之龙头原地还有三甬清代石碑，三者共同组成石刻陈列系列，而且其性质、风格也协调一致。

在造园方面，按照统一规划和设计进行，内容包括铺种草坪，栽花种树，修园路，设石桌、石凳，修一些园林小品等。使龙头地带成为一处与林墓相关配套、风格协调的园囿，成为游人欣赏艺术、休闲漫步的好去处。

其三，建设北门。修建北门的计划早在 1958 年之前已有打算，而且将建筑用的石牌坊、石像生等都已运到北部山口现场。后因资金短缺和机构变动等原因而搁浅。20 世纪 90 年代初元帅林文物管理处决定修建此门。门的形式采用古今合璧，将在此沉睡了三十余年的一架清代四柱三间雕刻精美的白石牌楼作为园门。在石坊右侧修了一座以“元帅林”三字的汉语拼音字头“YSL”组合造型的“彩色导游壁墙”，上面绘着元帅林全图。道路两旁整齐高大的乔木如同“仪树”，列队迎候游人光临。



## 第七章 建筑现状

国家为保护元帅林，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投入修缮经费高达百万元以上，经多次精心修缮，使之历史原貌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 一、外城

外城是游人从北门进入景区最先接触到的建筑。城墙高大，炮楼威耸，大有壁垒森严之势。

此城原是南北大于东西的长方形砖城<sup>①</sup>。内有方城和圆城，所以称之外城。今仅存其北半部。现经实测，城墙“东西宽 280 米”<sup>②</sup>，南北长约近 200 米。墙体由“青砖砌筑，三合土罩面”。所谓“三合土”即石灰、黄土及砂子混合。高 3 米以上，底部厚度将近 1 米。东墙正中及西北墙角各开随墙门一处，东门是游人出入之门，又是通向龙头展区的门户，西北角门是通往招待所之门。东北、西北两城角各有圆形青砖炮楼一座，炮楼向墙角外突出半圆，上部高出城墙一米有余。是护陵兵■望守卫之所，也是张作霖生前最喜好的一种建筑。

据传，当年边业银行大楼修好之后，邀请张大帅前往视察，他边走边看，甚为满意，但是他说：“这房修的很好，只是四角上没有炮台，有点不像样子。”原来，东北塞外多匪，乡村富农大户为自卫，多在房宅四周修土围子

---

① 有些资料称为方城，不对。

② 《抚顺城建档·元帅林档案》。

和炮台。张大帅久居绿林，习见这种建筑格局，习惯成自然，对炮楼颇有亲近感。于是，建筑商为取悦主人之好，在银行大楼四角各加上一座炮台，样子尽管有点不伦不类，却也是“客随主便”。1925年平息郭松龄反奉之后，张大帅再次来到边业银行，并登上他喜爱的炮台，边向远望边说“郭鬼子若打进来，凭这四个炮台还可以打他妈一阵子呢”<sup>①</sup>。元帅林修的这些炮楼是为了迎合墓主人生前的喜好，还是实用需要，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 二 圆城

走进外城便可见到一座形如北京天坛似的圆形城堡，此为圆城。圆城有正门及东西侧门。

圆城“直径130米”，圆周长400余米。墙体“以条石砌筑基础”，石基之上“用青砖砌到顶”。墙顶正中起脊，前后两坡各砌以小黑瓦及沟头、滴水。墙体高度各随地势，而上顶则保持水平一致。只有后半部围墙有一段样子颇为不同：正中一段最高，其两侧稍低，再下则与正墙高度等同，经实测，最高处4.3米，第二级高3米，第三级（正墙）1.7米（从墙内测量），这种墙式在建筑术语中叫“三级叠落式”，又叫“防火墙”，以防山火从墙外窜入圆城危及宝顶。这段防火墙不仅造型有别于正墙，所饰瓦件也与正墙不同，全部以绿色琉璃瓦盖顶。城墙全部“以水泥罩面”。另外，为加固墙体还在墙外每隔一定距离设一三角形戗垛。

圆城正门坐北面南，单檐歇山式建筑，共三间，大木

---

<sup>①</sup> 宁恩承：《回首百年》，第171页，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架结构，顶铺绿色琉璃构件，顶瓦、正脊、大吻、戗脊、仙人走兽清绿一色。梁架、斗拱、檩枋俱施以彩绘，门窗、房柱俱施朱漆，门为屏风门，每间对开四扇。门下为高大的台基，门前设有石阶三路，上下共十二级，两侧有护栏，护栏栏柱、栏板、柱头精雕细刻。石阶两侧立有玉石雕刻巨型石狮一对，为正门增添了威武气势。正门左右各有随墙袖壁，壁墙用白石砌成，壁心浮雕瑞兽等吉祥图案，下为须弥座，顶为歇山式。是正门的烘托和陪衬。

东、西侧门，顶为单檐歇山式，门为一间拱形券洞式，经实测进深4.25米，宽2.93米，门扇为红色对开木门两扇。门顶铺设绿色琉璃构件。门两侧亦有随墙袖壁，制同正门，只是体量稍小，门外有石阶。

近年人们发现，圆城内有一奇特现象：即在环境安静之际，一人面壁讲话，其他人不管站在圆城内那个位置，只要贴墙附耳，均可听得十分清晰。据说北京天坛的“皇穹宇”就有这种传声现象，俗称其“回音壁”，其“奥妙是由于声波在圆形或大的光滑凹面体型里，会产生沿边传递的现象。回音壁的形状宛如一个圆筒的大缸，而且墙壁又非常光滑和严密”，“使得声波只能沿着围墙向前推进，不易漫散。”<sup>①</sup> 圆城之墙是“磨砖对缝”，十分严密，加上城的形状也是圆形，所以它与北京天坛有同样的回音现象。游人到此不妨一试。

### 三 宝顶与地宫

#### 1. 宝顶位于圆城中央，由大小三层圆形平台重叠而

---

<sup>①</sup> 王成用：《天坛》，第82、83页，北京，北京旅游出版社，1987年。

成，顶层平台向上凸起馒头形丘冢。宝顶“直径60米”<sup>①</sup>，下层平台高1.95米，周围以石块砌成“冰梅墙”。所谓“冰梅墙”是用形状不太规则的毛石石块砌成，砌造时其外面尽可能找平、石块之间的缝隙用水泥勾抹连接，其面形成“冰梅纹”，或“虎皮纹”，所以又叫“虎皮墙”。平台周围设有护栏，护栏为方座球形栏柱，以花岗石雕成，直径0.5米。两栏柱间距为3.35米，中间横穿上下双行铁栏。台上以彩色石子镶嵌成“蝙蝠、狮、松、鹤”<sup>②</sup>、“鹿、麒麟等吉祥图案”，还有排水沟及出水兽头。平台正面面对圆城正门处辟有一门，为地宫入口。东、西、北三面各设台阶。台阶均为三路，中有垂带相隔，中路宽2.87米，左右各宽1.87米，台阶下口左右各置石狮一只。

第二层平台直径30米，高2米，墙体亦砌成冰梅式。周围亦设护栏，栏柱为方形，高0.84米，两柱间距2.8米，中间以铁链连接。

三层平台直径约15米，高近2米，亦为冰梅墙体。平台之上凸起半圆形土冢。土冢直径近15米，高约5米左右。

这种圆形多层重叠式宝顶不仅古代陵墓中少见，现代名人墓也稀有。

2. 地宫，位于宝顶之内。墓门开在第一层平台正南面，门框以石砌成，横梁上装有四个“门簪”。墓道笔直，“与地表同一水平”，共分为二段，第一段长“15米”。第二段

---

① 《抚顺城建档·元帅林档案》。

② 《辽宁文物古迹大观》，第159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长“7.8米”，共有“三道石门，均为汉白玉制成。”<sup>①</sup>第一道墓门为对开两扇，每扇门上嵌有兽面铺首，兽面尺寸0.22×0.3米，兽面恶眉瞪目，张着大口，令人望而生畏。地宫内为半圆球形“穹顶”，穹顶呈暗蓝色，如同阴暗的夜空，上面装点着惨白色的“日”、“月”、“星辰”及“水浪浮云纹”。据说这些天象当初建造之时用的是“飞毛铜”<sup>②</sup>镶嵌而成。“飞毛铜”又称“风磨铜”，是一种贵重金属，其颜色如同黄金，相传北京故宫皇极殿的殿顶用的就是这种珍贵金属，著名的“宣德炉”也含有它的成分。风磨铜产于泰国，为古代泰国贡品<sup>③</sup>。日伪统治时期，这些珍贵之物被人挖去。现在所见到的是用油色填补。门楣上的图案最为古怪：正中是一白发洋人头像，头像好似头戴“荆棘冠的上帝”<sup>④</sup>，又好似西方“女神”。头像两侧饰有宽大的卷草和枝叶，旁边各有一“手持橄榄枝”<sup>④</sup>的安琪儿（英文：angel的音译，原意为“天使”）。这些图案亦为白色。据说其中的几个头像原是用银子制成的，当年与“风磨铜”一起被人盗走，今俱“荡然无存。”穹顶之下，蓝天尽头与墙裙交接处绘有一圈白色水纹，水纹下为朱红色缠枝纹边。

地宫正中设有石床，经实测，长2.9米，宽1.35米，厚0.17米，高0.58米。周围有雕饰，只是已残损不全。石床之下有“金井”。关于“金井”的说法很多，有的把它说得很神秘。比如，有人说它是“海眼”，下通江河；

---

①赵杰：《元帅林》，载《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第194页。

② 赵杰：《元帅林》，载《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第194页。

③ 台北《故宫文物月刊》，总32期，第6页。

④④郝武华：《元帅林风景区简介》，第3页。

有的说“里边有水”，有的又叫它“金井玉葬”，里边随葬有宝物。不过，金井里边葬有随葬品的说法倒确有其事。例如，慈禧太后在察看为她修建的裕陵时，便把她最珍爱的一副宝石手串亲自投入金井作为镇物，以后又派首领太监往金井里放置一些金玉宝器。还有1980年有关部门清理光绪皇帝地宫，从金井里发现一块精美的怀表，一枚人的臼齿，还有一包重约半斤的黄土。怀表和臼齿是光绪本人遗物，黄土是挖掘金井时的原土。

关于金井其实并不神秘，不过其做法确也非常麻烦。据王其亨先生研究，金井实际是地宫的中心点，称为“穴中”。①。在穴中之旁立上标志，尔后在穴中和标志上面搭盖“吉土罩棚”②，将其遮盖。修地宫基础时将穴中周围的土全部撤掉，只留一座上收下敞的圆形土桩，土桩有一人高，土桩顶上正中还留下约二尺高小土柱，这二层土桩的名字叫“原山吉土”③，打地基、铺修地面时原山吉土的下层被修在地面之内，地表上最后只留下二层土桩。然后安装宝床，宝床的正中央凿出一个与二层土桩同样大小的圆孔，宝床正好坐在土桩之上，然后将圆孔中的桩土掏出，再盖上一特制的石盖，这就成了“金井”了。

元帅林地宫也有“金井”，不过比较简单。如，设计师殷俊在其设计方案中说：“（要在）灵座下面（修）长方井空堂，以透地气，而联络龙脉也。”可见，这里的金井不过是一座用砖石砌成的“地坑”而已。与皇陵的金井不同。

置身于这座阴沉沉的地宫，真的好似进入了传说中的

---

①②③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第186、192、193页，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

“冥冥世界”，令人感到有些恐惧，也有一种隔世之感。

3. 地宫门外陈设有石碑坊、石五供、石拜垫。石碑坊为四柱、三间、三楼。明间（即正中一间）面宽3.25米，左右两次间各宽3米。坊柱下为正方形，顶部为圆形，上面各有蹲狮，二柱间以梁枋相接，梁枋中间有“花板”，上面雕刻“轮、螺、伞、盖、花、罐、鱼、肠”等佛家“八宝”图案。石柱之下有三角形的“戗角石”，石上刻有圆形花纹；石五供为炉、香瓶、烛台等五件供器。以炉居中，炉为三足，鼓腹，双耳，全高1.9米，其中座高0.63米，炉径0.7米。炉身浮雕二龙戏珠纹，炉内立有万年柱，柱身浮雕升龙、祥云、海水江涯等图案，升龙龙头采用高浮雕手法，显得尤为活龙活现。香瓶全高1.7米，其中座高0.6米。瓶为鼓腹侈口，瓶内亦立有石柱。烛台全高1.65米，内座高0.85米。烛台为瓜棱形，顶部亦立有柱，为象征性蜡烛；石拜垫，长1.25米，宽1.1米，厚0.12米，上面浮雕云纹及海水江涯图案，四周边框饰以云草纹，是祭陵时主祭者跪拜之处。

#### 四 一百二十级石阶及纪念碑

石阶位于圆城正门前，原是山下方城与圆城之间的阶梯，现在是通向水库码头的往来通道。石阶随山就势，坡度约 $50^{\circ}$ 左右，分为东、西、中三路，中路宽6米，东西两路各宽约2米，三路之间各有独立的护栏扶手，两排扶手栏杆之间为泄水水沟。石阶共120级，每12级设一缓步台。石阶上端，四组护手栏头各立文臣武将雕像一座，居高临下，十分威武。下端，中间原来立有石狮一对，修大伙房水库时被移至山上，今石象生中的石狮当属其物？石阶两厢沿山体修有三角形“龙虎砂护墙”。“龙虎砂”

为风水术语，指陵山两侧之矮山为“砂”或“护砂”。“龙虎”取义于传统文化中的“四象”。即，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龙虎砂护墙可保护山体和石阶免受山水冲刷。此项石阶又名“千级石阶”。用“千”形容石级之多，并非为实数。这座石阶仿自沈阳东陵（即福陵）。原设计是一百零八级，后改为此数。如今还有些资料仍称其是一百零八级。

纪念碑，立于一百二十级石阶之下左右两侧，轮廓为方锥形，经实测柱体全高为 13.68 米，通体用白石砌成（一说用花岗石）。其下为正方形基座，长、宽均为 2.7 米，高近 0.3 米，周围雕有回纹连续纹饰。基座之上为碑体，为确保碑体的稳固以及造型需要，又在碑体下部与基座相接处的四角砌有护座，每个护座高 1 米左右，护座与碑体交接处四面各雕有“花箍”，形如“花圈”，又似古代的“三宝珠”纹。碑体实为十二面“+”字形，由下而上渐做收拢，顶部四面各出三角形尖，每面柱尖雕有一枚五角星军徽。四面柱尖正中坐有 high 约 1.5 米棱形顶尖。许多资料称此碑为“华表”或“石表”，唯有抚顺市城建档案称其为“纪念碑”，想必另有所据。而且从其造型来看，与西方一些无名烈士碑也有相似之处。再有，其上面所饰的“军徽”、“花箍”也类似纪念碑装饰。所以，称其为纪念碑是确实可信的。另外，此碑的高度也诸说不一，有“14 米”、“15 米”甚至“30 米”等多种记载，今据档案更正。



## 第八章 明清石刻

### 一 明清石刻苑

明清石刻苑位于石像生展区东侧，龙头新区中心。这里地势平坦，绿草茵茵，背靠丛林密障，环境清幽静谧。所展出的石雕精品主要有“莲花元宝石盆”、“透孔石窗”、“碑座”、“蟠龙圆柱”、“香插”、“麒麟狻猊石屏”、“天马浮雕”、“双鹿石屏”、“火焰宝珠”、“丹陛”、“石雕八宝（螺）”等数十件明清时期石刻上品。各个造型生动，层次分明，雕工洗炼，玲珑剔透，令人叹为观止。是欣赏、研究明清石刻艺术的难得之处。现简介其中部分代表作品。

#### 1. 莲花元宝石盆

全高 1.4 米，最大围径 2.03 米。造型独特，以“元宝”、“金钱”堆积而成，如同一座“须弥山”。其下为一瓶式宝盆。“元宝”之数共为五十二枚，“金钱”之数共为四十八枚，其堆积之法是将“金钱”堆在里边，“金钱”之外隆堆“元宝”，形成透过“元宝”缝隙可见“金钱”的造型。外观所见“元宝”、“金钱”共百枚。

#### 2. 透孔石窗

石窗为长方形，下半部为半圆形窗板，上半部为半圆形透窗，透窗孔为“古钱套”纹。此纹饰是用古铜钱相互连接成纹。铜钱是古代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因此又成为“吉祥物”，被广泛应用于吉祥图案。这种纹饰在清代建筑中常见使用，特别是门，窗的窗棂，它是通过“古钱环环

相套作四四云连续”<sup>①</sup>，以钱孔为透光和通风孔。纹饰整齐美观，非常实用，而且寓意富贵和吉祥。

这件石雕据北京西郊隆恩寺地区乡民于 1978 年辨认，是清代饶余郡王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园寝一牌楼上的窗户。

### 3. 碑座

碑座为正立方形，大约长、宽、高各为 1.5 米左右，四面浮雕祥云、海水、江涯等图案，顶部四边呈斜角，下部为矮座。

此碑座据北京西郊隆恩寺地区乡民于 1978 年辨认为清饶余郡王阿巴泰园寝遗物。参证北京清醇亲王府园寝（位于海淀区妙高峰附近）之“侧福晋颜札氏墓碑”<sup>②</sup>，两者碑座相似。表明此碑座出自饶余郡王阿巴泰侧福晋碑。

### 4. 蟠龙圆雕

圆雕高 0.4 米，直径 0.9 米。上面浮雕蟠龙图案，其中的龙头采用高浮雕法向上凸起，呈立体状。

“龙”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一种古代动物造型。其实龙是古人综合几种动物“再创造”或者说是想象中的“动物”。而且是经过了漫长历史时期才形成我们所见到的一些龙的造型和龙的图案。龙的主要特点有“九似”：龙头似骆驼，角似鹿，眼似鬼，颈似蛇，腰似蜃（也是龙的一种），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传说中的龙有超乎自然的神威和能力。身躯可大逾百丈，小可缩而为寸；能飞腾九霄，能深潜海底；能行云布雨，能兴风作

---

① 左汉中：《中国吉祥图像大观》，第 259 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 年。

② 《燕都》，1990 年第 3 期，第 8 页

浪。所以被称为“四灵”、“四方”之神。并且认为大海、大江、大河均有“龙王”、“龙君”掌管。又将封建帝王作为龙的化身，称皇帝为真龙天子，宫殿称为龙廷，衣袍称为龙袍，坐墩称为龙墩，并且把龙纹广泛绘画或雕刻在皇帝所用器物之上。

龙的纹饰造型很多。如，团龙、行龙、升龙、降龙、蹲龙、正龙、坐龙、蟠龙等。

团龙，是蟠屈成团形图案，有正团龙、侧团龙和其它团龙的变形。

行龙，是作行走之势的龙，有挺首向前、回首后顾等姿势。

升龙和降龙，飞腾上升之势曰升龙，头下尾上者曰降龙。

蹲龙：形体作蹲伏姿势之龙。

蟠龙：龙体蟠绕在殿柱曰蟠龙，还有两龙互相缠绕，名蟠结龙。

所以，这件“蟠龙圆雕”在纹饰上不宜称为“蟠龙”，而应称为团龙或正团龙为恰当。

#### 5. 香插

高0.8米，长、宽各为0.38米。造型为方斗形兽耳炉，内插一圆形万年柱，上面浮雕灵芝、海水江涯等纹饰。

此物应称香炉，为五供之一。

#### 6. 麒麟狻猊石屏

石屏全高1.62米，长2.30米，厚0.25米，图案中央是一头大麒麟，二上角各有一头小麒麟，两下角各有一头狻猊。下部衬托海水江涯、松、竹等吉祥图案。

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奇动物，也是仁慈和吉祥的象

征。其图案很多，如“麒麟送子”、“麒麟吐书”等。

狻猊即狮子的原称。《穆天子传》称：“狻猊日走五百里”，它和麒麟一样都是传说中的神兽。寓意吉祥和驱邪避祟。

## 7. 天马浮雕

全高 1.2 米，长 1.95 米。画面上为一匹狂奔的飞马。其旁有松、竹、梅、灵芝等图案。

马也是六畜之一，以形体高大健美、奔驰迅速、腾跃有力，便于驯养而普遍用于生产生活乃至武备和战争。古代战争由于马匹的使用而大大提高了战斗力。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古代绘画、雕刻、工艺等的通常题材，如，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唐太宗昭陵六骏等都是马匹题材的千古名品。古代吉祥图案也有不少以马为名目者，如，“马上封侯”、“马到成功”、“猴儿拉马”、“八骏图”等。

马上封侯，为猴骑在奔跑的马上，后面有蜜蜂追撵，取“马上蜂猴”谐音。

“天马”为吉祥图案常见的造型。天马图案有“天马行空”、“天马进宝”等名。天马的形象有马踏流云疾行，有肋生双翼的飞马。

这件天马浮雕据知情者辨认，为北京西郊隆恩寺清饶余郡王阿巴泰园寝大殿内的壁画。

## 8. 双鹿石屏

画面上雕有双鹿，一雄一雌，雄鹿跷首远望，雌鹿低首觅食。周围有松、竹、灵芝、山石等，石间流水潺潺，花草铺地，充满生机。

鹿在古代被誉为“长寿仙兽”。《抱朴子》一书有“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的记载。古人还认为千

岁之鹿称为“玄鹿”，能吃到玄鹿肉可以活到二千岁。所以在表达祝寿、祈寿为主题的绘画、雕刻中都少不了鹿。还有，古人习惯用谐音表述吉祥和祝愿。鹿与“禄”、“路”语音相谐。“禄”的含义是福气，以鹿为禄的吉祥图案很多，如“福禄寿喜”等；“路”指道路、宦途。这幅双鹿图案寓意“路路顺利”。

### 9. 火焰宝珠

造型如同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正中，是一颗银色的“宝珠”，宝珠四周焰起炽热的“火焰”，其下为“宝莲座”。

火焰宝珠的造型常常和龙相匹配，如“二龙戏珠”、“赶珠龙”，前者是两条龙共同追逐一只火焰珠，与其嬉戏；后者则是一条龙追撵疾速滚动的宝珠。这种图案在古代建筑、古代器物上非常多见。

这件石刻据知情者辨认，为北京西郊隆恩寺清饶余郡王阿巴泰园寝的一牌坊构件。清代皇陵确有一种名曰“火焰牌楼”的建筑物，又名“龙凤门”，这种牌楼一般也是四柱三间，与其它牌楼无大区别。只是在左右两稍间横梁上部各装有一颗火焰宝珠。据说是象征“逢凶化吉，皇族兴旺”<sup>①</sup>。

### 10. 花柱

全高2.48米，其中座高0.58米，周长1.56米。柱为通体浮雕圆型直柱，下为须弥座。“周身精工浮雕佛教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肠。八宝中间有杂宝

---

<sup>①</sup> 陈宝蓉编著：《清西陵纵横》，第1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图案。”<sup>①</sup> 还有缠枝、海水江涯等纹饰。雕刻十分精美。

“佛教八宝”又名“八吉祥”，是佛教用来表示吉祥的八种代表性器物，最初流行于印度，元代开始在我国传播。佛家理论认为它们各有自己的含意和法力：

轮：表示佛法圆通永转，万劫不息；

螺：代表菩萨正果，玄妙吉祥之音；

伞：代表佛法张弛自如，遮救众生；

盖：代表佛法覆盖三千世界，免受一切毒焰之害；

花：代表佛性纯洁，出污泥之世而不受沾染；

罐：代表佛行福智，圆满而不缺漏；

鱼：代表佛性活泼水生，解脱坏劫；

肠：代表佛缘回环贯彻，决无阻滞不通之境<sup>②</sup>。

缠枝纹是以花草为基础综合而成的一种写意纹饰，作为主体的陪衬。

这件石刻经知情者辨认，也是北京西郊隆恩寺清饶余郡王阿巴泰园寝某“牌楼（顶上）两边的”<sup>③</sup> 饰件。

## 二 石像生

石像生景区位于外城东门内外道路两侧，计有文臣、武将、牵马小吏、石骆驼、石狮、石羊、石虎及石望柱等七对。排列严整有序，气势肃穆凝重，如同仪仗，如同石雕艺术长廊。

---

① 郝武华：《元帅林风景区简介》，第7页。

② 李仲元：《纹饰典故》，第11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③ 王秀嫣：《元帅林修建前后》，载《沈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168页。

1. 文臣：应称“朝臣”<sup>①</sup>，高3.2米，座高0.15米。头戴“五梁冠”，身穿朝袍，双手捧持笏板，雍容尔雅，神态温良恭顺。“朝袍”宽衣大袖，为汉唐时期盛行的“大袖衫”；“笏板”又名手板，古时上自天子，下至士皆备此物。其材质依地位不同而别：《礼记》记载：“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为上朝时书写奏章之用，以防面君时遗忘或读错。如同今天的“发言稿”、“备忘录”。

在陵墓设文臣雕像，寓意文治昭昭，皇朝巩固、昌盛。

2. 武将：亦称“朝臣”，身高3米，座高0.35米。头戴兜鍪（盔），身穿铠甲和战裙，足登战靴，双手拄着竹节钢鞭，气宇轩昂，威风八面。竹节钢鞭盛行于宋代，属于短兵器，使用时可以击打，也可以刺杀。元明之后此器被淘汰于正规武器行列之外，成为非“制式装备”，被列入民间使用的“杂兵器”<sup>②</sup>。

武将雕像寓意武功烈烈，皇朝疆域辽阔、巩固等意。

3. 牵马小吏：史称“内臣控马”<sup>③</sup>，即牵马太监。全高2.1米，人高1.73米，马身长2.8米，宽1.4米。马呈站立状，马体壮硕，浑厚，控马人头戴壮士巾，左手挽着马的缰绳，右手撩起衣带作控马状，神态朴实憨厚。

---

① 清·孙承泽著：《春明梦余录》，第1364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② 邓旭著：《中国古代兵器图册》，第59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③ 清·孙承泽著：《春明梦余录》，第1364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因为马能跑善奔，将其作为疆域辽阔无边的象征。

4. 石骆驼：高 1.4 米，身长 2.7 米，宽 1.25 米，座长 2.6 米，宽 2 米，高 0.25 米，呈跪伏平卧状，昂首远望，四蹄内屈，驼峰双凸。

骆驼为吉祥动物之一。俱有强健有力、坚韧不拔的特征，善于在沙漠中长途跋涉，被誉为“沙漠之舟”。

骆驼雕像寓意坚忍，耐力，承载千里。

5. 石狮：高 0.95 米，长 1.85 米，宽 0.88 米，呈伏卧状。

狮子，又名“狻猊”，毛发旋卷披垂颈上，突目炯炯，阔口半开，锋牙利齿，胸肌健壮，性情凶悍，猛烈无双，被称为“百兽之王”。

古人认为狮子雕像具有“驱邪避崇和镇墓作用”。

6. 石羊：高 0.92 米，长 1.80 米，宽 0.88 米；座长 1.7 米，宽 0.7 米。呈跪伏状。抬头前视，双角后卷，显得悠然驯服。

羊为六畜之一。六畜即牛、马、羊、豕、鸡、犬。羊与人的生活十分密切，也属于吉祥动物。石羊寓意国泰民安。

7. 石虎：高 1.4 米。座长 1 米，座宽 0.65 米，座高 0.2 米。呈蹲立状，前面双腿直立，后面双腿屈曲，昂首竖耳，瞪目前视，长尾卷曲，似为蓄势待发。

虎威猛无匹，与狮子势均力敌，亦被称为百兽之首。如《说文》释虎曰：“山兽之君也。”石虎寓意威猛强势。

8. 石望柱：高约 5 米，座高 1 米。柱身平面为八角形，上面布满雕云纹，卷草及狮子滚绣球等图案。底座为须弥式。

石望柱是古代陵墓中用在神道上的石刻，史书上有



“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所谓“神道”是修在墓前的一条专门用来供墓主“神灵”行走的道路。古代从皇陵到民间墓葬都如此设置，差别在于规模大小不同，装饰有无不同。石望柱不仅用于神道，而且是其标志性陈设，其重要意义可想而知。

以上石像生是“石翁仲”、“石兽群”及石望柱的总称。石翁仲即文武大臣像，石兽和石望柱已做解释，这里再说说石翁仲的来历。

据《山堂肆考》言称，“翁仲”确有其人，他是秦始皇的一员爱将，姓阮名翁仲，他不仅对秦始皇十分忠诚，而且武艺高强，英勇无匹，多次立功。最后在“临兆”前线与匈奴交战时英勇牺牲。秦始皇为纪念这位忠臣，为他铸了一尊铜像，立在阿房宫司马门外，供大臣们瞻仰效法。再往后就有人把他雕成石像，将它立在陵墓神道边。

古代对石像生的使用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也属于封建等级制度之中的一项。比如，唐朝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的坟墓可以用六个石兽，五品以上可以用四个，至于皇陵则随意了，比如，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之陵用石人、石兽多达 97 个。

元帅林这些石像生是明清时期的雕刻。清朝对石像生的使用制度是这样规定的：

亲王、民公、侯、伯、一、二品辅国将军，准许用“石人一对，石马一对，石虎、石羊（各）一对，望柱一对”；

三品官准用“石马、石虎、石羊、石望柱各一对”，不准用石人（翁仲）；

四品官，准用石马、石虎、石望柱各一对；

五品官，准用石马、石羊、石望柱各一对；

六品官以下不准用石像生。我们常说的“县官”、县太爷，他是一县之长，其职权很大了，可他的官阶为七品，也包括在不准用之列。

对照以上制度可知，元帅林的这些石像生，原是属于亲王一级的王爷园寝使用的陈设，而且出自两位以上王爷园寝（仅就这组石像生言之，未包括一百二十级石阶文武大臣石像在内）。

石像生的作用，主要用来显示陵墓主人的地位，再是对整个陵墓建筑起到装点、烘托、增强气势的作用，还有，古人迷信，认为这些石兽有驱邪和震慑作用。

### 三 龙头碑

龙头碑景观位于明清石刻苑以东，龙头新区边缘。此处居高临下，面向宽阔的河水和高矗如壁的大山。地面平敞开阔，草地绿茸如铺。石碑共为三甬，居中者体量最巨，石质为名贵的汉白玉，龙趺龙首，雕刻细致，其下用十二层条石砌成“金字塔”式基座，显得尤其高大突出。左右两碑体量稍小，石质为青石，基座为一层。从远处望去，三甬白色石碑如同天水相处亭亭玉立的三位“白衣天使”，与远山近水构成一幅美妙的画面。这里是游人喜爱的最佳去处，常有游人在此留连，或摄影志念，或高谈阔论，或向偶古碑凝神而思，引发猜测和异想。

龙头碑是1930年张学良从北京购置的大量石刻之一，原准备用于为张大帅树碑立传，而且碑文已经请人撰写完备，石碑上旧有文字也已全然磨去，正准备刊刻之际突然发生“九一八”事变而告停止。本来，建元帅林之初曾有建造碑亭计划，只是为张学良所否决。不过，尽管如此，作为神道碑仍然要在茔墓占据显著位置，一般地说，神道

碑要设在方城之前或者大殿（享殿）之前较为合制。可是，现在它却出现在远离茆墓三百米开外的偏僻之地。十分显然，这不像是元帅林建造期间的原设。

笔者注意到，有的调查传说称这些石碑所以被放到龙头地方，是“风水”先生们的意见。因为浑河上游时常山洪暴发，导致河水泛滥，容易对茆墓的安全带来危害，于是将石碑拿来作“镇物”，压在“龙头”之上，以“镇住河水”<sup>①</sup>，时间是“修陵时”<sup>②</sup>。这个传说有可供参考之处。

---

①② 林川：《元帅林》，载《抚顺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封

不过，说是修陵期间将神道碑安排在此地，而且用来作为“镇物”于情于理又似乎不大可能。所有有关此事尚属存疑，还有待进一步查证。

再有，据林川先生介绍，1984年前，龙头之地仅“立一石碑，修水库时，石碑已作大堤合龙之用。这里所遗龟趺，高约二米，直径约三米，重达十几吨。”<sup>①</sup>此碑乃指今天的正中最高之汉白玉碑而言。大伙房水库合龙时间为1958年9月，按常法，大堤合龙时在大坝中间留一水口，再选用一整块大的石板或石块将水口堵截，随之再进行充填，将整个出水口封堵砌造成坝。合龙时要举行庆祝仪式。大伙房水库合龙时也是如此，为此选中元帅林龙头这甬汉白玉碑，以龙头碑压龙口顺理成章，而且也有吉祥的取意。随即派人派车将这块巨碑从石座上拔出，运往数十里外的合龙大会现场。但是在经过无数掌声和欢呼声的“洗礼”之后，此碑却被弃之一旁无人问津，龙头处仅有石碑碑座望山兴叹。1984年抚顺市博物馆接管铁背山公园筹建石刻陈列，又费了很大力气将这甬石碑从大伙房水库大坝拉了回来，将其恢复原位。如今，这甬精美的石碑虽然经过多次曲折变迁，却风采依然，毫无损伤，不能不说是一件奇迹。还有，依据林川先生之文推测，另外两甬石碑应为1984年之后所增设。

---

<sup>①</sup> 林川：《元帅林》，载《抚顺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封3

## 第九章 关东碑林

关东碑林位于龙头新区中心，与“明清石刻苑”南北相对，是元帅林又一风格独特而又协调统一的新展区。

关东碑林占地面积 3000 平方米，是一座曲廊式建筑，其前是一座高大雄浑的牌坊门，门为三门二柱，门柱敦实粗壮，颜色朱红，其上为单檐歇山式木架檐顶，上面铺设青瓦和青色大脊、垂脊、钱脊、走兽等饰件，梁架檐枋施以金漆彩画，正中横梁上悬挂题名匾一方，匾为黑地金字，横书“关东碑林”四个大字，字体为行书，为前抚顺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兆民同志手书，字迹庄重洒脱。此门设计非常巧妙：冷眼看去坊门是二柱三间，等于是两根柱子托举着一架庞大的坊檐，似乎给人以头重脚轻之感，甚至有些担心柱子能否长久承重。但仔细看却发现，坊门两侧的前墙墙垛，其上檐各自向坊柱伸出一架特制的“假檐”，此檐与坊柱坚固相连，这样既加固了坊柱，又减去了坊柱自身的承重量。所以，门坊乍看上去有些虚漂，实际却非常稳固，这种虚虚实实也许是建筑师的艺术手法。

坊门两侧的前墙十分素洁，墙体为亮白色，上面开有海棠形透窗。墙顶为青灰色，下衬灰色墙裙。

走进坊门，是一长方形面积近百平方米的过厅，为建筑的前导，过厅北墙开有两个月亮形的随墙门，厅内辟有花坛、草坪，红花绿草与四壁如雪形成鲜明对照。

走进月亮门是一座宽阔的庭院，东、西、北三面为半壁游廊，顶覆青瓦，白色墙壁，壁间镶嵌着各种字体的书

法碑石，游廊前檐之下为坐凳式护栏，庭院内亦设有花坛，栽种各种花草及树木。

整个建筑给人以憩静、安适、赏心悦目、有几分江南园林的感觉。

碑林共展出国内著名书法家书法精品 169 幅，刻碑 230 块。其中有沈鹏、谢雅柳、王学钟、李铎、刘炳森、佟韦、尹瘦石、赵冷月等国内外闻名大家的墨宝。碑石选用著名的泰山青石，石质细腻光润。聘请石刻高手精工细刻，陈列设计舒展有序，落落大方。

碑展从 1990 年开始筹备，向全国各地书法名人征集作品，1995 年 6 月修建碑林，1996 年碑林建成，接待广大游人。如今，漫步其间，如步入书法艺术殿堂，真草隶篆，俱典雅飘逸，有如珠玑灿月；名言佳句，皆妙笔华章，如文绮生辉。给人以艺术享受，给人以思想的启迪。

现录其中部分碑文，以飨读者。

桂林唐建年书：■心随海水去，身驿白云间。■

肖贤讷书：■抚顺之煤天下闻，伟哉，造化所氤氲；  
人工更使江山美，树立碑林刻石文■

秦 燃书：■政通人和■

吴 琮书：■多栽翠竹摇清影，独上高楼看远天■

孙 剑书：■毓秀钟灵■

青岛高小严书：■千秋笔墨惊天地，万里江山入画图

陆京生书：■白雪阳春本超妙，良足美景足游观■

玉 声书：■大翼垂天四万里，长松拔地三千年■

十八清逸浩书：■行止无愧天地■

胡润芝书：■小诗试拟孟东野，大草闻临张伯英■

方国兴书：■清气若兰，虚怀当草。乐情在水，得趣

## 同山■

兰州伊载鼎书：■关东多宝藏，抚顺煤田长。当年血  
泪史，盛世开新章■

莘 良书：■关东妙境■

孙 与书：■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长安黄伯贤书：■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  
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独能化  
碧涛■

长安印道人嘉仪僧书：■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葛介屏书：■晋汉玄菟郡，李唐新城洲，一代发祥地

北京溥杰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陆 石书：■浑河月笼关东岭，高山日照抚顺城。国  
陷家家闻啼哭，解放户户传笑声。高尔古  
塔鉴前事，雷锋史馆毓后生。世人炉边暖  
春酒，举杯先酬矿工情■

春海书：■赫赫抚顺，关东名邑。

满族肇兴，清朝发迹。

人出英豪，地产煤铁。

今益昌盛，日盛一日■

黎 凡书：■松竹梅三友，诗书画一家■

沈阳李仲元书：■笔艺流光■

穆 毅书：■铁背山头吊古，元帅林里思幽■

广东陈景舒书：■关东形胜固金汤，曾是明清古战  
场。今日建国扬国粹，琳琅翰墨泐  
千章■

仲 许书：■养浩然正气，极风云壮观■

吉林罗继祖书：■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

还。差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  
阴山■

曾克充书：■关东碑记千秋史，珉石镌开万古情■

冯济泉书：■威扬关东■

蔡德林书：■风云思奋翮，雷雨欲扬鳍■

许雅琼书：■药良气味苦，琴淡声音奇■

李克民书：■古历朝兴衰已去，今关东胜景荟来■

北京张西帆书：■人生贵奉献，正气终归胜利。历史  
不逆转，长河无限流芳■

关晓峰书：■关东名胜地，苍茫古战场。碑林存万  
世，文物永光扬■

王振海书：■风景这边独好■

[注：以上碑文为笔者参观时记录，个别之处难免有  
误。]



## 第十章 石刻研究

### 一、发现“清和硕豫良亲王碑”

笔者在考察龙头碑时发现，位居正中、体量最大的汉白玉碑上面有刻文残痕。旋经仔细辨识，确认此碑乃是“大清和硕豫良亲王碑”。现对其做简要考证。

#### 1. 碑文及碑的形制

清和硕豫良亲王碑文：

和硕豫良亲王碑：朕惟：延麻锡爵，金枝彰复。始之封笃，叙推恩翠。碣垂易名之典，缅旧勋之末沫，泽衍屏藩，眷令闻之丕昭。荣施兆域，惟王瑶源引派，瑞牒分辉，稽翊运之诚劳，旌常久纪，举酬庸之懋，赏带石厉宜垂。朕特念前徽，重加显秩。宗盟是赏，期表率于仙潢。旗务兼咨，待统司乎梦旅。方冀伋膺，綰禄何图。遽谢芳华，奠醑以时，既备雕筵之荐，表莹有制，还传贞石之铭。象厥水平，以良为谥。于戏！

溯宣勤于策府，分璜增桂邱之光。具宠恤于彝章，勒琰焕松阡之色。休称不泯，式视来兹。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 日<sup>①</sup>

右满文八行从略。

碑首镌■敕建■二字，篆书，满汉合璧。

---

① 碑文为笔者辨别抄录，因原碑文字磨损难辨，可能有误，请引用者注意。

碑石通体为汉白玉。碑身高 2.78 米，宽 1.3 米，厚 0.58 米。碑趺高 1.2 米，长 3.6 米，宽 1.4 米。碑首（碑头）为盘龙，称为“龙首”，碑趺（碑座）为龙头、龟背，称为“龙趺”。碑身正面开光处刻汉文和满文，四边边框及左右两侧刻有龙云纹饰，碑身背面光素无纹饰。石碑选材精良，雕工细致，为典型的乾隆时期碑刻佳品。

## 2. 和硕豫良亲王其人

考《爱新觉罗宗谱》，和硕豫良亲王名修龄，为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豫通亲王多铎之五世孙。父德昭，母张佳氏。生于乾隆十四年（1749 年），二十七年（1762 年）十三岁袭叔父如松辅国公爵位，三十年（1765 年）被授为散秩大臣，三十四年（1769 年）授宗人府右宗人，同年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三十五年（1770 年）授镶白旗满洲副都统，又调任宗人府左宗人。同年又调正红旗汉军副都统。三十六年（1771 年）袭多罗信郡王爵。同年调任宗人府右宗正，又调左宗正。三十七年（1772 年）总管镶白旗觉罗学。四十二年（1777 年）调任宗人府右宗人。四十三年（1778 年）高宗乾隆以多铎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特旨追复其亲王王爵，令修龄承袭，并复王号曰豫。同年授修龄管理正白旗蒙古都统事务。四十八年（1783 年）被授盟长。同年又授宗人府宗令。四十九年（1784 年）管理镶蓝旗都统事务。五十一年（1786 年）去世，时年三十八岁，追谥曰良<sup>①</sup>。五十三年（1788 年）乾隆皇帝敕建墓碑。

修龄是豫亲王多铎被迫复亲王后第一位袭替豫亲王爵之人。

---

<sup>①</sup>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

多铎为太祖努尔哈赤大妃乌喇纳拉氏所生，与英亲王阿济格、睿亲王多尔袞为同胞兄弟。崇德元年（1636年）封为和硕豫亲王并掌管礼部事。七年（1642年）因事降封为郡王，顺治元年入关率军南征有功复晋为德豫亲王，三年（1646年）授扬威大将军，四年（1647年）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六年（1649年）病逝。九年（1652年）其兄多尔袞被首告生前犯有“谋逆”之罪，受牵连被追削为郡王。乾隆四十三年高宗为多尔袞平反昭雪，多铎亦被追还亲王王爵。由其五世孙修龄世袭罔替，此时豫亲王号已停封一百二十余载。自此王号世袭不辍，继修龄之后袭此王爵者为其子裕丰、其孙义道、本格、懋林、瑞镇等人，直至大清亡国废制。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修龄英年早逝，生前主要在宗人府衙门做官。宗人府设于顺治九年，是专门管理爱新觉罗皇族事务的重要机构。“品高位崇，位列内阁、六部之上。”<sup>①</sup>宗人府掌印官曰“宗令”，由亲王郡王担任，其下有“左、右宗正”各一人，再下为“左、右宗人”各一人，再下有“府丞”、“堂主事”、“供事”等大小官员，修龄从“左宗人”做起，直至职权最高的“宗令”，可以说遍及宗人府所有高官。并且担任八旗副都统、都统等要职。是乾隆朝的重要历史人物。此碑是修龄仅存的历史遗物，而且未见史书注录。所以具有一定历史研究价值。

附：修龄世系：

---

<sup>①</sup> 李鹏年、刘子扬、秦国经、朱光华、陈锵仪：《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86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太祖努尔哈赤	——	多铎	——	多尼
鄂扎	——	德昭	——	修龄
裕丰	——	义道	——	本格
懋林	——	瑞镇		

## 二、龙头碑为何是三甬

龙头碑是张学良为其父购买的“准神道碑”。问题是作为张作霖个人的神道碑，一碑足矣。这里为何却存在三甬？有些细心的游人，特别是热心历史掌故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有关这个问题至今尚未见到任何说明资料，甚至也未见有人正式提及。笔者联想起《盛京时报》的一条记载，可能与此有关。这条材料前文已经提到，即该报民国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刊登的《大元帅葬仪种种》一文有如下之句：“（元帅林）茔内掷灵三□”。“掷”的本意作“投”或“撒”解释。笔者把它看作为“置”的别字；“灵”则是“灵柩”；“三□”中的“□”是原文脱字，“三□”可以理解“三具”、“三座”。这段话总的含义是说，元帅林是一座夫妇合葬墓，准备安葬张作霖和他的两位夫人。龙头碑之数恰恰与此相契。

张作霖有夫人六位，即原配赵氏夫人，继配卢氏夫人，三房戴氏夫人，四房许氏夫人，五房寿氏夫人，六房马氏夫人。

赵氏夫人，父名占元。农家出身，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与张作霖同年。二十一岁与张作霖成婚<sup>①</sup>。张作霖发迹之初，与赵异地分居。民国元年（1912年）病

---

<sup>①</sup> 杨小红：《张作霖与他身边的女性》，第4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

故，葬锦县驿马坊。生二男一女，长子学良，次子学铭，长女首芳。

继配卢氏夫人，名寿萱，清光绪六年（1880年）生，私塾家庭出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嫁张作霖。生二女：次女怀英，四女怀卿。

三房戴氏夫人，原为北镇县某捕盗斑头的儿媳，张作霖以其“容貌极美”取为己妻，时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民国四年（1915年）戴氏之弟仗势作恶被张作霖处死。戴氏几次说情不成，盛怒之下出走，至沈阳白衣庵削发为尼。

四房许氏夫人，名澍□，河北宛平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与三房戴氏同年嫁张作霖。生二男二女：子学曾、学思，女怀■、怀曦。

五房寿夫人，名寿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生，父为黑龙江将军寿山。聪明伶俐，年轻貌美。民国六年（1917年）在学校毕业典礼上的出色表现被张作霖看中，不久取为第五房夫人。为人精明强干，处事圆满周到，深得张作霖宠爱。也得到府内上下的尊重赞扬。生四子：学森、学俊、学英、学铨。

六房马氏夫人，名马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生，出身贫苦，早年被卖到天津戏班唱戏。民国十二年（1923年）张作霖以她有“福相”<sup>①</sup>将其赎出为妾。从此，经常将她带在身边。“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她陪同张作霖在一节车厢，所幸只受微伤。与张作霖只生活五载。

---

① 杨小红：《张作霖与他身边的女性》，第39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

以上六位夫人，除三夫人戴氏被“除籍”，六夫人马氏虽得宠爱只能算做“姨太太”，而且未育，其它四位最有资格与张作霖“合葬”者首先为原配赵氏夫人，余下一个“合葬空额”当属继室卢夫人，因为四房许夫人、五房寿夫人按名分均为“誨室”，即妾的古称。如前文的《大帅张公神道碑铭》有“誨室许夫人、王夫人”之称，（王夫人即寿夫人）所载即如此。

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夫妻合葬是传统习俗。别的例子不说，张作霖本人葬元帅林未成，1937年改葬驿马坊时即与其原配赵氏夫人同圻永眠。所以说元帅林为夫妇合葬墓也是理所当然。龙头碑可能是为其三位之神道碑。

三、“金大昊天寺妙行大师行状碑”转藏辽宁省博物馆经过

前文提到原抚顺市博物馆王秀岩馆长在回忆文章中说到，元帅林修建期间从北京购来的大量石刻中，有一甬罕见的金代石碑，“碑志：大昊天妙行大师行状碑”，“今藏辽宁省博物馆”<sup>①</sup>的问题。笔者现据史料进一步简述其原因和经过，以解疑补阙。

金代的昊天寺位于北京西郊劳子山，始建于“大定四年（1164年），秦越公主建”<sup>②</sup>。“妙行大师”为昊天寺高僧，圆寂后由其门人立碑，以表述其功德和行状。时间可能是昊天寺建成十六年之后。这座寺庙在元代香火尤为鼎

---

① 王秀岩：《元帅林修建前后》，载《沈阳文史资料》，第3辑，第169页。

② 清·孙承泽著：《天府广记》，卷38，第580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盛，甚至成为“国寺”，元世祖忽必烈等人曾多次至此焚香祈祷。如，“中统三年（1262年）十二月戊寅，（世祖忽必烈，因平定“李璮之变”等事）作佛事于昊天寺，七昼夜”<sup>①</sup>。至大元年（1308年）十一月武宗海山以争得帝位，献“银七百五十两，钞二千二百锭，币帛三百匹，施昊天寺，为水陆大会”<sup>②</sup>，以示祈福。明代中叶该庙已残，“正统四年（1439年）王振重修，改（名）隆恩寺。”<sup>③</sup>

王振是正统年间权倾一时的阉宦。生性“狡黠”，善于逢迎阿谀，深“得帝欢”。在朝廷中“跋扈不可制”。颇有权势，极为富有，如，在皇城东建盖私第豪宅，“建智化寺”，甚为奢丽，“穷极土木”<sup>④</sup>。昊天寺当为英宗皇帝赐予王振并重建，作为太监养老、安葬之地。

清初，饶余郡王阿巴泰得封此地，在此营建园寝。

民国十九年（1930年），张学良为修元帅林从此处选购石刻“六千吨”，运至抚顺元帅林工地，内有园寝陈设、太监墓碑及金大昊天寺碑。“九一八”事变后元帅林停建，大量石刻散置于林园各处。

1934年4月25日，著名史学家金毓黻与日本古建筑专家杉村勇造等人至元帅林考察，发现这甬金代碑刻，遂

---

① 明佚名：《北平考》，第57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② 明《北平考》，第57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③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38，第580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 《明史》，卷304，第77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将其逐字录出，其文如下：

### 传戒萨菩妙行大师行状碑

师契丹氏，讳克智。普济国舅大丞相楚国王之族。辽太平三年下生（又有重和十三年生及咸和某年——金先生注，下同）门人清摄大德讲经律论沙门即满编 濛郡石经比丘义藏笈书，刻大定二十年中秋，第四代门孙□经比丘觉琮等建；（内有圣孝皇帝等字）。<sup>①</sup>

金先生认为此碑对于研究金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回沈后立即派员再次来到元帅林进行传拓，拓碑过程中又发现碑阴亦有文字。同年五月六日派去的人将石碑全文“拓来”<sup>②</sup>。此时，日本当局借口“代替中国人民保护文化财产”<sup>③</sup>，投资三十万日元，设立“伪奉天国立博物馆”（馆址为今辽宁省博物馆），开始大量“搜集文物”<sup>④</sup>藏品，筹备陈列展览。在得知此碑信息后，派人将碑从元帅林运至奉天。伪奉天国立博物馆经两年筹备，共搜集各类文物二千七百余件。遂于1935年6月1日举行建馆开幕式。史学家金毓黻先生亦被邀集参加<sup>⑤</sup>。

---

金毓黻《清晤室日记》，卷第77，第3299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

② 金毓黻《清晤室日记》，卷第77，第3310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

③ 赵晓华：《辽宁省博物馆四十年纪事》，第95页

④ 金毓黻《清晤室日记》，卷第77，第96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

⑤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第84，第3588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



1945 年伪满洲国垮台。1946 年国民党政府派周之风接收伪国立奉天博物馆。在接收的 9857 件文物中内有“碑志 111 件”<sup>①</sup>。其中包括这甬“金大昊天寺碑”。1947 年 1 月 1 日成立“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金毓黻被任命为院长。

1948 年 11 月 2 日沈阳解放。“国立沈阳博物院”由人民政府接管。1949 年改称东北博物馆，1959 年更名为辽宁省博物馆。“金大昊天寺碑”如今仍藏于该馆。

#### 四、库藏及失散部分石刻

##### 1. 库藏明太监碑

这里所说的“库藏”，是指元帅林现存以及史料记载其曾存两部分。

##### (1) 太监窦忠墓碑

碑为青石，圆首，无坐趺。残高 2.55 米，宽 0.96 米，厚 0.28 米。碑文如下：

“嘉靖壬戌年六月十二日寅时生，瑞府承奉正掌府事御马监太监，小泉窦公讳忠之□。泰昌元年九月初八日酉时卒。”<sup>②</sup>

碑首刻有“皇明”二字，碑文阴刻、竖书。碑阴有无文字不详。

据碑文得知，太监姓窦名忠，字小泉，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卒于泰昌元年（1620 年），享年五十八岁。生前为瑞王府掌管王府事务之大太监，也曾是“皇

---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第 109 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63 年。

② 笔者据考查记录。

宫御马监”太监。

“瑞府”，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第五子朱常浩的王府。朱常浩生于万历四年，二十五岁（万历二十九年）与其兄“福、惠、桂三王同日封”<sup>①</sup>王。王号曰“瑞王”。天启七年（1627年）封藩于陕西汉中，成为“陕西王”。可是不久，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占汉中，朱常浩被迫逃往四川重庆。崇祯十七年（1644年）被大西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捉获处死。太监窦忠在瑞王府担当“承奉正掌府事”的时间当是天启七年之前，瑞王前往陕西藩镇时不知何因没有将这位“大管家”带走，而被派往皇宫御马监。实际被降职使用，但却“因事得福”，得以善终。

## （2）太监张佐残碑

碑文：“敕谕司礼太监张佐”<sup>②</sup>。

此碑为1934年史学家金毓黻在元帅林考察时所见，碑已残，仅存数字。

“司礼太监”即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是明朝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府“十二监”之一。十二监分别是“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御马监”、“司设监”、“尚宝监”、“神宫监”、“尚膳监”、“尚衣监”、“印绶监”、“直殿监”、“都知监”<sup>③</sup>。司礼监的主要执掌是，“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司礼监）众太监分

---

① 《明史》，第6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3299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

③ 明·刘若愚：《酌中志》，第93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批”。批示标准是“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sup>①</sup>。司礼监额设掌任太监一人，秉笔、随堂太监八、九或四、五员不等。司礼监实为皇帝御用文秘处，司礼太监为御用文书。

### （3）佚名太监残碑

碑文：“生于弘治十□……

正德四年四……

内庭于……

乾清宫近侍，历……

内官监太监署……皇明四年六月。（凡六行，皆缺字）

碑首：“皇明钦赐蟒衣玉带”。<sup>②</sup>

此碑为史学家金毓黻先生于1934年在元帅林所见并注录。

“生于弘治十□”为太监生年，“弘治”为明孝宗年号，共历十八年（1488—1505年）；“正德四年（1509年）四（月）”，为该太监被选入宫时间，年龄约在十一岁之内。明朝太监年幼入宫者很多；“内庭”、“乾清宫近侍”，意为太监执事之所，“乾清宫为帝、后所居，妃嫔亦得以次进御”<sup>③</sup>之内寝；“内官监”为十二监之一。设有掌印太监一员，其下有“总理、管理、佾书、典簿、掌司

---

① 明·刘若愚：《酌中志》，第93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3300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

③ 《清宫述闻》，第561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

人数、写字、监工。自典簿以下分三班宫中过夜。”<sup>①</sup> 供帝后传唤；“钦赐蟒衣玉带”指帝后对太监表现殷勤的赏赐、奖励。

#### (4) 佚名太监残碑

碑文：“尚膳监孝癩池进礼，孝兄池锐等”<sup>②</sup>

此碑亦为金毓黻先生于 1934 年注录。碑残，仅存以上数字。其中“尚膳监”为十二监之一，“职掌造办，每日早午晚奉先殿供养膳品。乾清宫、一号殿、仁寿宫等宫眷月分厨料”<sup>③</sup>。“孝癩”、“孝兄”等池姓者，为太监立碑之亲眷。

#### (5) 孙姓太监残碑

碑文：“司礼监太监孙公墓表”<sup>④</sup>

此碑亦为金毓黻先生首注。“司礼监”已前注；“孙公”为太监之姓氏和尊称；“墓表”为墓碑的别称。

#### (6) 太监张福残碑

碑文：“敕司礼监太监张福”<sup>④</sup>。

此碑亦为金毓黻先生注录。文字已被铲去，仅辨以上几字。

#### (7) 佚名监残碑

---

① 刘若愚：《酌中志》，第 102 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

②④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 3300 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 年。

③ 刘若愚：《酌中志》，第 104 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

④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 3300 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 年。

碑文：“大明嘉靖二十七年岁次戊

申孟夏吉日，锦衣卫管卫事，后军都督府，癘男张瞭立。”<sup>⑤</sup>

此碑亦为金毓黻先生注录。

“锦衣卫”是“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sup>⑥</sup>的御用衙门。凡遇朝会、皇帝出巡等事，锦衣卫具鹵簿仪仗“侍从扈行”；平时则轮流守卫宫禁，护卫宫殿安全；大臣、品官犯法亦派锦衣卫缉拿。“后军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之一，是明朝最高军事机构。张瞭先是管理锦衣卫之官，继为后军都督府都督。此碑是张瞭为叔父某太监所立。

## 2. 流散于沈阳车站的石刻

沈阳车站原名“奉海站”，是奉海铁路始发站。奉海铁路始建于1925年7月，1927年8月竣工投入运营。铁路全长251公里，西起奉海站，经东陵、抚顺、营盘、清原、山城镇，直至吉林海龙。后延伸至吉林，更名沈吉铁路。修建元帅林时，从北京等地购置的大量石刻需由奉海站经铁路转运到元帅林。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元帅林被迫停工，有些正待转运的石刻也因此被滞留于奉海站，并从此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直到近年，有些流散石刻始被重新发现。现仅就所知，记述如下：

### （1）牌坊檐顶四架

1999年6月18日《沈阳晚报》头版，发表主任记者邱宏采写的一篇最新报道，题目是：《元帅陵建筑之谜……》，副题是“我市车站发现四个石牌楼檐顶”。其文

---

<sup>⑤</sup>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3299，3300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

<sup>⑥</sup> 《明史》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如下：

“闻名中外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元帅陵，坐落在抚顺市东部铁背山南麓。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元帅陵被迫停建。那些没能派上用场的建筑构件现在散轶在何处？70余年来，一直是世人瞩目的不解之谜。6月17日下午近5时，铁路职工杨连春提供了重要线索；晚7时记者随同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的有关人员赶到现场勘察。

现场位于沈阳铁路局大型养路机械段焊轨车间院内，此处位于车站东约1.5公里，在院墙南墙根的树丛中，东西向横卧着一个汉白玉原殿式牌楼的檐顶，檐顶为仿木结构，4脊各有三个垂兽（已散失），歇山头各有套兽、瓦头，滴水檐头均施以莲花图案，做工细致，十分精美。该檐顶全长5.6米，宽2.5米，脊背、坡脊上均有方孔棹槽，可确定系牌楼的第二重主檐顶。

在院墙北侧的沈阳铁路局材料厂沈东油库院内，紧贴着院墙北侧，又见东西向一字排列的3个牌楼檐顶，西侧的一个与墙南的檐顶等大，为上重主檐顶。可确定该牌楼为二重檐结构。东侧的两个檐顶各长3.7米，宽2米，均一侧有坡脊，一侧呈断截面状，以便与中间主檐顶衔接。两个小檐顶与第二重主檐顶一墙之隔，难以见面。其材质、格局、风格、纹饰等，均与两个主檐顶相一致。可见它们同是一个3道门制式牌楼的石构件。市文管办有关人员兴奋地连声说：‘漂亮、漂亮、太漂亮了！这是国家二级以上文物；这是人们一直在寻找的元帅陵散轶的构件。元帅陵之谜

终于被解开了！’

据了解，东站与途经抚顺的沈阳铁路，均为张作霖所建，置放石牌楼檐顶处，当年曾是奉系军阀的仓库。从这些石牌楼檐顶的石质分析，应是当年从河北省加工后，运抵此处暂储备用的。“九一八事变”后元帅陵停建，这些石牌楼檐顶从此被搁置在此，任土埋沙掩，风吹雨淋，一睡就是70余年……”

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传到元帅林之后，元帅林文物管理处负责同志前往沈阳东站实地察看，但却惊讶地发现，“有的牌坊竟已被砌进了工厂的围墙。”<sup>①</sup> 国家文物竟被擅自做了建筑材料，实在令人痛惜。

## （2）明太监残碑

1934年4月20日史学家金毓黻在《日记》中记有：

“霍初先生在日，谓沈海路车站之东方货厂有正德十一年（1516年）大城县张太监墓碑一石，在货厂入口，又有谓见嘉靖十八年（1539年）刻石。当日尚未之见，偶检旧札，取而记之。”<sup>②</sup>

“霍初”姓阚，名阚铎，伪满某局局长，喜文史，与金毓黻往来甚密，1933年卒。“沈海路车站”即沈阳东站；“东方货厂”即车站货厂，位于车站之东，可能是发现四架坊檐之处。阚铎于此发现正德十一年、嘉靖十八年碑各一甬告之金毓黻先生。过后，金毓黻先生去寻时嘉靖

---

① 于欣：《明清石雕寂寞草丛中》，载《辽沈晚报》2002年10月29日。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3294页，沈阳，辽沈书社，1992年。

年碑已不见。

由以上而知，当年元帅林流散于沈阳东站之石刻，不仅有“牌楼檐顶”，还有若干明太监碑。可能还有其它。

## 五 石刻数量问题

当年修建元帅林从北京等处购来的石刻总数到底是多少？这个问题已成为历史谜团，早已无人能说得清。笔者最近查到一份 1950 年有关元帅林石刻数目的档案史料，揭开了这个谜底。

据当时政府有关部门调查统计，元帅林仅“艾叶青、白玉石”（均为大理石）两类，总数共为“二千零八块”。其中，大型石刻“一块，一车拉不动”（可能指汽车），小的“每块体积一立方米”，而且以前者“占多数”。当时，还对大型石刻做了登记。计为：

狮子，四对；  
牌楼，四架；  
翁仲人，六个；  
石马，一对；  
骆驼，一对；  
石虎，一对；  
石羊，一对；  
石兽，一对；  
望天好（应为“望天吼”），一对；  
石碑（小），两甬；  
大石碑，一甬；  
石供器（石五供），一套；  
花柱，一对；  
看墙，六对。



调查人员还对石刻的来历做了调查，知情者告知是从“由北平运来的成品，据说是（清朝）各亲王”园寝之物，因其“后人不成器出卖的”。

元帅林现有石刻总数为“二百余件”<sup>①</sup>，其中，已“整理出108件石雕石刻精品”<sup>②</sup>（截至2002年）。此数可能包括“明清石刻苑”、石像生、龙头碑在内。据元帅林文物专家宋泽民介绍说：“还有许多石雕石刻散落在其它地方。去年（指2001年）尽管没有经费去修缮，元帅林为保护这些文物，还是雇了五六台大型车辆，把散落在园区中的这些文物集中放到一处。这项工作竟用了整整一周。”<sup>③</sup>不知这些被“集中放到一处”的石刻是否亦在总数“200余件”之列。但是，不管包括与否，与1950年所统计的数字已相差甚远。

## 六 石刻来源考

元帅林石刻数量如此之多，艺术品位如此之高，它们究竟来源于何处？对此，20世纪70年代抚顺市博物馆将其作为元帅林历史的重要问题提出，并组成专题组进行深入、细致调查。调查结论是，石刻主要来源于北京隆恩寺明太监墓和清饶余亲王、安亲王等墓地<sup>②</sup>；此后，研究人员又从《圆明园》一书查到：“元帅林的石刻还有来自北京圆明园的若干汉白玉石件”<sup>②</sup>的记载；据说有一些石刻

---

①②③ 于欣：《明清石雕寂寞草丛中》，载《辽沈晚报》2002年10月29日。

②② 郝武华：《元帅林风景区简介》，第4页。

来自明“十三陵”<sup>③</sup>；另外据“一些当年经历此事的人表示，还有一些精品不知来自何处”<sup>④</sup>。以上是目前对元帅林石刻来源问题的总体解释。

近年笔者为编写《元帅林》一书，从历史档案和其它史籍查到一些新资料，现做进一步考证和补充。

### 1. 北京隆恩寺

元帅林石刻主要来源于北京隆恩寺明太监墓及清饶余亲王园寝等问题，前文已有详细叙述。这里仅补充几点新史料

其一，1930年7月葬仪处处长彭相廷就隆恩寺等处石刻转运东北一事呈总司令张学良文：

“为签请事，窃据职处郑副处长天顺由北平来电称：查本处在三家店购买之石料约六千吨，经由平绥铁路通过，应纳过道费，按三等货核价，需现大洋二万余元，未免过巨。天顺业与平津卫戍司令部俞秘书长商洽妥协，准由东北政务委员会致电该部即可完全豁免。务乞亲往商请，即予提前办理，俾免延误为叩。等情前来。查此项石料墓地工作待用甚急。据电前因，理合签请鉴核俯准施行，俾应急需，不用胜感盼之至，谨上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

大元帅葬仪筹备处处长彭贤（相廷）

谨签七月十九日”<sup>④</sup>

---

<sup>③④</sup> 于欣：《明清石雕寂寞草丛中》，载《辽沈晚报》2002年10月29日。

辽宁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第480页，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

上述函件的大意是：葬仪处驻北平办事处郑天顺副处长致电彭贤处长说，从三家店（隆恩寺附近之火车站名）购办的石刻运往东北，需从平绥（北京至张家口）铁路转运至京奉铁路，路局方面欲收“过路费”，过路费按物料重量六千吨、物料等级按三等货物计算，共需费二万元现大洋。为此，郑天顺找到平津卫戍司令部俞（家骥）秘书长商谈，俞应允说只要东北方面致电说明，即可一切费用豁免，彭相廷随即报告总司令张学良。张学良闻报，准许“用政委会名义电俞”，八月三日俞家骥复电称：“业经飭平绥局查照免费。”

从上述档案还得知两条信息：一为从隆恩寺所购石刻总重“六千吨”；二为石刻运奉时间为1930年8月。

其二，据史家冯其利先生调查，得知拆运石刻过程中一些细末轶事。如，“1928年冬开始拆运，拆石活和拉车的干一天活给五、六毛钱，用的是六十匹马拉的链车，头目是北旺（地名）的米三（回族），他负责运送这里的石料，前后有三年的光景。精美的石料运到了关外，一般的石料尚未运到，还没运送完时他就病死在隆恩寺，当时有四十岁。”<sup>①</sup>

## 2. 北京大北窑清豫亲王园寝

元帅林石刻还有一部分来自北京大北窑等处清豫亲王园寝。确凿的根据是新发现的“和硕豫良亲王碑”（见前文）。

大北窑是第一代豫亲王多铎、信宣和郡王多尼（多铎之子）等人园寝所在地。老地名“苗家地”（又称老坟），

---

<sup>①</sup>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第69，7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占地一百五十亩，多铎园寝外有两道大墙，里边子墙一道，南边有碑楼一座，内立驮龙碑一方，旁有东西朝房各三间，北边宫门三间，宫门与红墙之间相连。墙外西北角有阿哥坟七座。进入宫门有享殿五间，东配殿各三间，“享殿内有暖阁一，下有隧道。”<sup>①</sup> 信宣和郡王园寝在其父园寝西北不远处。此外，“还有十几处王爷坟”。1930年，末代豫亲王端镇考虑到十几处王爷坟不好保守，由其母主持下，将诸辈祖先移灵苗家地。”<sup>②</sup> 其中，也包括豫良亲王坟在内。豫良亲王碑等石刻被北平办事处购买运往抚顺元帅林一事，当在1930年迁坟苗家地之前。当时端镇已没落，生活来源主要靠出售家产度日。《盛京时报》民国十八年（1929年）八月九日以《高碑店大卖豫王祖坟》为题曾报道其事，全文如下：

“前清豫亲王后裔端镇母子等，年来坐吃山空，其家产已当卖净罄，于是穷不聊生。复经一般穷族人等怂恿，于去年乃将东郊一带各处豫王坟灵棺起出，改葬一处新莹地内，暗将殉葬财宝等物盗出，复将（出售）各处已废墓地之巨款公分用。岂料半年之后业已挥霍无存。因而于本年五月间乃将东便门外高碑店地方老豫王坟地内一切建筑物变卖后，近更将东便门外大鹿圈村及半壁店村两处豫王坟内正殿、宫门、配房、碑亭、宝顶外围大墙、梓墙一律售与某厂商，刻正在拆

---

①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第88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②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第89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运之中云云。”

豫良亲王碑等石刻当是此时被葬仪处北平办事处购买。

### 3. 北京白石桥清郑亲王园寝

据《北京地名漫谈》一书记载：

“辽宁抚顺市张作霖墓前的一对汉白玉石狮子，原是清代皇帝咸丰的军机大臣肃顺祖坟上的，慈禧杀了肃顺，平了肃顺祖坟，一对完好的石狮子被弃之荒野。1929 年张学良将军为其父修陵墓，买下这对石狮子运往东北。”<sup>①</sup>

肃顺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后裔，父名乌尔恭阿。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道光十六年（1836 年）二十岁授三等辅国将军爵位，委以散秩大臣，从此步入朝廷，官运亨通，步步攀升。历任前引大臣、乾清门行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工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等要职，成为咸丰皇帝的亲信，咸丰有些重要决策都要听信他的意见。如，镇压太平天国起用汉官曾国藩，对列强反对议和，坚持拒绝沙俄吞并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的要求等。咸丰十一年（1861 年）七月十七日皇帝奕訢驾崩热河行宫，奕訢临终前任命肃顺等八人为“襄赞政务大臣”。而皇太后慈禧为垂帘听政，驾驭皇权的计划屡为肃顺等人反对。为此，慈禧发动“北京政变”，以阻挠垂帘听政，擅改御旨等罪将其处决。

肃顺的祖坟位于北京白石桥，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园

---

<sup>①</sup> 北京地名办公室，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编：《北京地名漫谈》，第 21 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年。

寝。济尔哈朗是太祖努尔哈赤之胤，庄亲王舒尔哈齐第六子。崇德元年（1636年）被封为和硕郑亲王。世祖福临皇帝继位，济尔哈朗为辅政大臣。顺治十二年（1655年）病故，世祖“辍朝七日，赐银万，置守园十户，立碑纪功。”给予其莫高的礼遇。

据史家冯其利先生调查，郑亲王府寝“占地二百亩”，共有“四座院落”，周围有虎皮墙，正门三间，门外立有“石狮子一对”<sup>①</sup>。“照应坟地”的坟丁原有四十户，民国之后还有十七八户。当年经手出售郑亲王府寝石刻者为末代“郑亲王昭煦”，所售石刻除石狮子之外，还有“驮龙碑和砖瓦石片”<sup>②</sup>冯先生在调查时找到了当年的守墓人，据其回忆说：“东北军拆除王爷坟时，还布置了网哨。”<sup>③</sup>可谓戒备森严。

以上所说的“汉白玉石狮子一对”和“驮龙碑”，是指今元帅林正门前的石狮子和龙头碑的左右两碑。

#### 4. 北京五里坨清睿亲王府寝

据冯其利先生考察知悉，北京五里坨清睿亲王府寝“在1929年被盗发，石料被东北军张学良拉走”<sup>④</sup>，运往东北修元帅林使用。

睿亲王号首封为多尔袞，他是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受封时间是清崇德元年（1636年）。世祖福临即位，

---

①②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第17，18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③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第18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④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第8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多尔袞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受命为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率军入关，打败农民军李自成，占领北京。同年，大清迁都北京，定鼎中原，为大清立国建立不朽勋业。然而，其身故不久却被告发生前犯有“谋篡大位”之罪。王爵被追夺，“宗室”之籍亦被开除。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始得以平反昭雪。其王爵由其六世孙淳颖承袭。

五里坨睿亲王园寝即是淳颖等人墓园。据冯先生调查，园寝“占地六十八亩”，外有金刚墙，里有红墙，两道宫门，一座碑楼，“驮龙碑一方，还建有东、西朝房和享殿”，“看坟者为孟、胡、罗三姓四户”<sup>①</sup>。

至于元帅林具体哪些石刻石料为睿亲王园寝之物，已不得而知。

### 5. 沈阳蔺家坟

据辽沈地区著名老中医彭静山先生撰文回忆说：

“（沈阳富绅）名列第三的蔺天成，是小北关鼎鼎大名的财主，他的儿子有作过知府的，当时极为富有。到了民国时代，他的后代，坐吃山空，或吃唱嫖赌鼓（抽大烟）把一片家业花光。抚顺铁背山元帅林，是张作霖当大帅时预修的宝地，元帅林里的精雕石栏杆就是蔺家后代由他们宝地里拆毁变卖的，石栏杆就卖了好几万元。”<sup>②</sup>

---

①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第8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

② 彭静山：《同善堂与辽宁省救济院》，载《文史资料》，1984年号，第138页。（辽宁省文史研究馆，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这里所言的蔺家“宝地”即蔺家坟。墓主为“蔺天成”。考《沈阳县志》，“天成，字汝平，奉天沈阳人，少孤”，“母李氏与叔母为姊妹，先后夫殆，守志抚天成成立。”“己未（咸丰九年，1859年）（蔺天成）被朝廷命为知府，调陕西秦中。”“生平于学以治生为重，积资千万而性慷慨施。”<sup>①</sup>其许多乐善好施之事被老沈阳传为佳话，光绪十年蔺天成身故时，主动为之送葬的沈城市民多达“数千人”<sup>②</sup>。

蔺家坟位于沈阳东陵区前进乡八棵树一座高阜之上。1980年笔者曾与文物专家王明琦等人至此考查，墓地坐北朝阳，甚为宽阔。此时墓地已为某工厂占用，但是，依然可见有许多砖瓦、石刻、石件散落各处，笔者从中见一甬石碑，上刻“皇清诰赠通奉大夫……蔺氏李太君，”年款为“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碑阴刻着“西山卯向配壬水坐己酉穴纳音属土……”字样。系同治皇帝为蔺天成之母所赠诰封碑。此碑不大，石质却出奇的细腻，很像是玉石，工人们把它用来做了棋盘，所以得以完整保存。在墓地上踏察，随处可见各种石块，有的有花纹，可是很少有成形者。

采访时，当地大队党支部赵书记请来了他的叔父，老人家时年62岁，身体硬朗，思路清晰，提起蔺家坟，老人的话滔滔不绝。老人回忆说：这座坟墓很大，修得特别好，这附近有几座大坟，可谁也比不了它。记得墓的前头有一座石桥，雕刻的花纹别提有多好了。桥上的栏杆不次

---

①② 彭静山：《同善堂与辽宁省救济院》，载《文史资料》，1984年号，第138页。（辽宁省文史研究馆，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于北陵。墓上有石碑楼三座，上面刻有“乐善好施”、“御旨”等很多文字，坟前五供桌，桌子周围刻有“桃、李、柿子、佛手”等花样，都刻得特别的好，坟地上还有好多块大大小小的石碑。据说修坟用的石头都是从关里买的，石工雕匠也都从北京雇的，此坟前前后后总共修了二十四年。那时候张作霖、汤二虎（指汤玉麟）看好这些石活想花钱买，可能没卖，给张大帅修坟的时候听说买走一些，伪满时节道德会看好了坟上的东西想买下，找到蔺老七，蔺老七那时候已搬家到山海关，至于买走什么不太清楚，剩下的后来就都被人给砸了……。可见，彭静山先生所言不虚。

从以上简要考察可知，元帅林石刻是多源的，它们多数购自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中的豫、睿、郑亲王以及饶余郡王园寝。个别也有购自官绅墓地，沈阳蔺家坟为其例。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其它来源，不过石刻数量有限。

### 铁背山与萨尔浒风景区

铁背山与萨尔浒风景区是元帅林风景区的组成部分。

铁背山风景区位于元帅林以南，两者一水相隔。山势巍峨险峻，悬崖峭壁如同“一条蜷伏欲飞的巨龙”。山高海拔 283.1 米，长约 4 华里，山上树木浓密，怪石嶙峋。有许多自然奇景和人文历史古迹。鬼斧神工，令人称奇。

铁背山又称“界藩山”，界藩二字在满语意为“河流交汇处”。此山在明清历史上颇有名气。早在明代后期，此山已有建州女真人所筑城寨，寨主名叫“纳申”。《清实录》记有这样一段故事：

万历十三年（1585 年）二月一日，努尔哈赤领兵七十五人袭击界凡城。结果城主事先有备，只好不战而回。城主纳申见努尔哈赤领兵而走，立刻率领四百人出城追赶，当追至一处名叫太兰岗的地方时，努尔哈赤却突然单骑回马奔纳申而来，纳申见状挥刀将努尔哈赤手中马鞭砍断，可是当他再次举刀之际，却被动作敏捷的努尔哈赤一刀砍在后背，从马上坠落而亡。努尔哈赤回手取出弓射，将远处的另一名叫把穆尼的首领射毙。其余的四百人被吓得在远处观望不前。这时，亲兵过来向努尔哈赤报告：现在马匹已十分疲劳，需饮水喂料。努尔哈赤立即示意他们下马步行，假装用弓梢扫雪做寻找箭支状，一边牵马慢慢前行，当过了一个小岭，敌人已看不到他们的时候立即用盐和炒面将马喂饱以便应敌。就在队伍慢慢退走给马匹补充饲料之时，努尔哈赤自己却原地不动，监视敌人动静，

敌人果然中计，未能前来追赶。努尔哈赤遂即带领人马脱离险境。表明努尔哈赤的机智和勇敢。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建国称“汗”第三年的九月，在铁背山附近建造行都，屯聚重兵，准备进军辽沈。翌年三月明朝发兵前来围剿，明兵十万，兵分四路。努尔哈赤在铁背山南麓一带将明朝大将杜松率领的西路军二万余众全部歼灭，取得萨尔浒大战的关键性胜利。半个世纪后，努尔哈赤第四世孙康熙皇帝行经此地，回顾历史，感慨万端，即兴赋诗曰：

“城成龙跃竦重霄，黄钺麾时早定辽。

铁背山前酣战罢，横行万里迅飞飙。”

赞颂祖宗艰难开创之功。

今据抚顺市考古及历史学者们的调查考证，在铁背山发现有清初所建的“主城”、“东卫城”、“西卫城”及“烽火台”等历史遗迹。这些城址遗迹如下：

主城位于山的中段，主峰之上，“全城东西直线长度210米”<sup>①</sup>。在城内发现有“五处房址”和少量的青花瓷片及红胎器底等遗物。对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记载，界藩城内当有“努尔哈赤及诸王妃居住的行宫”，因此将其中两处房址列为行宫遗址。

西卫城位于“铁背山西端的独立山峰之上”，其城“平面略成正方形，城墙周长325米，内高2米，上端宽1.5米”。有一南门，城内“有房址遗迹三处”，是警戒■望的卫城。

东卫城在主城之东，建于低于主峰的一条向南弯曲的

---

① 傅波主编：《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第5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凹形台地上。城墙北、东两段为石坡墙，南段为沿台地边缘修筑的土石混筑墙，“城壁内高1至2米，上宽1至1.5米，全城设有4门”，在城内发现“房址一处”，并采集到“青花瓷片”和“九堆擂石”。

铁背山天然奇石异景也有很多，其中有“晃荡石”、“狮虎峰”、“夹扁石”、“点将台”、“四方洞”、“苍鹰台”等。

晃荡石形如纺锤，中间大两头尖，轻风吹来或用手推可以微微晃动，只是推之不倒。不过，七十年前修元帅林时已被水泥封固，今天已见不到它晃动的姿态了。当地还流传一件奇事：“文革”期间有一伙造反派带枪到元帅林游玩，午餐之后，以晃荡石为靶子进行射击比赛，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击中晃荡石。正在这时来了一位老者，笑着对他们说：“你们的枪有毛病！我来看看。”老者将枪逐一看过之后，又还给“造反派”们，可是，他们再射击晃荡石时竟然全打不响了，再找那位老者时早已没了踪影<sup>①</sup>。这很像神话传说，可有些人说确有其事。

铁背山山虽高，交通却很方便。游人从元帅林码头登船，仅十几分钟便可抵达山下，山下有人工修筑的登山步道，行约半个小时便可登上山顶。

萨尔浒风景区位于铁背山西南，两者也是一水之隔。“萨尔浒”是满语译音，汉意为“木柵”，意思是树木茂密，盛产木材。

此山和铁背山一样很早就有建州卫女真人（满族人前身）在此居住，建有城寨。如，明万历十一年（1583

---

<sup>①</sup> 《御路风情》，第3，4页，抚顺满族风情节组委会编，1999年。

年)，此处有城主三位，即“瓜刺”、“诺米纳”、“奈哈”。努尔哈赤所以要“起兵”创业，按清朝官书的说法是为了捉拿“尼堪外兰”，为祖父、父亲报仇。尼堪外兰是努尔哈赤不共戴天的仇敌。尼堪外兰的城寨叫图伦城，距萨尔浒不远，平日尼堪外兰与萨尔浒城主的关系也有矛盾。所以，他们听说努尔哈赤前来捉拿尼堪外兰便表示愿意助一臂之力，因此与努尔哈赤临时结盟，共同对敌。不料，诺米纳听信传言，暗中背盟，使得尼堪外兰乘机逃跑，努尔哈赤发觉诺米纳的行为，用计策把他擒获，按叛盟之罪将其处置。其城不久也为努尔哈赤兼并。

萨尔浒又是明清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萨尔浒之战——的主要战场，而且还有努尔哈赤所建行宫遗迹。天命五年（1620年）九月，努尔哈赤为进占辽东，将行宫从界凡迁移至此。努尔哈赤在此整军经武，并在翌年三月一举夺取沈阳、辽阳等城。

今据抚顺考古工作者和史学者们考古调查，努尔哈赤所建这座行宫分为“东城”和“西城”。东城周长3200米（相当于6华里半），“四个城门，一个便门”。城外有“护城壕，共北、东、南三条”；西城平面呈菱形，在山的最高处。现仅见西部城墙长1600余米。墙上有“马面”，城内发现“房址共六处”<sup>①</sup>。可以认定是清初努尔哈赤所建行宫遗址无疑。

另外，清朝入关之后，萨尔浒成为盛京（沈阳）至兴京（新宾）驿路上的重要驿站，如，《盛京典制备考》记载：奉天至兴京之间设有三处驿站，第一站为噶布拉村站

---

① 傅波主编：《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第7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即抚顺)，距离为 70 里；第二站为萨尔浒，两站相距也是 70 里，第三站是木奇，木奇之下为兴京。萨尔浒驿站设“驿丞一人，额设壮丁五十三名，实际应差壮丁十二名，马十九匹”。清代中后期形成上下两座萨尔浒村。1958 年大伙房水库修成之前萨尔浒村已动迁别处，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座半岛。

现在，萨尔浒风景区“林木茂密，绿草如毯，松涛飒飒，鸟语啾啾”。自然风光与历史古迹共融共荣。

萨尔浒风景区交通也很便利，从元帅林码头或从铁背山均可乘船往来。

## 张作霖生平简介

张作霖是奉系军阀首领，统治东北长达十三年之久。其势力一度伸展至京津、华北，乃至苏皖等地。并且登上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宝座，成为北京政府的实际“执政”者。一生起伏跌宕，充满传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 —

张作霖，字“雨亭”，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生于海城驾掌寺西小洼村。父张有财，母王氏，兄妹共四人：长兄作泰，次兄作孚，作霖排行第三，妹未著其名。

西小洼一带距海较近，张家以“烧碱”和耕种脊薄的河滩地为生，生活甚为贫苦。其间，张有财为养家糊口曾到镇上学徒，又开过小杂货店，均因不善而中辍。所以，张作霖到了读书的年龄却无力上学，整天“在外摸爬滚打，逮鱼捉虾”。直到十三岁那年才有机会进入私塾（即私人开的童馆，学习《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门槛。但是只读了三个月就被赶回了家。原因是他见到先生打学生手板。于是，他在上学时偷偷准备了一支扎枪头，准备先生一旦打他的时候予以报复。先生发现后，找到张母王氏说：“你这个学生，我可不敢教了。”

十四岁丧父，加之洪水又将其家冲毁，其母无法维持，遂带领他们兄妹回到娘家——小黑山二道沟。在寄人篱下的日子里，少年张作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以贴补家庭生活。

二年之后，张母迫于生计嫁给了当地一张姓兽医，生活多少有些好转。张作霖受熏陶也从此学上了兽医之道。他自小就很聪明，比如，有这样一件事：他在私塾念书时，有一次先生指着“祸福由之”这个词要张作霖来读，可是他只认得“祸”字，不认得“福”字，这时有同学小声提醒他说：就是“祸”的反面，他立即念出了“福”字。使得在场的先生，同学都很“惊奇”。由于张作霖聪明好学，很快掌握了“相马、医马”的要领。马是当时广大村镇非常普遍的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行医过程中，他走村串镇，结识了各种人物，“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东三省兵荒马乱，土匪横行。张作霖随即“下海”投入了绿林。据说，有一次他被胡军（胡铭翼军）抓捕，关进了奉天监狱，胡军因他“拒不承认，案无实据”将其释放。释放后他生活无着，正当他“穷途末路”之际，一朋友介绍其“投效到宋庆毅军马玉昆部下，做一名骑兵”。是年他十九岁。张因“精于骑射，不久升为骑兵什长”。第二年毅军全部溃散，张离开营伍回到小黑山，同年，与赵家庙赵占元之女成婚。此后，他先是重操兽医之业，旋即找到匪首冯麟阁，经冯介绍加入董大虎帮，再度开始绿林生涯。当时，各地土匪纷纷成立所谓“保险队”，其名义是“维持治安，保境安民”，实际上向乡民征收保险费，特别是向一些大户人家勒索钱财，甚至强取豪夺。他们各有自己的地盘和防区。张作霖也因此离开董大虎，回到赵家庙自己组建了保险队，后来保险队扩大，移到广宁中安堡。1900年末张作霖因遭受辽西大股匪首金寿山的袭击，而逃至八角台投靠张景惠。张景惠“慧眼识珠”，不但未以张作霖人枪俱少而小看于他，而且把他奉为座上宾，并决定将八角台（今



台安县镇) 保险队指挥大权交给张作霖, 自己甘当“二把手”。

张作霖得到张景惠的“大帮”人马后野心大增, 他为了扩大势力, 更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 决定攻打“东大会”。东大会是富庶之区, 地域甚大, 防御能力很强。当时辽西匪帮如林, 均不敢过河进入东大会防区。张作霖自不量力, 结果在夜袭潘家堡(东大会西线)的首战便遭受阻击, “伤亡很重”, 以至败退八角台。

多少年之后, 张学良谈起其父张作霖这段历史时说: “有人说我父亲是土匪, 不对! 他实际上是给人家做保险的。”“为尊者讳”, 是自古以来的普遍人情, 他如此评价他的父亲, 也可以理解。

## 二

张作霖是精明识时务之人。打潘家堡的失败, 使他认识到“在绿林中似再无发展可能, 应另寻出路”。于是萌发“投降受抚”改匪为官之念。此时, 正值沙俄增兵东北, 清兵人马俱少难以维持地方治安, 感京将军增琪决定成立“招抚局”, 收编各地“保险队”, 以补充官兵之不足。消息传来, 张作霖十分高兴。决定接受招安。事情赶巧, 这时发生一件戏剧性的故事: 张作霖得知盛京将军增琪的三姨太, 由北京前往奉天要由辽西经过。张作霖遂有意将其劫持, 对其以礼相待, 最后又将增太太安全护送到奉天。这件事使增琪甚为感动, “决定在奏明清廷后, 饬令新民府将张作霖部收编”。1902年10月15日增琪饬令新民府曰: “该头目等既然情殷投诚, 未便阻其自新, 饬即认真查点, 择其精壮者准留二百五十名, 其饷仍由地方筹备。”新民府知府增韞遵饬, 将张作霖一行编成“新民

府巡警前营马队”，任命张作霖为帮带，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为哨官。日俄战争爆发后，社会局势更加混乱。为此，清廷决定扩大地方武装。1906年，清廷任命张锡奎为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张锡奎上任后着手整饬地方部队，又将新民巡防马队营扩编为五个营，任命张作霖为前路五营统带。汤玉麟等人升为各营管带。张作霖从此如鱼得水，此后，张作霖带领他的马队营，先后击溃了苑四苑五兄弟、金凌宝帮、大小海沙子帮、高生帮、金生帮、田玉本帮，以及巨匪杜立三帮，为朝廷立下大功。特别是巨匪杜立三，人多势众，地盘坚固，横行辽西多年，为害极大。张作霖深知，对杜只可智取，不可力敌。于是，他恳请杜之叔父出面邀其赴宴，一面暗伏兵力，趁杜立三不备，将其拿获，毙掉。光绪皇帝为此亲批谕旨表彰张作霖，赏金五千两，升其官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统辖五营。

1908年张作霖奉命追剿蒙古叛匪陶克陶胡、白音大赉、六十三牙仟。此战历经一年有余，在沙漠中行进八百余里，昼夜兼程，风餐露宿，以雪为食，其艰苦令人难以想象。终于在翌年春击毙白音大赉，生擒六十三牙仟，将陶克陶胡逐出国境。清廷以此功赏予张作霖顶戴花翎，以总兵记名，擢升为洮南镇守使。编制由五营增为七营，总兵力达到3500人，成为奉天地方部队一支劲旅。

1911年10月爆发“武昌起义”，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奉天省革命党人张榕、新军协领蓝天蔚等人欲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脱离清廷。张作霖率军急至奉天为赵尔巽保驾，并杀害张榕、田亚宾、宝昆，赶走蓝天蔚，用革命党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关外练兵大臣”的头衔，再次被赏戴花翎，朝廷任命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将

其所部改为二十四镇。张作霖对此感激涕零，甚至打算“武装勤王”，进京保卫宣统皇帝。然而，清廷此时仅一息尚存。

### 三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宣统皇帝宣告退位。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成果就任北洋政府临时大总统。同年七月，袁世凯改任赵尔巽为奉天都督。赵尔巽借机向袁世凯保荐张作霖。袁世凯为统一全国军制，将奉天原中、前两路巡防营编为奉天陆军第27师，任命张作霖为27师师长，辖两个旅20营，兵力7000余人，驻沈阳附近；又将原左路巡防营编为第28师，以冯德麟为师长，驻北镇、锦州一线；将后路巡防营编为骑兵第二旅，以吴俊升为旅长；原右路巡防营统领兼东边道镇守使马龙潭，张作霖实际成为东北地区最强悍的武装头领。然而随着武力的增强，张作霖的野心愈加膨胀。同年11月赵尔巽因病请辞，袁世凯任命其亲信张锡奎接任。张作霖认为这是夺取东北大权的机会，他为排挤新任都督，采取暗中结交其部下的方式，将张锡奎“架空”，致使“奉天文武官员有事都找张作霖请示，很少向张锡奎禀报。甚至张锡奎本人也经常屈尊造访张作霖，事事与张作霖商量”。最后，张锡奎只好主动提出辞职。张锡奎走后，袁世凯又任命他的另一亲信段芝贵前来接任。张作霖又计划将段挤走。他经过与28师师长冯德麟秘密策划，要28师向沈阳靠拢。尔后，张作霖到督军府向段芝贵报称：“冯德麟要把兵开到城里来了，要反对上将军。”两天之后，张作霖再次向段急告：“28师全来了，听说他们正联络奉天各界团体和28师官兵，要惩办帝制祸首，恐怕对上将军的安全不利。”段芝

贵因此被“吓走”。据说他临走时从官银号带走大洋 200 万元，也在半路上被 28 师截回。然而，段芝贵竟然不知这些都是张作霖事先设下的圈套。回京后竟然还在袁世凯面前表彰张作霖，而这时张作霖又与袁金铠密商，起草《奉天保安会章程》，由袁金铠出面“联合奉省商绅各法团，倡立自治期成会”，提出“以奉人治奉”的口号。为张作霖主政制造舆论。此时已经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正面临全国上下的讨伐，他为了防止奉天独立，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改革官制，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奉天省长。张作霖从此集奉省军政大权于一身。

张作霖进驻奉天后，开始图谋新的发展。这时他认识到：“吾此位得自马上，然不可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厚币以招之。”也就是说仅仅依靠身边这批“绿林”武将难以成就大业，必须吸纳一些有才学的文人以及受过洋学堂教育的武备人才，方可适应新的形势。表明张作霖的深谋远虑。于是，在袁金铠等人举荐下启用和重用一些新人，如，王永江，杨宇霆、王树翰、姜登选、韩麟春、常荫槐等。特别是王永江、杨宇霆两人后来成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张作霖同时还提出要尽可能发挥本省人才的作用，当然也不排除从关内招揽人才的做法，为此，还特意在营口、绥中等交通要道设立接待站。这些措施为奉系军阀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作霖执掌奉天省大权后，开始向黑龙江、吉林两省渗透，以实现其统一东北的野心。当时，黑龙江省的英额、许兰洲两部为争夺督军兼省长的职位调兵遣将形成对峙的局面，张作霖遂乘虚而入，向段祺瑞保举儿女亲家鲍

贵卿当上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于是将黑龙江省军政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1918年初张作霖派兵入关，迫使冯国璋宣布段祺瑞再次组阁，因而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他在取得这一合法地位之后，又唆使吉林地方士绅向北京政府状告吉林省督军孟恩远“纵兵殃民”等八大罪状，于是又将孟恩远赶走。至此，张作霖实现了主掌东北三省的夙望，当上了说一不二的“东北王”。

#### 四

张作霖称霸东北后又萌发“问鼎中原”的野心。当时北洋军阀形成直系、皖系、奉系三足鼎立之势。直、皖两系为控制北京政府相互争夺激烈。因而奉系则成为直、皖争取的力量。而张作霖因在夺取东北三省最高统治权的过程中得到段祺瑞的许多好处，所以在皖、直两派斗争中一度支持皖系，但很快又秘密加入反皖同盟。不过他在公开场合却以“和事佬”的态度出现，呼吁双方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于是大总统徐世昌电邀张作霖入京，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其实张作霖早已怀有利用直、皖争斗坐收渔利之心。但是，“调停”无效，而且张作霖险些被皖系加害，丢掉性命。于是，他回奉后立即发出反皖通电，以拥护徐世昌总统为名挥师入关，加入军阀角逐行列。在直皖战争中，由于奉系的介入，皖军很快失利，段祺瑞下野，徐树铮逃亡。北京政权落入直、奉两系之手。张作霖也因此被晋升为镇威上将军。

此后，直、奉两系拼命争夺地盘和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张作霖已不再满足“东北王”的头衔，决心在日本支持下，与直系军阀交战，以独揽北京政权。1921年12月张作霖支持亲日的梁士诒内阁成立，并极力压制和打击直

系，因而引起直系首领吴佩孚的强烈不满，他电请总统徐世昌将张作霖免职。第一次直奉战争由此爆发。这次交战中，张作霖动用兵力约 13.5 万人。双方经过一周左右的激烈战斗，奉军由于西路总司令张景惠贻误战机，以及邹芬的 16 师一部分官兵临战哗变等原因而告失败，不得不退守山海关。

这次战争的失败，使张作霖感到他原有的绿林班底，纪律松散，战斗力尽失；而张学良、郭松龄率领的新派奉军不但“败而未溃”，反而败中有胜。张作霖遂下决心重用新派将领，对奉军进行整顿和充实。为此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作为整军经武的最高机构。经过一段有效的整理，使奉军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于是，张作霖决定再次进军中原，与直系争雄。为此，他积极与广东孙中山和退居天津的段祺瑞以及浙督卢永祥进行联系，致力于组成由奉、粤、皖三方组成的“三角同盟”。又利用直系吴佩孚与将领冯玉祥之间的矛盾，瓦解其势力，争取冯玉祥的合作。

1924 年 9 月 17 日第二次直奉之战打响。直奉两方军力都在 20 万左右。战场集中在山海关、九门口和秦皇岛等地。奉军首先在热河方面发起进攻，占领长城一线；奉军的第二军，则占领建平、朝阳、凌源、冷口。奉军主力则放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由于直奉两方同时将山海关和九门口作为争夺的主要目标，使这里的争夺异常激烈。奉军动用了飞机、大炮，但却一直未能突破直军防线。于是，张作霖命令郭松龄部从山海关去九门口协助姜登选，打算从九门口打开敌人防区，以便抄敌人后路。这条战策取得奇效。因而将直军大批人马包围于山海关和秦皇岛之间，直军除少数重要将领逃往天津，其余全部被俘。

正当直奉两军激烈战斗之际，直系将领冯玉祥按战前与奉系密约，突然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首领曹锟，迫使曹锟下达停战令，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被解除。就这样，张作霖取得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

10月25日（“北京政变”第四天）冯玉祥在北京北苑召开军政会议，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请段祺瑞出面改组政府，将其军队改称国民军。军政会议后第三天张作霖由关外抵达天津，由于直奉之战的胜利，段祺瑞以临时执政的名义发布命令：令张作霖节制指挥东北三省军政事宜，张作相、吴俊升督办吉林、黑龙江军务，李景林督办直隶军务，阚朝玺为热河都统，张宗昌为苏皖巡抚，杨宇霆督办江苏，姜登选督办安徽。奉系总兵力增至35万之众，比战前增加一倍。所控制地盘扩大至热河、河北、江苏、安徽以及上海等长江下游地区，奉系势力达到鼎盛时期。但是这种局面只是昙花一现。

这时，中国局势呈现又一三足鼎立局面：北方为冯玉祥和奉系势力；湘鄂为吴佩孚势力；长江下游的苏、浙、闽、皖等省为军阀孙传芳控制。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伐奉军，奉系的上海警备司令冯士廉，南京守军丁春喜师长，苏皖督办杨宇霆、姜登选相继弃职而逃。奉军撤离京畿退至山东。更为严重的是奉军内部发生倒戈事件，把奉系军阀几乎推向危险边缘。就在孙传芳通电反奉不足一个月，奉系军长郭松龄以张作霖“穷兵黩武”，“连年军阀混战，争城掠地、杀人盈野，国家元气丧失殆尽”为由，率军七万在河北滦州宣布倒戈反奉，打算驱逐张作霖下台。张作霖获悉惊慌万状，一面调黑龙江马队前来救援，一面假称“下野”。日本人见有机可乘，提出保护张作霖，向张提出苛刻条件，张与日签

订《日张密约》五条。张作霖由于有以上援救，很快将这起内乱平定。

## 五

正当奉系军阀因“郭军反奉”陷入低谷之际，北洋军阀的局势也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先是冯玉祥趁奉系内哄之机单方面毁约，驱走李景林，除掉徐树铮，将北京政府控制在自己手中。12月31日，原本与奉系不共戴天的直系首领吴佩孚宣布结束直奉之战。1926年1月张作霖率兵进关，矛头直指冯玉祥，同时致电吴佩孚，提出与其联合反冯，遂之直奉两军阀握手言和，并与张宗昌等共同组成反冯联合战线。其后，孙传芳也放弃反奉立场加入联盟，致使冯玉祥在京津、直豫等地的势力完全处于直奉军阀的包围之下。冯玉祥被迫宣告下野，出走国外。同年4月冯军退出北京，撤向南口。北京遂被直奉两方所控制。6月张作霖、吴佩孚在北京会晤，二人商定：在合力攻下南口之后再分头进攻国民军和广东革命军。这时，广东革命军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口号的“北伐战争”迅速北上，并取得节节胜利。8月南口国民军退往绥远。张作霖通电报捷，收复直隶、热河、察哈尔、绥远。11月孙传芳、张宗昌等人以十五省联合的名义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政府总司令”。12月27日张作霖由天津进入北京。张进京之后大肆“反赤”，搜捕革命志士，查封进步报馆，甚至不顾国际公法，悍然下令军警闯入使馆逮捕李大钊等数十名革命者，对其严刑拷打，最后在蒋介石及帝国主义等鼓动下，以“扰乱治安”等莫须有罪名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杀害。此举遭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举行“中



“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典礼，成为北洋军阀的末代元首。但此时奉系军阀已处于江河日下之势。其它几家军阀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吴佩孚在武汉失利而逃；孙传芳南进攻占南京、上海失败；张宗昌进取河南的计划未能实现。而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北伐军正势如破竹，对北京政府构成严重威胁。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扩大侵华计划，对张作霖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得到更多的权益，使得日张关系矛盾加深。另外，由于长年“穷兵黩武”，造成财政困难。所以张作霖在登上大元帅宝座不及一年，便不得不决定放弃北京，退守关外。

日本侵略者因张作霖拒不履行《日张密约》，使其推行侵略“满蒙”的大陆政策困难重重，失去对张作霖的幻想，决定在其回撤途中将其暗杀。

1928年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专列离开北京。6月4日早晨5时23分，专列行至沈阳皇姑屯老道口铁路交叉点陆桥下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药将专车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紧急抢救无效，于当日9时30分离开人世，时年五十四岁。

张作霖一生是非功罪，自有世人评说。

## 驿马坊张作霖墓园

张作霖墓园是张母王氏太夫人及张作霖与发妻赵氏夫人之墓。墓址位于今凌海市石山镇驿马坊村。此处南距京沈铁路石山火车站四公里，北距沈锦公路约三公里。

凌海市（锦县）在大凌河西岸，明清时期称为“大凌河城”，是关外辽西重镇之一；石山镇，明清时期称为“十三山堡”，设有驿站，以境内有猴山、印山、腰山、马鞍山、望海山、刺山等十三座高峰得名。《奉天通志》记载：“十三山高一里有余，周二十里，峰峦罗列，大小相错，凝岗积翠于大荒中，若远若近宛若图画，海山之奇观也。”<sup>①</sup> 古人歌咏十三山的诗作很多，如，明朝诗人黄褒的《十三山》诗曰：

“怪石形如削，馘山势转雄。

洞深常带雨，岩曲远含风。

睥睨一相似，嵯峨各不同。

自能宽眼界，何用蹑崆峒。”<sup>②</sup>

说明古代这里就是一处著名风景区；驿马坊，顾名思义为驿站养马之所。原来，清代盛京西路通向京师设有二十九处驿站，主要用于邮传公文，十三山驿为其中之一，驿站“设驿丞一员，额设壮丁三百五十四名，应差壮丁二十九名，

---

① 《奉天通志》，第 2207 页，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年。

② 谢建勋、丁晓翁、荆鸿编注：《辽海古诗征》，第 160 页，沈阳，辽沈书社，1989 年。

马五十匹”<sup>③</sup>。

张作霖墓园位于驿马坊村西首高坡处，其方位坐东面西，按“风水”术语叫“卯山西向”。这里面山傍河：西向约三里处突起一山，因此山山形如同一个向上尖立的“蒺藜”，故名曰“刺山”；墓园南侧有季节性溪水一道，自西东流。墓园“占地十余亩”。正中，东西排列两座大坟丘，东者为张母王氏太夫人之冢，西者为张作霖与其原配赵氏夫人合葬处。丘冢各高为2米以上，直径近7米，以水泥罩面。每座坟丘之外围以圆形护墙，护墙以青砖砌成，高近一米，厚0.36米。护墙周围是用块石铺成的步道。墓前各立有墓铭碑一座，据说立于1986年，碑由当地石山乡石南村石匠凿刻，题名文字为著名书法家冯月庵所书。张、赵合葬墓碑之前有一石桌，上面置有石炉，以供祭扫时焚香之用。丘冢之下用青砖铺以长方形台座，台座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14米，四边共立有16根护栏石柱，石柱为方形，高近一米，两柱之间以双层铁链相接。台座之前南北两侧各立一座“九眼透龙碑”。南侧之碑为清宣统二年（1910年），末代皇帝溥仪赠张学良祖父祖母诰封碑。碑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沛庸庸之庆典，茂对皇庥；敷锡类之殊荣，曲成臣孝。尔张有才，乃郎中衔加五级张学良之祖父，箕裘貂绪，诗礼垂声。貽厥孙谋，树芳规于珂理；绳其祖武，奏茂绩于彤廷。兹以覃恩，赠尔为通奉大夫，锡之诰命。于戏！□□构以培基，德钟家庆；沛丝纶而锡命，泽渥泉台。

制曰：德门衍庆，渊源早裕夫孙谋；盛世推恩，纶綍载扬夫母范。尔王氏，乃郎中衔加五级

张学良之祖母，高门毓德，华阀传芳。有谷貽孙，  
赖同心于内助；自天中命，□异数于中闺。兹以  
覃恩赠尔为夫人。于戏！光生褖翟，常昭彤管之  
辉。德嫕珩璜，允著徽章之色。

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碑为龟趺螭首，身高2.1米，宽0.79米，厚0.29米；  
龟座长2.75米，高0.75米。碑首篆文：“光增泉壤”四  
字。读罢此文令人有些疑惑不解：宣统二年张学良只有九  
岁，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娃娃”，因何被皇帝封为“郎  
中衔加五级”，而且“覃恩”赠封其爷爷奶奶为“通政大  
夫”和“夫人”的显赫头衔？查张学良生前《口述实录》  
得知原因，这本书提到了这件往事，张将军回忆说：

“（那时）蒙匪发展起来，闹得很厉害。黑龙江、吉林的部队都打不了，便调奉天的部队去打。我父亲被调去了，那仗打得很苦啊！满清政府因我父亲打蒙匪有功，就赏了个功名，叫什么亲家二品贤？但我父亲执意不要，他（指朝廷）把功名分开了。给我奶奶一个诰封，给我一个郎中。”<sup>①</sup>

立在台座北侧的石碑是民国五年（1916年）张作霖  
发迹走红当上奉天省省长，为光宗耀祖给其生母王氏太夫  
人所立，碑文如下：

“太夫人黑山王氏，处士讳文礼次女，归海城  
张氏，为处士讳发第三子妇，处士讳有才继配。  
生子男三人，女一人，孙六人。长男作泰早世  
（逝）；次作孚，镇安予警总长，击匪捐躯，赠守

---

美·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  
第17，18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

备，给云骑尉世职；次作霖，盛武将军、奉天督军兼省长。将军生而最少，早孤而家又贫，流离颠沛之中赖太夫人以长以养，以至于成人。迨将军既绾虎符，躬司军旅，太夫人犹及身而亲见之，当世荣而称焉。太夫人生于道光丁酉年正月十二日，卒于癸丑年八月二十三日，享寿七十有七。以其年十月十三日葬于锦县东北七十八里之驿马坊，从形家卯山西向。丙辰之岁，将军绾军民两篆政绩懋著，去太夫人之逝已三年矣，军佐僚属相与议曰：太夫人教子于家、有功于国，是故福全德备者，今墓门有石无文甚不足彰懿德而垂后世。遂合辞以请将军，将军曰：报本返始，余岂敢忘？虽然余无文余不敢为也，遂以属金铠。既□不获辞则谨叙之曰：张氏为海城旧族，至将军既孤，始随太夫人移徙黑山，黑山海城之邻邑也，相距二百里遥。比太夫人歿，遗嘱葬于驿马坊，勿归祔。且用形象言：将军考有才公，兆已得吉，甚不宜于迁祔。故将军之考，仍其旧北，而太夫人独葬于是。太夫人以二十五岁适有才公。佐理家政勤劬耐苦，后更灾口备历诸艰。以将军乘时崛起，自困而享，性情慈厚，钱有远识，辛亥之岁将军力任保安，驻兵省垣，遣人至黑山迎养，太饶人曰：汝已致身为国矣，国家多难，恋我何为，比再三请始肯就养，然终以致身为国之言以励将军，将军所以功望益隆，为吾奉民之保障，太夫人之教也。是可称己。

辽阳袁金铠撰文，沈阳张之汉篆额，沈阳谈国楫书丹。

盛武将军、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奉天督军兼  
署省长、特加上将军衔陆中将勋三位一等大绶  
嘉禾章二等文虎章，男作霖立石

中华民国五年十一月”<sup>①</sup>

此碑亦为龟趺螭首，尺寸大小与前碑相似，碑首刻：“王氏墓碑”字体亦为篆书。两碑南北相距 16 米。墓园四周以红砖砌成花墙，墙高约 2 米，宽 0.5 米。中有长 30 米长的“神道”，门外左右两侧各立一座门柱，门柱高 2.2 米，宽厚均为 0.27 米，顶端雕一坐狮，门柱正面开光处刻有莹联一副：

左：佳兆千秋开驿马，右：孝思百世仰慈乌。

此联亦为袁金铠所撰。其中引用了“慈乌”的掌故。

慈乌其实是乌鸦的一种，也称“慈鸦”、“孝乌”、“寒鸦”，相传它能反哺其母。晋代文人王嘉在所著《拾遗记》称，胸脯为白色的乌鸦为慈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作有《慈乌夜啼》诗，诗曰：“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声音如告诉，未尽反哺心。”袁氏此联的含意在于恭维张作霖对其母的孝道。

左侧门柱前立一石碑，上刻：“锦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作霖墓园，一九八四年八月”字样。

墓园内外栽有“果树千株”，内以苹果树为主，每当夏秋之季果实累累，香飘满园。墓园西北角有瓦房三间，为守墓人居住之所。

另外，墓门前边，从前建有一架石牌楼和一座凉亭，牌楼为三柱两间，坊柱上刻有“众山罗列儿孙远，万树环

---

碑文为笔者所录及标点。又因碑文个别文字已漫漶不清，整理时参证了杨占国先生抄载之文。

列兵卫严”，横坊上刻“根深叶茂”。此联大约亦出自袁金铠之后。这两座建筑可惜早已不存。

这里也有不少风物传说，其中脍炙人口的是“封侯挂印”，封侯挂印本是一幅吉祥图案的名字。图案上有枫树，树上悬挂一方官印，一只猴子爬上树，伸臂欲摘官印。古人以枫、猴二字的谐音为“封”、“侯”，称其为“封侯挂印”，寓意升官晋级，官运亨通。而此处所谓的同名景观，是指附近的猴山和印山。猴山其形似“猴”；印山的形状如同一颗方方正正的“大印”。猴山位于墓园西南，山的前面还有一座平顶的高山阻隔，平时从墓园难以看到它的身影，只有在天气十分晴朗的早晨，旭日东升，阳光洒到平山山顶（据说山顶是一块平整、光滑如镜的巨石），这时，如果你站到墓园前面的小桥上，便会看到在闪闪发光的平山之顶出现一只“猴”，形象栩栩如生。人们将它和其旁的“印山”合谓“封侯挂印”，用以说明这里的“风水”。

张作霖墓园起初是张大帅为其母购置的坟地。据杨占国先生调查，大约民国元年（1912年）张氏当上国民政府二十七师师长之际，开始为其年逾古稀的老母考虑后事。于是他找来自己的姐夫吴永恩，要他代为选择一块“风水”地。吴永恩遂请了一位远近有名的风水先生，经四处查访之后，选中了驿马坊这块吉地。“由张作霖出资买下周围土地四十垧”。其中，坟地占十五亩，围上了围墙，栽植了松柏树。坟地外有五六垧果树地，余者为耕地。张家坟茔建成后，又在驿马坊屯西盖了一套院落，吴永恩又受张作霖之托，迁居于此，为张家经营墓园及土地。民国二年张母王氏太夫人故去，安葬于此。

民国五年，张作霖在袁金铠等“军佐属僚”们提请

下，决定为先母王氏太夫人立碑，并委袁金铠撰著碑文。大约与此同时，又将前清皇帝溥仪颁给其先父母的《诰命》文书刻在了另一甬石碑之上。这样做既光耀祖宗，又使墓碑对称。

张作霖结发之妻赵氏夫人葬于驿马坊的时间目前不详。赵氏夫人离世于民国元年四月，享年三十八岁。这个时间恰恰是张作霖委托吴永恩办理驿马坊茔地之年。所以笔者猜测赵氏夫人很可能是这处新茔地的首位主人，只是虑及尊卑关系，因而将王氏太夫人“后入为先”。

张学良总司令因此墓是祖母王氏太夫人、母亲赵氏夫人之墓，曾几次到此祭扫。有关此事地方史志鲜少记载。今据《盛京时报》予以补充。

据《盛京时报》民国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报道，是年清明节前夕，张司令决定亲往高山子祖墓（即驿马坊墓园，因此地距高山子火车站较近，故以其为名）扫墓。行前，张学良至帅府花园父帅灵柩之前“举行家祭”，向父灵默告此事，以尽孝心。一方面命令驿马坊守墓的吴永恩“收拾房舍”，以备停留之用。一面电命锦县公安局等“警宪”部门，令其沿途严加警戒，以防不测。这是张学良自任总司令后第一次至驿马坊祭祀。

张作霖与赵氏夫人合葬时间为1937年6月。

张作霖灵柩自“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军队从大帅府迁出，送至小东边门外珠林寺，从此无人敢过问。不久，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致电张学铭，声称：“帅府所有财产及父陵均妥善保护，如派人索取，将如数返还”。为此，张学良在北京官邸召集全家“共议此事”，决定“将父灵柩迁出竹（珠）林寺，暂葬驿马坊，待复土后再安葬到元帅林。”1937年“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找来表兄弟吴



廷全（吴永恩之子），要他回沈阳，尽快将大帅的灵柩葬于驿马坊茆地，并嘱托其照管张家的坟墓<sup>①</sup>。吴廷奎回至沈阳，“会同张氏旧部，曾多方托人，与日伪当局及伪满协和会交涉”<sup>②</sup>。经彭相廷、张作相等出面求见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在张景惠的提议下经日本在东北的最高当局统治者批准，才把张作霖葬在黑山县驿马坊。”<sup>③</sup>

在迁葬之前，先在沈阳举行“慰灵祭”，然后将灵柩移上专列火车，一直开到石山站（一说羊圈子火车站），再将灵柩移上一辆四个轱辘的平板大车。由于当时张家无人在奉天，打“引道幡”的事只得由廷奎承担。喇嘛、和尚、老道等诵经队伍和吹打之人紧随其后，诵经和吹打之人由奉天带来，为增加送葬气氛还特意从锦州寺庙请来一些和尚、道士。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是张作霖的生前密友，也来亲自参加葬礼，张作霖生前旧属也有多人前来。“还有日本协和会本部事务长矢尔先吉和（沈阳）市本部事务长小林德山等二十几人”，也来为之“送行”。其他送行人员还有很多，送葬者举着“挽联、花圈、万民伞、万民旗等，仪仗俱全”<sup>④</sup>。排列“一里多长”。诵经之声伴随吹打音乐之声从火车站起一直连续未停，“每过一村也

---

①杨占国：《张作霖墓园古今考》，载《锦县文史资料》第9辑，第120页。

② 朴丰田：《大帅府秘闻》，第17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 姜铁城、杨景华主编：《张学良旧居》，第251页，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1999年。

④④⑤ 张显华、聊卿：《张作霖墓地》，载《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第188页。

要吹打，浩浩荡荡，非常热闹”<sup>④</sup>。“张作霖的姐夫吴永恩在驿马坊主持迎接张作霖灵柩。”在此之前吴永恩已“由地方雇民工，傍（张氏）其妻（赵氏夫人）坟的南侧，打一个比棺材大些的墓子，然后在三面用砖石砌墙，灌以水泥。灵柩下安（后），再以水泥板封口。然后与其妻共同培成一个大坟。当时报纸（《盛京时报》）曾以《张氏遗骸埋葬，协和会所谓美举》为题，作了报道<sup>⑤</sup>，用以讽刺日本侵略者的所谓“宽容”和“道义”。

张作霖墓园至新中国成立前已年久失修，残破不堪。其中，牌坊、凉亭等建筑也已倒毁无存。虽然有吴氏家族受命在此看守，因为无力维修只好听之任之。

新中国成立后，锦县政府将张作霖墓园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加以重点保护。1958年园内百余株老松因出现松毛虫病，遂将其伐除，改植果树千株。“十年动乱”时期，由于地方政府严加保护，未造成大的破坏，仅石门柱被推倒，部分围墙被扒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物保护工作得到加强。1984年8月锦州市人民政府将张作霖墓园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翌年9月辽宁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胡震先生到这里视察，提出修缮建议。省、市政府相继三次拨款进行维护。

第一次为1985年11月。修缮工作首先是拔除坟丘上一米多高的杂草；其次是运土70立方米，将两座坟丘分别培成高2米、2.5米，底座直径7米和7.5米的高大圆丘；再次是在丘冢四周“立起十六根石桩，并串起两道铁链”；第四是将“坟前六十四米长甬道垫起了黄土，两侧

砌起石马边石”，“重修了高达 2.5 米的门墩，安上了铁门。”<sup>①</sup>

第二次修缮是 1986 年 4 月，重点工程是扒掉了旧的残墙，在原基础上砌筑青砖花墙，花墙高 2 米，宽 0.5 米，长 50 米。

第三次是 1986 年 8 月，修缮重点是将两座丘冢改为水泥顶。并在其周围砌起 0.6 米高的护墙，丘冢四周以青砖铺成地面，在墓前各立墓铭碑一座；甬道由黄土改为青砖。这项工程用去“石方八十多立方米，水泥四吨”<sup>②</sup>。

经过以上三次维修之后墓园的面貌已大为改观。

张作霖墓园如今已成为旅游景区，每年都要接待很多来自海内外的游人。如，1986 年，“西安事变”五十周年，辽宁省台湾同胞联谊会、辽宁省电视台等单位拍摄纪录片《张学良与辽宁》，其中收录不少这座墓园的场面，从此游人陆续增多，尤其是张氏家族、亲属，还有张学良将军的旧部。如 1986 年 7 月下旬，辽宁省政府参事室荆有岩、胡震以及莫德安、郑殿起四位老先生（均为张学良旧部）专程前来祭扫，“以此慰抚张学良将军念祖怀亲之心”。他们步下汽车，沿着甬道径直来到墓前，停望许久，目光里透出深深的哀惋之情，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民革常委荆有岩老先生是跟随张学良将军多年的部下，望着果树掩映下的张家祖坟，十分感慨，动情地说：“我比张将军长一岁，一别半个世纪了，如今，他也是一个苍苍老

---

① 杨占国：《张作霖墓园古今考》，载《锦县文史资料》，第 9 辑，第 122 页。

② 杨占国：《张作霖墓园古今考》，载《锦县文史资料》，第 9 辑，第 122 页。

者，我多么想望与他重新聚首，共话当年啊！欢迎他远道归来，亲自来先祖陵前祭奠”。

1986年10月2日，张学良将军的侄女张闾衡女士，侄子张同光先生及夫人，分别前来祭祖，陪同者有全国政协，省、市、县政协及县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并给予热情接待。张闾衡、张同光等人在墓前叩拜后，流着热泪向在场的县、乡、村领导多次鞠躬致意。1987年5月张学良将军堂弟张学文偕夫人王文瑞及子女，在张学思夫人、全国政协委员谢雪萍等人陪同到此拜祭、观瞻。他们对政府大力保护张家祖墓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正如谢雪萍女士所言：“我七岁前曾来过此地，当时只是几个土坟。如今旧貌换新颜。‘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同辈中，我是第一个回故乡扫墓，真是喜极而泣，不是政府的关照，张家个人是无力如此修缮的。”谢雪萍多次握着当地领导同志的手表示感谢！

另据守墓者介绍，1986年以来到此参观者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游客，具体数目无法统计，但是除了冬季之外，其它时间几乎每天都有，可以说络绎不绝。

张作霖称雄东北13载，其势力一度伸展到京津、华北等地，是20世纪历史舞台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本来，张学良已为其建造了规模恢宏的元帅林。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出于对他的仇视，千方百计予以阻挠，逼迫张家将其简葬于驿马坊。加之张学良将军因“西安事变”，被蒋介石软禁长达半个世纪，以致张学良未能实现其“待复土后再（将其先父）安葬到元帅林”的夙愿。正是这些历史偶然，使驿马坊成了张作霖的最终安葬之所。

# 后 记

奉系军阀史是当今东北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从专家学者们发表论文之丰、出版学术专著之富足资说明。然而，对“奉系之王”张作霖陵墓的研究，目前还缺乏深入系统的成果。东北大学出版社刘振军副社长早在几年前就提出这个选题。笔者对这段历史所知不多，但在刘副社长多方鼓励下，写了这本拙作。

拙书只是初稿，在史料发掘方面，在某些问题的研究方面还有待深入，笔者仍在继续努力。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市图书馆、抗顺市档案馆、抚顺市图书馆、抚顺市城建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吸纳和参考了一大批档案及专家学者的成果，在此谨志谢意。特别要感谢东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刘振军先生、抚顺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傅波先生、抚顺市元帅林文物管理处李庆华处长、辽宁省档案馆李保安先生、里蓉主任、张欣悦女士以及沈阳市图书馆李冬红女士等人的鼎力相助。再次向您们表示谢意！

李凤民

2004 年 7 月 5 日